

哈佛-复旦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

Fudan-Harvard Medical Anthropolog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er

**FRIENDS
OF ANTHROPOLOGY**

人类学
之友

医学人类学课程专刊

Special Issue On Medical Anthropology Module



NO.1 2022
总第十五期

哈佛-复旦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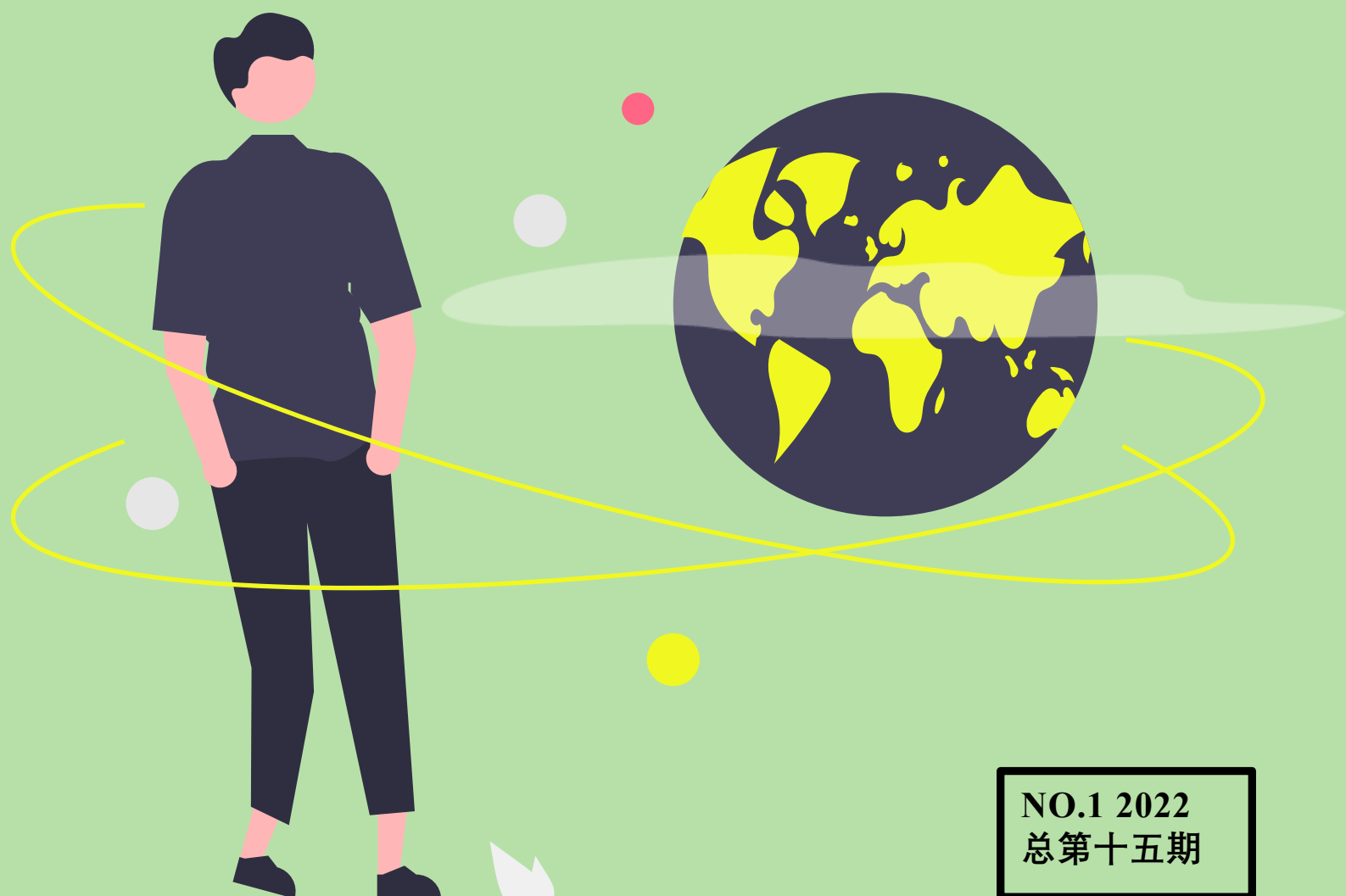
Fudan-Harvard Medical Anthropolog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er

FRIENDS OF ANTHROPOLOGY

人类学 之友

医学人类学学程课专刊

Special Issue On Medical Anthropology Module



NO.1 2022
总第十五期

人類學之友

学术顾问

哈佛大学人类学资深教授 凯博文

加州大学-洛杉矶（UCLA）人类学资深教授 阎云翔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 陈宏图

课程顾问

张力群

主编

潘天舒 朱剑峰

编辑

胡凤松 方志伟 吴晓璐

NO.1 2022
总第十五期

目录

本期主题 | 医学人类学课程

01 辑一 医学人类学课程项目

- 02 复旦大学《医学人类学》本科学程项目
- 07 医学人类学课程学习感想：一场跨学科的旅程
- 11 医学人类学课程学习感想：观察、反思、批判、有担当

14 辑二 课堂讲义

- 15 田野之术 (Fieldwork and Ethnography)
- 21 污名化语境下精障康复患者“舒适地带”的营建：基于上海社区的观察与反思
- 24 民族志视角下改革前上海食物配给实践
- 28 上海展览研究：以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民族志研究为例
- 36 族群作为机遇
- 41 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基于田野体验的洞见与反思
- 44 人类学想象中的“魔都”：上海都市田野研究的三条路径
- 46 应用人类学视角中的适老科技日常化实践：有关上海杨浦区 Y 街道 G 新村“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田野考察和思考

49 辑三 研究方法专题

- 50 人类学与统计学
- 57 作为实践的参与式观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s a Praxis
- 66 在研究方法之前与之后：对比两本质性研究教科书
- 76 对扎根理论在当下所面临疑难的三篇回应

86 辑四 原创研究与评论

- 87 用眼睛发现真实：民族志电影的叙事形式——评《持摄影机的人》
- 93 慢性疲劳综合症的诊断叙事及其暴力——试析纪录片 *Unrest*
- 98 当个体经验成为社会症候：孤独感的疾痛叙事
- 104 何处是吾乡——2022 年上海封控时期沪籍同学的回家之路
- 112 上海动物园里的人类学观察
- 118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辑一：复旦大学《医学人类学》本科学程项目

复旦大学《医学人类学》本科学程项目

复旦大学《医学人类学》本科学程项目依托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展开，为复旦学生提供了了解健康、医学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跨学科前沿研究的机会与平台。

医学人类学“本科学程项目”实施方案

学程名称：

医学人类学

主题简介：

医学人类学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生物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在研究风格、视角和路径方面互为交叉、渗透和借鉴的一个跨学科前沿研究领域。本学程项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情怀、专业精神并有志于从事前沿学术研究的跨学科人才，他们将来或能够从事与健康、医学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或能够服务于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综合模式的当代医疗系统。基于此，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历史学系、生命科学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联合推出医学人类学学程项目。

本学程为学生提供较为完整的医学人类学修读方案，使学生对于包括社会医学化情境下生老病死的文化建构、医患关系、照护实践、性别与身体等议题的研究思路和概况有初步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使用不同学科的研究工具，比如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田野研究、公共卫生的流行病学调查。同时，能够将理论与人口健康、医务社工、社区医疗服务等领域中的实践结合起来。主要内容包括：由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历史、公共卫生、生命科学三个学院开设的学程课程；邀请本领域优秀学者担任指导，面向全国招生的健康与医学人文研究暑期学校；参与复旦-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组织的各种国际交流活动。

1.实施对象：

本校一至四年级本科生；

2.学程证书申请要求：

- 1) 在附录中所列的学程课程中，至少修读 15.5 个学分，课程门数不少于 6 门；必修课程为：医学人类学、现代生物科学导论、流行病学、流行病学实践、人类学研究方法，计 13.5 学分；
- 2) 至少参加四次复旦-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组织的相关活动和实践：参与一次当代人类学讲坛的讲座；参与质性研究工作坊活动一次；参与“适老科技与社会发展”暑期学校中组织的实践活动（夏季）；参与“复旦人类学日”活动（秋）。

注：如果学生全程参与了暑校，只需要再参加一个“复旦人类学日”的活动就视为满足了该项要求。

3. 申请人在本科阶段若达到上述要求，可向学校申请“医学人类学学程课”证书。

备注：

必修理论课：医学人类学（3 学分）、现代生物科学导论（3 学分）、

必修方法课：流行病学（2.5 学分）、流行病学实践（2 学分）、人类学研究方法（3 学分）

五选一：医学史学（2 学分）医疗和健康社会学（2 学分）、社会医学（2 学分）、医疗社会工作（2 学分）、文化人类学（2 学分）

4. 如需咨询本学程有关问题，请联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朱剑峰老师和潘天舒老师：jfzhu@fudan.edu.cn；tspan@fudan.edu.cn。

附录：“医学人类学”学程课程及替换方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周学时	实验(含上机)学分	实践学分	实验实践学分合计	开课学期	课程负责教师	开课院系	可替换课程及相应学分	备注
BIOL120002	现代生物科学导论 A	3	0	0	0	秋	卢大楠等	生命科学学院	任意选修 (3 学分)	必修
PHPM130068	流行病学	2.5	0	0	0	春	赵根明	公共卫生学院	任意选修 (2.5 学分)	必修
PHPM130069	流行病学实践	2	0	2	2	春	王娜 丁盈盈	公共卫生学院	任意选修 (2 学分)	必修
SOCH30204	人类学研究方法	3	0	0	0	秋	潘天舒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意选修 (3 学分)	必修
SOCH30203	医学人类学	3	0	0.5	0.5	春	朱剑峰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意选修 (3 学分)	必修
HIST110014	医学史	2	0	0	0	秋	高晔	历史学系	任意选修 (2 学分)	五选一
SOCH30054	医疗和健康社会学	2	0	0.5	0.5	春	骆为祥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意选修 (2 学分)	
PHPM130003	社会医学	2	0	0.5	0.5	春	严非	公共卫生学院	任意选修 (2 学分)	
SOCH30073	医疗社会工作	2	0	0.5	0.5	春	付芳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意选修 (2 学分)	
SOCH30004	文化人类学	2	0	0	0	春	潘天舒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意选修 (2 学分)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 简介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 合作研究中心

Harvard—Fudan Collaborative Med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Center

为促进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促进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学科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于 2007 年 10 月在复旦大学社政学院成立。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国际医学人类学领军人物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担任中心荣誉主任，潘天舒教授担任中方主任，朱剑峰担任副主任。理事会成员还包括其他来自复旦和哈佛的教职人员，如著名美国加州大学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和詹梅（均为复旦特聘教授）、美国戴维森学院的罗力波（复旦特聘教授）和佛蒙特大学的邵镜红（JEANNE SHEA）教授等。特邀学术顾问包括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肖泽萍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徐一峰教授、哈佛医学院陈宏图教授、复旦大学公卫学院严非教授和复旦历史系的高晞教授等。



在中心成立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向凯博文教授颁发复旦大学名誉教授证书。

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核心成员来自社政学院六大专业的跨学科团队，包括：潘天舒、朱剑峰、赵芳、陈虹霖、桂勇、付芳、骆为祥、赵德余、吴国宏、陈侃、俞志元、张聪和丁玫等。



2007年10月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复旦-哈佛燕京学社“文化与健康”医学人类学跨学科研讨会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复旦—哈佛燕京学社“文化与健康”论坛是中心成立伊始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成功举办的首个跨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从 2008 年起，中心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推出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举办一百多次当代人类学论坛、质性研究工作坊和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并积极拓展与哈佛大学人类学亚洲中心和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和社会学部、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人类学系和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师生课题合作和交流互访，在医学人类学项目合作以及课程建设等方面开始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心的主要研究项目包括：上海地区青少年精神卫生状况调查（田野研究部分）、多学科交叉视角中的上海老龄化社区的护理照料和社会科技与老年照护实践和突发公卫事件与上海老龄社区应对机制（云南大学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项目）等。从 2011 年起，中心每年与上海人类学学会和复旦生命科学院合作举办复旦人类学日。从 2018 年，中心在复旦研究生院指导下，每年举办适老科技与社会发展暑期学校。

从 2012 年 10 月起，中心已经出版《复旦人类学之友》共 15 期（含医学人文专刊）、《政策人类学》特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复旦人类学评论》（以书代刊）。

医学人类学课程学习感想：一场跨学科的旅程¹

2019年的冬天，庆幸着度过一个紧张高三学期的我并不会想到，即将有一场以该年命名的病毒与疫情毫无征兆地介入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不会想到，我将成为疫情后第一批大学生之一，学习公共卫生，与人类学结下缘分。

按照一种颇为流行的叙事：一个高中生在择业之际遇到了疫情，以及其被描述为公共卫生事件后发生的种种治理与争议，受此影响，便选择公共卫生作为专业，决心为社会做贡献。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浪漫。受到社会、学校、家庭的妥善保护，我作为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并不认为这一冲击会影响对未来道路的选择；再加上私人缺乏感受力的性格，我个人也没觉得疫情足以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事实似乎总是缺乏“美感”，我其实是由于调剂才进入到一个名为“公共事业管理（卫生管理方向）”的专业，甚至对此感到异常苦恼，因为这几乎已经是志愿上最靠后的几个了。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苦恼是成问题的，它更多地源于优绩叙事下等级制的感知，而非出于未成行的志向；相比较起身边能够坚定喊出“想当医生”的同学，我几乎没有任何热忱。此时，我甚至不知道这个专业属于公共卫生，也不知道公共卫生的广阔范畴，更别提了解人类学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我带着一无所知进入了大学。不过我发现我身边同专业的同学也皆是如此。“公共卫生”四个字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仿佛社会上确实有这么一群人在做着某种不可或缺的工作，但具体在干些什么却又说不上来。医生能够治病救人，直观地，大家从小到大几乎都接受过医者的帮助，但公共卫生工作者又能做些什么呢？看到医学院不仅培养临床医生，还有这么一个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让我们非常震惊，而雪上加霜的是，公共卫生的本科教学居然还有划分——预防医学与公共事业管理。预防医学或许还可以顾名思义，那么公共事业管理却是要学什么，“管”什么呢？直到现在，向其他专业的朋友解释自己的专业时，我仍然感到异常吃力，也就更不用说刚入学的我们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同学都与我一样，接受调剂来到了这个专业——毕竟没有人会填报一个压根不知道的专业——有的人本是想学临床，有的人想学习经济管理，唯独没人从一开始就想学公共卫生。平时交谈间，总是有着调侃本专业，还苦于无法转专业的调侃。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未来能做些什么。

在糊里糊涂中，我开启了大一年级的学习。我们当时的课程几乎就是经济管理的基础课和数理基础课程，涉及公共卫生的，也只有大一下学期短短的一节“公共卫生导论”。与此

¹ 作者：王友。

同时，我也在艰难地探索着其他方向，选修或旁听了一些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课程，尽量了解其他学科的热门议题、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比如有德语文学、语言学、社会学、国际关系、思想史、哲学……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社会学和人类学产生了较多的好感。在自己接触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学科范式的过程中，最吸引我的莫过于人类学对“什么是真正发生的、什么是真正要紧的”（What really happened, what really matters）的执着和坚持；我当时认为，人类学并不追求得出一个普适性或代表性的理论，也不会强行生硬地为某个社会现象套上理论或公式，而是真真切切地介入研究究竟发生的过程，最终逼近人之为人的某种真相。另外，在我当时的理解中，人类学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充分理解，促进与不同形式他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而非理论先行，妄下批评。接着，我读到了人类学者研究异文化之外，聚焦于本文化或某种主流社会及其现象的作品，我更加欣喜，因为这意味着人类学也会研究传统观念中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就这样，我可以说不初识了人类学，并萌生了进一步学习人类学的意愿。但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作为一个连对自己专业都还莫名其妙的学生，我担忧人类学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跨度。

事情在大一下学期迎来转机。当时，“复旦人类学”公众号转载了清华大学景军老师关于医疗社会生态论的讲座预告，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人类学、社会学与医疗卫生领域的结合。在讲座上，景军老师介绍了国内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的前沿议题，包括安宁疗护、肉身经济、生命赠予、群体性自杀，甚至医疗体制改革等公共卫生研究同样关心的议题。除此之外，景老师还展示了对反思医疗社会现状、医疗家庭主义、医学精英主义的反思。最关键的是，景军老师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探讨了安乐死、姑息疗法等似乎更多在生命哲学、伦理学中讨论的问题。这样的视角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景老师提到的问题很多确实也是公共卫生关注的问题，但他的论述似乎更加令人振奋，更具挑战性和批判性。于是在第二天，我找到了我们的新生导师，来自社会医学系的赵新平老师，询问我们学院或专业是否涉及这些领域，或以这种框架研究问题的老师和相关课程；是否有从人文角度，运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理论路径和定性方法研究此类问题的学科院系。赵老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建议我去选修社政学院的人类学课程，还特意提到那里有老师恰好就在做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设有名为“医学人类学”的跨学科课程。

正是在与赵老师的交流之后，我决定修读医学人类学课程。我感到非常惊喜，对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医学社会问题研究产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作为初步实践，在大一暑假，我参与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系王静夷老师关于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孤独感）的质性研究。我与

另一位搭档一起走访上海城郊的社区、街道、卫生院，完成对抽选老人的深度访谈，并从社会医学的角度识别危险因素、总结应对措施。在实践中，我也产生了不少疑惑，很自然地对社会医学人类学会有怎样的洞见感到好奇。于是在大二上学期，我先选修了潘天舒老师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课。潘老师在课上介绍了不少田野研究的实例，令我对人类学的介入、参与式观察有了新的感悟，也借此重新思考自己在先前调查研究中使用的深度访谈——它有哪些优势，又会忽视什么问题。在学习了凯博文倡导的疾痛叙事后，我将其与社会医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对比和思考，逐渐认识到两种方法所代表的不同学科视角间存在的张力。通过学习和思考，我对这一定性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不仅有对去情境化方法、编码、主题分析的批判，还有对采用这些方法背后的内涵，某些合理之处。其实很多时候，并非是研究者没有关注孤独感潜在在人群的疾痛叙事，而是那些私人的逻辑和诠释几乎不可能纳入寻求普遍化、标准化的致因-治理结构中。

我对定量研究的偏见也是在经历人类学学习后才破除的。我曾对定量与统计方法持有消极看法，认为它忽视了活生生的人，因此缺乏人情味，很多量化研究似乎给人一种压迫感。在这一点上，我貌似比专业的人类学学生还要人类学。在“人类学研究方法”课的最后，潘老师给大家留了一个期末作业，让我们自选主题完成文献评介。我发现在给出的主题中，有一个竟然叫做“人类学与统计学”的主题，其中有些文章还涉及“美国人类学之父”Franz Boas。看到本以为八竿子打不着（甚至有些“对立”）的两个学科竟然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当时正好学习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础课程，我顿时来了兴趣。我逐渐明白，统计学并非像某些观念中那样“价值中立”，人类学家（包括其他研究者）并不需要以缺乏关怀为由排斥使用统计工具，需要的是清楚认识到统计学与量化方法的宏大假设，并且学会与承认研究者本人价值倾向共存。我意识到，如何做有价值倾向的研究，不仅是人类学研究者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学科学者需要在感受中面对的困惑——不论学术伦理、学术规范如何假装避免学者陷入这一窘境，我们都不能否认它的真实发生，这甚至可以理解为学术场域中的某种禁忌，与异文化部落中的禁忌仿佛异曲同工。这也是人类学教会我的一点，不论名义上如何难以处置，我们不能对真实发生的过程视而不见，哪怕是我们自身所处的学术领域。

在第二个学期，我又修读了“文化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与此同时，我那仿佛隐匿的本专业课程也逐渐增多，比如“卫生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经常发生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上午上课的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个概念，下午课上的老师却将它批判一番。在这种思维冲突的过程中，我接受了更剧烈的“反思训练”——不仅要跟着人类学老师的思路反思

公共卫生专业课上提出的理论，也不能忘记反思人类学的反思本身，这样才算真正实践了“反身性”的精神。比如在上半“卫生经济学”课上，老师强调要将人的健康、社会卫生损失、疾病负担乃至政策干预与医疗干预的绩效化为货币、数据（比如死亡率、缺工率等）形式，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核算、评估、修正；而在晚上朱剑峰老师的“医学人类学”课上，朱老师又会对类似的观点进行批判，认为应该同时强调生命质量和“死亡质量”，并将公共卫生、人口学的统计方法和数据导向视为一种治理术，将会带来深刻的社会控制；下一次“卫生经济学”课上，我有时会拿着从人类学上学到的知识向老师提出质疑，感受跨学科的张力与框架的差异。又比如在下半的“卫生法与卫生监督”课上，老师解释堕胎何以合法，她强调人虽然有“生命权”，但没有“出生权”，因此胎儿没有生命权，堕胎自然而然地也就没有任何法律问题，“同学们把它背下来就行了”；而在朱老师的课上，她又会对所处的文化语境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这不仅仅是生物医学问题或法律问题，远不是将权利进行划分就能简单解决。类似的过程几乎每周都会出现，仿佛来自两个学科的老师在我脑海中不断进行着讨论。用 Paul Farmer 的话讲，我重新想象卫生事业的同时，也得以重新想象着人类学。学习医学人类学课程带给我的收获，并不单单来自人类学的洞见，而是在与我本专业的学习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

在初步学习人类学后，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专业，公共卫生与公共事业管理，它像其他任何专业、任何学科一样具有局限性，也有需要突破却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也正因如此，正因其同样关照人类不同层面的苦痛，面临现实世界的挑战，而具有投身于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也许跨学科交叉和争论并不总是让人愉快，也许人类学家和卫生实践者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折衷”，不懈的实践、批判和反思都不能被放弃——这是我从医学人类学课程的学习中，从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的老师和前辈们身上，以及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身上感受到的精神。

医学人类学学程课学习感想： 观察、反思、批判、有担当²

我第一次听到人类学是在 2020 年秋天《医学人文导论》的课堂上。这门拼盘课有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等不同的部分，医学人类学部分的最后一节课下课，讲台前面围了一群同学问各种问题，潘天舒老师告诉大家：医学人类学的学程项目正在筹备。

2021 年春天的时候，我每周一第四节课在六教一楼的教室自习，课间常常溜去 H6104 后门看潘老师上《文化人类学》（通识课程）的时候在讲什么，那深蓝色的 PPT 上的内容有时候是“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有时候是“仪式”，不变的是左边的金钥匙。这门课上有一位隔壁班的同学，我请他把课件共享一下。突然有一天，复旦人类学公众号上发布了医学人类学学程项目的相关内容。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决定选几门课试试看。2021 年夏天，我参加了社政学院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主办的“适老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生暑期学校。2021 年秋天，我同时上了潘老师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丁玫老师的《文化与社会》（通识课程），另外还有并不属于学程课但是从内容上来讲关系密切的《医学导论》。2022 年春天，我选了朱剑峰老师的《医学人类学》，还修读了选修课里面的《公共卫生视角看心理健康》和《医院管理理论与案例》。

以上是我在邯郸校区的两年通识教育快乐时光当中，跟人类学学科在课程中的一些关联。现在回头来看，在这条道路上我并没有很好地规划怎样走得更快，更多时候是走一步算一步，凭借着被点燃的热情与好奇，一点点地摸索。一路走来，最想感谢的得是这几位老师。复旦人类学的核心授课老师很少，就四位，我只认识三位，潘天舒老师，朱剑峰老师，丁玫老师。

潘天舒老师上课总是很亲切，笑眯眯的。我对人类学最早的兴趣很有可能是被他在 2020 年秋天介绍给我们的凯博文、金墉、法默（Paul Farmer）的故事感动到了。课间他谈起之前做的上海弄堂的研究、麦工研究和世博会现场田野体验和观察反思，会跟我们分享“有担当的”（engaged）田野研究是什么样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课程印象最深的是两次情景剧，一次演的是充满趣味的《丛林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the Bush），另一次是沪语医患沟通。两个情景剧的文化语境迥然不同，但都是通过田野遭遇来让我们对文化相对主义和族裔中心主义之间的张力进行深度思考。第一趟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排练场地，至少还是线下，一小班人就跑到光华楼三十层黄昏的玻璃窗前，抱着电脑席地而坐。排情景剧能够唤醒对于

² 作者：任卡娜

文化的敏感度，比如某些台词应该怎样改才最贴近他们当时的情景，有些情绪应该用怎样的肢体语言去表达，不同身份的走位应该怎样安排。反复的推敲、思量就是我们打碎了原来刻板印象，去重塑文化意识的过程，也是一种奇异的“engaged”体验。在课上表演完，我还记得课后助教松松带大家一起去政修路边上的阿猫一条鱼吃午饭。第二趟排练是线上的，因为需要讲沪语，所以困难陡增。我讲是洋泾浜沪语，幸好王若珺同学讲的沪语还是很地道的，最后在课堂上表演的时候也不算太出洋相，毕竟潘老师在沪语上绝对是老法师，还救了我们几次场。潘老师总是非常支持和鼓励我们这些后生，我分享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医学导论课程中，我们小组选题是关于上海医院的沪语使用与医患关系，他给出了不少语言人类学方面的改进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完善了这个研究。



△ 《人类学研究方法》课程短剧《丛林中的莎士比亚》课堂表演现场，从左到右分别是修课同学李朝白（新闻学院）、董洪杉（历史学系）、任卡娜（本文作者）、王永飞（伯克利交换生）、韩和融（临床医学院）。

朱剑峰老师每次都能一口气连上三节课，这是我尤其敬佩的地方之一。因为之前《医学人文导论》课程上，朱老师讲的生殖医学、萨摩亚人的成年，当时把我给震撼到了，所以一直都非常想上朱老师的《医学人类学》，不过每次总是跟我们专业课的时间撞上，直到在邯郸的最后一个学期，朱老师通过协调，专门改了上课时间，才使我得以圆满心愿。我觉得最可惜的事情是今年（2022年）春天大家都被关在寝室小房间或者家里，没有能够在教室现场听朱老师上完这门课。我个人感受到朱老师讲课的特点就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种遮蔽，无论它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好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样，这是我又一个敬佩她的地方。医学人类学开在这学期，恰逢上海渡劫，朱老师专门增加了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部分，可以说是我在这个学期的 Aha Moment。这门课里面，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分享观影（讲慢性疲劳综合征的 Unrest/讲乳腺癌患者的粉丝带运动/讲多动症的纪录片/讲白血病的 My Sister's

Keeper.....) 的人类学思考,有的时候是借用课堂当中学到的理论体系去分析问题,有的时候是惊叹于同学们分享的新观点,更多时候是感受到所谓“常识”被抽丝剥茧地剖析,所谓“信念”被挑战,以及穿越迷雾后柳暗花明的澄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门课上又遇到了之前《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课友,王若瑀和王友,可以说是很亲切,也是医学人类学学程的缘分。

丁玫老师的《文化与社会》一直都是抢手的七模课,我每次选都会掉,幸好 2021 年春天名额变多了,我在二轮选课的第一天下午 13:00:01 如愿选上了。因为七模课主要是服务于通识教育,所以文化与社会这门课可以说是规划得非常有意思。比如在讲《甜与权力》的时候,助教其乐从教室外提进来两个蛋糕,估计来上课的同学没有谁会忘记这种边批判资本主义边“engaged”吃蛋糕的体验。课堂和文献各种文献和案例深深刻进我的脑海:华尔街与普林斯顿、礼物与经济、雨燕与“驯化”、My Fair Lady 里面的口音、The Big Bang Theory 里面的刻板印象、基因测试与社会建构.....直到现在,我一打开当时的笔记,好像还坐在 H6201 教室里,丁老师上课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 2021 年春天的时候,我看到 FDUROP 的申请通知,又因为之前在走进临床课程中,我的新生导师史庭燕老师在带我们跟诊的时候谈到过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所以我就想研究引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对于外科手术的影响。当时给朱老师写了邮件请教是否有可能当课题指导老师,虽然朱老师已经指导了其他项目,但是还是帮忙找来了丁玫老师来指导课题,可惜最后发现基础医学院的曦源计划要求是导师必须是来自基础医学院,就这样错过了两位可爱的老师。虽然这个课题在今年春天结束的时候顺利地结项,但我还是感到深深的遗憾,也自觉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更完整、更深刻。或许 FDUROP 和人类学学程其实教会我这样一个道理,课程会结束,春天会结束,一年期的项目会结项,但是人类学视角为我带来的观察、反思、批判的力量会一直伴随着我思我在。

虽然医学人类学学程我还有很多课没有上,但是不知不觉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的回忆、情谊与思考。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幸彼苍之厚。

辑二：课堂讲义

本辑为潘天舒教授在2021年秋季学期为本科生开设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部分讲义整理

田野之术 (Fieldwork and Ethnography)³

本节课的讲述似可被阐释为对下述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展开

- 什么是参与式观察为基础的田野研究
- 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民族志的洞察力兼容社会工作者如何进行田野研究
- 田野研究的伦理准则

以参与式观察为基础的田野研究

一般性讨论

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的田野作业 (Fieldwork) 以马林诺夫斯基所创立的参与式观察法为基础，参与式观察法 (马林诺夫斯基创立) 为田野研究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使之成为人类学学科的标志，丰富了常规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质性研究内涵和形式；同时，田野作业作为一种实证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其观察基于经验，征用经验，并受经验的引导。

人类学研究的方法曾在历史中展示出三种面貌，i. e.，扶手椅人类学者⁴ (armchair anthropologist)，露台访谈⁵ (verandah interview)，田野研究 (field work)。

³ 作者：李朝白

⁴ 早期的人类学家并非通过以参与式观察为特征的田野调查来收集和整理资料和数据，而是从旅行者、探险家和传教士撰写的记录域外风情的杂感和游记之类二手报道中，获取文化分析的素材和灵感。这种在书斋或图书馆中闭门造车并远离田野基层的研究路径，造就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扶手椅人类学” (即：armchair anthropology) 工作模式。无论是第一位尝试为文化进行“科学”定义的泰勒 (Tylor)，还是写成《金枝》这样一部集神话、仪式和符号研究之大成的鸿篇巨制的弗雷泽 (Frazer)，都算是不折不扣的“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摘自课堂幻灯片

⁵ 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人类学者走出国门，进入异邦内的田野场所，开始了与研究对象有交流、有互动的考察工作。这是一种被称之为“在阳台上进行的人类学” (即：verandah anthropology) 田野研究模式。研究人员在住处的阳台上，与当地人进行交谈，以期得到有价值的材料和信息。从事“阳台人类学”研究的多半是受雇于殖民当局的人类学者。他们的居所位于殖民辖区之内，远离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就研究视角的转换而言，“阳台人类学”的出现比“扶手椅人类学”研究路径要高明得多。人类学者与受访者有一定的互动和交流，然而由此获得的与地方社会生活相关的讯息和资料仍然具有局限性。因为人类学者

田野研究似也被看作是一种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结合，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要求研究者沉浸在当地社区（长期居住）并通过本地语言工作⁶，最大程度的深入当地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来手机与研究主题有关的地方知识。即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所在其《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中说的那样：“掌握当地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呈现他对自己世界的看法”。

费孝通先生曾这样讨论田野研究的重要性：

为什么必须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调查呢？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又是多变的、富于创造性的，它决不是只有单一文化背景和有限知识和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想象和包容得了的。所以研究者必须深入你所要了解的“他人”的生活中去观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也反映出研究者的一种心态，就是你是不是真正要去理解、接受“他人”的语言、传统，入乡随俗，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到设身处地地用当地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这本身就是对“异文化”的尊重和对“异文化”开放的心态。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平等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交流和沟通。⁷

——摘自课堂幻灯片

强调了参与式观察的重要性后，似还应当考虑田野研究中的注意力或着眼点的问题，Herzfeld 就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解读方式的不同提出了“社会时间”（social time）和“丰碑时间”（monumental time）这样一对概念，社会时间（social time）浓缩了人们的日常体验，和邻里生活紧密密切结合在一起，其所塑造的记忆和解析历史模式充斥着人生百态的烙印，是一种具有各种形状、气味和声音的集体记忆。纪念碑式的时间（monumental time）意图构建一种静止的、纯洁的、可简约的和具有普世意义的公共记忆模式，传导出一种时空观念，并试图去复制、重叠甚至遮蔽普通大众的“社会时间”。

无法深入被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并对成为其社会一员的意义有所体验和感受。“阳台人类学”不是获得地方性知识的上佳手段，在田野实践中势必会被参与式观察法取代。——同上

⁶ 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在实践体会到，只有掌握当地语言，才能知晓与他朝夕相处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以及他们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同上

⁷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2004年8月“北京论坛”发言），载《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317页。

作为“数据”的文化

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数据即处在无组织和未处理状态或者形式中的信息（字母，数字，符号）；指代或者表征：条件，看法或者说是物品。

根据泰勒对文化所作的第一个科学定义，文化包括人类在精神和物质领域的一切活动：文化可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文化既是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也是专家能人的技术创造。在实践中，文化活动是一种规划、技巧、设计和策略。

在格尔兹（Geertz）看来，文化，尤其是地方性文化是一种供当地人阅读和研究者阐释的意义丰富的“文本。”人类学者可选取文化中任何他们感兴趣的方面，通过“厚描”（thick description）获取细节以达到阐释文化意义的目的。而文化意义在任何公开表达的符号形式如言语，仪式和习俗当中都可找到。

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民族志的洞察力

上面对田野研究的讨论更多地是从其作为经验研究的角度切入，然而有必要指出，田野作业对经验的强调并不以其对观念的摒弃进行，而尤为强调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在米尔斯看来，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是经由其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形塑之后的产物，那些看似与个人有关的事件往往掩映着了庞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自我与日常思考应避免使常识成为思考的桎梏，而应当对常识背后的历史、社会的条件与作用进行考察。提及常识，必须承认常识和直觉能够为田野作业创造一些可能，但同时，有必要指出这样的可能终究以一种预感的形式出现，而预感则必须经由科学的方法来检验。

当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多半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一个国家卷入战争（如以巴冲突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或者发生百年难遇的汶川地震，孤儿寡母和背井离乡的惨景，不是一种仅靠个人力量就能控制住的。当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袭来，从底特律汽车城到东莞工业区，都会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无论你是多么勤恳的员工，无论你的业绩多么出色，你都难逃由经济大趋势带来的这一厄运。

涂尔干

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发问“什么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并指出，社会事实是人们“行动、思考和感觉的方式，它外在于个人并被赋予了一种可以控制人的强制力”。而其在《自杀论》中通过统计方法所获得“自杀毋宁是一种广泛社会趋势的产物而非个体行动”，就是经由科学方法观察而获得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ies)的一个写照。

The suicide victim's acts which seem to express his personal temperament are really (caused) by a social condition; high suicide rates reflect weaknesses in the web of relationship among members of a society, not the weakness of character or personality in the individual.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摘自课堂幻灯片

凯博文

Arthur Kleinman 曾在社会/文化的场域中研究疾病(disease)和疾痛(illness)的某种区分，在他看来，前者是科学意义上的病症，而后者则给予患者/病人的自身感知。在 20 世纪 70 年代，Kleinman 试图通过下述问题探明社会和疾病之间是如何相互建构的：

- What do you call this problem?
- What do you believe is the cause of this problem?
- What course do you expect it to take? How serious is it?
- What do you think this problem does inside your body? How does it affect your body and your mind?
- What do you most fear about this condition? What do you most fear about the treatment?

——摘自课堂幻灯片

凯博文先生别开生面的研究着眼于患者对自身疾痛的理解与感知，并追问这样的理解和感知生成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Claire Sterk

Claire Sterk 曾在纽约和亚特兰大的街头摸索和确立田野范围，并在十年间对 180 名以染毒瘾的卖淫者为重点对象的 18-59 岁的艾滋病患者进行深度访谈，着眼于倾听其人生故事 (Life story)。我们由此得见 Claire 如何建立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信任。

田野研究的伦理准则

AA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伦理准则要求人类学家对学术，对广泛的其他社会文化，对不同人种、物种和环境都具有道德义务。在东道国和社区工作前，研究人员必须获得所有受影响方的知情同意。

而有必要指出，研究者的首要道德义务是对被研究者的道德义务。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 Ruth Benedict, Margaret Mead 和 Napoleon Chagnon 都因为其某些研究而受到一些批评。

鲁斯·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就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菊与刀》) 写作中采取的方式就曾引发一些批评：“她 (本尼迪克特) 的一个有力的研究武器就是对在美国的日本移民进行访谈。我记得一些受访对象告诉了我他们对于在每天午餐期间与本尼迪克特所进行交谈的内心感受。他们欣赏她所提问题的深度，但同时又实在惧怕她探求他们情感和经历的一切细微之处所作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努力。在他们看来，她力图倾听他们所能回忆起的每个细节，一遍又一遍，简直是不厌其烦。他们仍记得用餐完毕后被准许离开时的既疲倦又感到轻松的情形” (Vogel 1989: X) ——摘自课堂幻灯片

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对于 Samoa (萨摩亚) 群岛上少女们的研究试图阐明她们从童年到成年 (青春期) 的过渡是一个平稳的过渡，没有出现在美国看到的情绪或心理困扰、焦虑或困惑的系列原因。但这个研究受到了以德里克·弗里曼 (Derek Freeman)

为代表的人类学家的激烈批评，后者穷追不舍地批评旨在揭示 Mead 的结论基于极其有限的且未必坦诚的样本，却充分夸大了事实。

拿破仑·香农（Napoleon Chagnon）因为写作 *Yanomamö: The Fierce People* 而名声大噪，却被记者 Patrick Tierney 揭露其在研究中夸大了 Yanomamo 人的攻击性，并故意给原住民提供大砍刀而为其招致了暴力。

污名化语境下精障康复患者“舒适地带”的营建： 基于上海社区的观察与反思⁸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很多时候，疾病给患者带来的苦痛不仅局限在病痛本身，还包括依附在疾病身份上的种种社会隐喻。其中，精神和心理疾病所带来痛苦的两个方面尤为密不可分。

污名化语境中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作为一种被贴上医学标记的“特殊”群体，为观察和理解社会医疗化情境下健康不平等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潘天舒老师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在精神类症状被定义为“病”时便受到了污名化，随之而来，病耻感贯穿在精障患者应对社会环境与处理人际关系之中，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他们的照料。潘老师还补充道，学界对精神障碍算不算一种疾病进行深刻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照护工作者与患者亲友都提倡将精神障碍作“去病化”叙事，即彻底废除污名化语境。但是，症状的客观存在使得精神障碍患者仍然需要特殊的社会照料，换言之，污名即使在官方语境中根除，在具体实践中仍会以更微妙的方式存在。因此，潘老师认为，应该理性对待污名化存在的现实，利用已有制度安排和条件的基础上营建“舒适地带”（comfort zone），在实现“回归社会”的终极目标过程中，提供能为精障患者所理解、接受并充分体现其意愿的路径选择。

潘老师在课上作了这样的对比：目前，不少精神障碍患儿的父母倾向于隐瞒孩子的病情，比如不向残联登记、将孩子留在家中而非送往专业照护机构，原因就在于害怕社会污名，对孩子和自身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但这样事实上阻碍了患儿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帮助，父母自己也会背负巨大的压力。潘老师回忆自己过去的田野经历，有一次社区中就有个精神障碍患者，居民都知晓这个孩子的情况，并常常用上海话唤之为“戆大”（gangdu，意为傻瓜、白痴）。乍一看，这种做法不尊重患者，这种称呼甚至带有侮辱性，但是根据观察，患者在“骂声”中，在事实上受到了街坊邻居的共同照看，所有人都会在他遇到危险或困难时主动提供帮助，也就是说，他虽然被以赤裸裸的污名称呼，但事实上融入了这个社区，他的社会处境、人际关系不见得弱于藏在家中、父母抵触任何形式社会污名的患儿。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形式上的去污名化不一定能给患者本身带来生活质量上的提升，这引起了老师的思考。于是，经过几年的田野调查，潘老师发现，在改善精神障碍患者的处境的努力中，“顶层设计”力臻完美，聚焦政策服务，却不能充分顾及当事人对自身境

⁸ 作者：王友

遇的认知以及适应困境的努力；目前的措施设计足够尊重当事人的权益和隐私，但忽视其主观能动性（agency）；主张精障患者回归社会的举措虽有善意，但在污名化情境下缺少操作性和可行性。因此，真正改善精障患者的处境需要人类学的介入，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找到一条污名化情境下的出路。

戈夫曼提出，“正常”与“非正常”的区别在于视角，而不在于人本身。只有在某种文化语境中，精障患者才有正常与非正常、疾病与健康的区分，文化为这种区分提供依据。凯博文对疾症（disease）和病痛（illness）做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医疗人员对病人症状的称呼，后者则是患者对病痛的切身体验，解释了所谓医学概念也是植根于文化和历史语境之中的“阐释模式”，同一个的病症对于不同视角的个体来说是不同的。这些都强调了从患者角度叙述病痛的重要性，并暗示了一味进行去污名化的困难。

即使是与精障患者朝夕相处的照料工作者与家人，也能成为社会污名化力量的具身。《同情的重负》聚焦心理疾病患者的照护者，发现他们在面对患者时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照护者作为患者的至亲，具有在交往中关怀精障患者的意愿；但另一方面，照料者自己并不是精障者，又常常以理性、“正常”的思维方式对待患者。这样一来，同情的边界难以确认，患者和照护者的关系揭示出其难以协调的文化矛盾。我也发现，在一些描述精障患者康复生活的公益文章中，虽然笔者与患者朝夕相处，倾尽所能照料患者，但言语中总是流露出对患者能做出某些“正常”行为感到的欣喜，以及对此的期待之情。然而，这些正常人认为“好的”、“美的”举动从精障患者的角度并非是最舒适的。连最亲密的照料者都无法摆脱污名化语境的思维（思维方式的差异完全可以被描述为文化矛盾），社会更是可想而知。《是我，还是我的药？与抗忧郁药共处的日子》揭示了精障患者对药物的微妙态度。患者感受到，在药物抑制病情的时候，原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似乎也被压抑了；服用药物固然可以暂时让自己回归“正常”，融入社会，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自我认知的困扰。这样看，以往那些政策设计中将精障患者回归社会视为终极目标，未免是不够实际和友好的。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由于“污名化”是一个学术用语，精障患者及其家属虽然生活在其中，但不一定能从专业的角度理解，所以需要处于客位的研究者与主位的当事人反复交流，彼此协调出“污名化”在具体情境中的语词用法。另外，由于当事人作为精障患者的特殊性，传统的参与式观察需要做出变通，在无法直接接触到患者进行访谈的情况下，对照护人员及家属进行观察，比如举行焦点小组访谈、家属工作坊、深访、事件观察（干预项目/门诊/会议等），述说生命故事（Life Stories），尽可能实现从主位视角谈病说痛（Illness Narratives）

的目的。

潘老师认为，从患者和照护者的立场改善精障患者与家庭的处境，不应该一味以帮助其回归社会为终极目标，而应该围绕患者主体，发挥其能动性，构建舒适地带(Comfort Zone)。因为心理疾病患者和照护者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方式异于“常人”，“失常”者一旦被“戴帽子”，以亲属为主的“强关系”力度骤减，而常规意义的弱关系也变得更弱，原有的朋友圈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而，一厢情愿的力推精患病人回归社会的举措，虽然释放出善意，也的确为病人带来暂时的利益，但由于对污名化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认识不够，加之为了绩效操之过急，难以达到持之以恒的目标。舒适地带的社会关系是对患者友好的社会关系，比如相同境遇的家庭组成互助小组，彼此可以理解各自的苦衷，相互支持、交流，分享照顾经验，树立境况改善的信心；也比如将社交保持在原本就与患者关系密切的圈子，尽可能给予患者舒适感。

最后，潘老师解释了营造舒适区对精障患者和社会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要勇于跳出“舒适圈”，去接受新事物，迎接新的挑战，从而避免平庸。然而这类针对普通的“正常人”的鸡汤说法，对于笔者在上海社区的特定情境中接触到的被认为“不正常”的精障患者来说，“舒适地带”尽管不是回归社会的最终目的，也毕竟为他（她）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存在于家庭之外的自由空间。在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关注到“舒适地带”对于特殊人群的功能和意义，与此同时，清醒地觉察到“污名化”对于实现回归社会目标构成的挑战。通过跨学科和跨界项目合作的方式，在田野研究过程中对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加以深刻反思，从而以维护和扩展“舒适地带”等方式，找到促进精障患者在获得自身尊严的前提下回归社会的多种路径。

民族志视角下改革前上海食物配给实践⁹

这项研究缘起于 James Watson 的“饮食与革命”研究项目，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新中国建立后的粮食计划供应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票证制度已经深刻嵌入了新中国公民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共同的制度性记忆。通过收集从 1997 年到 2001 年间断开展的实地研究中收集的上海档案馆档案和普陀区、卢湾区田野研究数据，可以探看社会主义粮食配给制度(1953-1993)演变、发展和转变为后期社会主义福利救助(1993 年至今)的过程。

这是一项必须借助多学科视角来完成的课题，以“票证”为棱镜来审视特定历史语境中制度设计、实施与策略之间的关系，需要跨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可以把票证制度下的粮票交易视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竞争和创业行为复苏的序幕，而这类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转型”“改革”实践如何得以发生并如何深刻地影响今后的社会，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作为制度安排的粮食票证

控制食品消费的国家机制

粮食票证配给首先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的。

这是一种控制食品消费的国家机制，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密不可分。新中国于 1953 年秋制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这一规定的具体措施是在农村地区按国家计划进行粮食收购，向城镇和缺粮地区统一配给，并严格控制粮食价格和粮食市场，禁止私商囤积贩卖。这一政策的出台既是新中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步骤，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国家战略相应的经济手段。

1955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一律实施居民口粮分等定量、工商行业用粮按户定量、牲畜饲料用粮分类定量的供应制度，同时提供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等 7 种供应凭证。《暂行办法》的出台彻底将城镇居民及其他用粮对象的粮食消费数量、品种、类别等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理性”设计

⁹ 作者：李大武

其中，根据市镇居民的劳动差别（按劳分配）、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暂行办法》规定了市镇居民的具体供应等别、每月口粮定量标准和供应手续。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数量多少也与工种、年龄和性别相挂钩。

“组织依赖性”（organized dependency）

单位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制度。单位体系将所有城市居民都纳入其中，并借此发挥资源分配、福利保障、信息共享等社会管理、控制的职能。在票证制度中，单位就是计划供应、计划收购的依托平台，国家通过一直延伸到神经末梢的基层单位¹⁰来完成对粮食、票证资源的分配。正是因为票证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不可或缺，且仅有制度化的国家单位拥有分配的权力，个人就不可避免地要依附于单位之下，更进一步，依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经济市民权（economic citizenship）的体现

票证制度把有无城市正式户籍作为标准，对城乡居民实行差别供应，将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排除在计划供应之外。在计划经济制度下，粮票成为了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能不能按时按量地领到粮票，是城市居民与农民最直接的区别。

向社会福利救助的转型（1993-）

在 1993 年票证制度终止之后，粮票作为收藏品慢慢淡出了群众的视线。与之类似的粮油卡同样可以作为兑换粮食的凭证，但不再是发放给所有城市居民，而是作为一项为居民基本生存兜底的社会福利措施。

粮票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Ration Coupons）

• 路径的偏移（Paths and Diversions）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深刻变革，农村生产力空前发展，农产品供应问题得以缓解，粮食购销政策中“双轨制”开始出现，允许完成统购任务后的粮食进行自由买卖。但粮食的市场购价（议价粮）不断提高，市镇居民统销价格（平价粮）始终不变，粮食“双轨”价差逐渐增大，产生了粮票交易攫取经济利益的巨大空间。另一方面，户籍管理制度的放松，也使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扩大了对粮票的需求。粮食交易的市场条件成熟后¹¹，粮票已不再是单一的购粮许可，而是担当被中国人民广泛认可的有价证券，数量多

¹⁰ 包括城镇居民委员会及人民公社、农业合作社。

¹¹ 在 60 世纪初经济困难时期，粮票黑市交易就已经发生，但总体而言并不普遍，且都被一般百姓视为非法勾当。

少、类别差异的不同粮票被悬置于同一价值体系上 (regimes of value)。

进入 80 年代后，粮票交易普遍发生于农贸市场、百货商店、交通站点等人流密集处，居民以粮票换取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满足生活所需。尽管国家多次颁布政策禁令，打击粮票交易，但黑市交易仍然层出不穷，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居民小规模的交易行为，只要交易双方保持一定的警惕，执法部门也无从过问。发展到后期，地方性的非正式的“灰色”市场交易，已经得到本地执法部门的默许。在票证制度之上，进而形成了反抗制度的非正式市场关系网络和交易域 (spheres of exchange)。

• 粮票的货币性 (all purpose money)

如上所述，到改革开放时期，粮票作为购买或领取粮食凭证的基本职能逐渐弱化，开始具备商品化、货币化的新职能。粮票成为人民币外使用最为广泛的“货币”，被称为“神州第一票”“第二货币”，甚至出现粮票被当作彩礼和嫁妆的现象。粮票根据使用范围有其分类——全国通用粮票、全省/地区通用粮票（上海曾与江苏、浙江省于 1955 年至 1960 年间共同发行地区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因而也在私人交易中形成了等级划分。毫无疑问，同等配额下，适用范围更广的全国、全省/地区通用粮票将比地方通用粮票更受欢迎。

结语

原有的票证制度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割裂，排除了价值规律在价格调节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似乎可以视为国家控制下的“道义经济”——国家统一收购农民粮食，统一为城镇居民供应粮食，以生存为先。票证严格限制居民的粮食供给，以制度化的力量抑制确保生存的同时，也抑制着居民的私欲。

以粮票作为棱镜来审视制度，不难发现，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户籍制度的确立与不断强化，经由居委会、企业单位等政府职能部门或组织机构，票证制度逐渐演变成为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载体。票证制度与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基层延伸、向居民日常生活扩展的过程。通过建立与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相适应的动员体系和管理体系（票证制度），国家得以将城市基层社会有效地整合起来，实现了国家政权与城市社会的高度一体化。

改革开放后逐渐普遍的粮票交易则有力冲击了统购统销体制下“市民白吃、农民白种、政府白贴”的利益格局。为了绕开票证对生存生活限制，粮票交易这一反制度的行为实则必然出现。人们通过黑市或自由市场进行票证交易，以此突破计划经济制度对人们生活、消费

的限制，因而成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交易的一个鲜活案例。

诚然，粮票交易的普及虽破坏了原先僵化的粮食购销秩序，却也让社会上出现了诸多“投机倒把”倒卖粮票的行为，甚至有政府人员监守自盗参与巨额粮票交易，加重了国家“购销倒挂”的财政损失。但另一方面，拉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竞争和创业行为复苏的序幕后，逐渐萌芽、成熟的交易行为模式与更形而上的企业家精神，却也是粮票制度的余韵。

上海展览研究：以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民族志研究为例¹²

在 2002 年 12 月 3 日，上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发展中国家申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城市。在 2006 年 3 月 22 日，温家宝总理向 168 个国家发送了官方邀请。截至 2009 年 2 月 4 日，23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2010 年上海世博会于 2010 年 5 月 1 日开幕，同年 10 月 31 日闭幕，预期接待游客 7000 万，实际接待游客约 7300 万。作为主办城市的上海展现出了卓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保障能力，确保了世博会的顺利举办。上海的多重转型涉及城市空间的生产和重构、消费以及资本、人员和技术的流动等等全球化进程。

本节课所介绍的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田野研究是与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研究中心顾问、美国密苏里大学人类学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兼职教授包苏珊（Susan Brownell）的合作研究。包苏珊教授曾经在 2010 年 6 月 8 日主讲了第二次复旦当代人类学讲坛，题为“美中大国崛起的盛典：1904 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1904 年，圣路易斯世博会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殖民主义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彰显了超级大国的优越地位，同时也是清朝朝廷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世博会。而在一百年后的 2010 年，中国试图通过世博会塑造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讲坛展开讨论了 21 世纪超级大国的标准以及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前景。

在这节课上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举办 2010 上海世博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通过在场馆中文化符号的呈现，去确立国家和世界的身份认同。而后可以继续追问：世博会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是世博会会改变中国，还是中国会改变世博会？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程度大幅提高，中国的城市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打造类似世界金融之都的全球城市 (metropolis) 的愿望应运而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申办国际体育赛事、会议和世博会的运动，中国的城市走向世界的趋势也进一步凸显，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新一代城市管理者的未来愿景中，进步必须以摩天大楼的数量和高度来衡量，以展示新千年城市的潜力和力量。建设全球城市包含三个维度：一是建设居民区、商业区、工业和经济开发区等特色功能区；二是配备和升级交通和通信动脉；三是通过高层建筑、高架、高速公路和大桥的引入带来新的垂直维度。

¹² 作者：任卡娜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 00.6%，却贡献了中国 4.1%的 GDP。它的港口处理着全国 8%的货运，占中国全部进出口的 12%。在这样扎实的数据面前，人类学家却不得不提出一些看似败兴的问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发展的良好标志吗？那些尚未充分参与经济繁荣的人会享受到这一鸿运吗？也许数据并不能说明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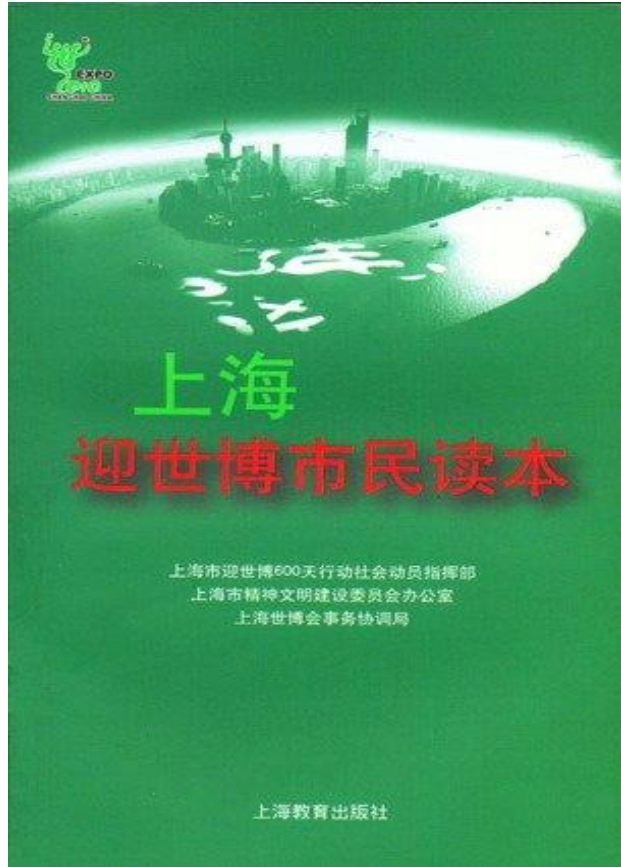
城市化进程远非一个均衡的进程，也是带来社会风险和危机的根源之一。城市不断扩张、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人口转型，这些社会变革一直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并且这些转型所必须面对的后果随时威胁着可持续增长。一些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已足够让我们引以为戒。不仅仅是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市政府官员，我们每个深处城市化进程中的人都有着这样的使命，如何重新思考发展模式。



对此，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这样回答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主题在申办期间就已经确定，2001 年 9 月 14 日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确定为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世界各国可以以世博会为平台，交流城市发展理念。另外又设定了五个副主题，分别是“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重塑”和“城市和乡村的互动”。面对这样的回答，人类学家想要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什么样

的生活使城市更美好？什么样的城市发展才能使地球成为人类和所有居民更好的家园？

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在研究克里特岛小镇雷特诺斯(Rethemnos)时，区分了“丰碑时间（monumental time）”和“社会时间（social time）”。他描述了负责历史文物保护的官僚机构与对国家怀有敌意、对旅游业持怀疑态度的当地民众发生冲突时的情况。他所重点关注的克里特岛小镇雷特诺斯(Rethemnos)曾是威尼斯人统治下的学术中心，后来被土耳其人居住。他探讨了文物保护者和公民在谈判历史所有权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谁定义了过去？过去属于谁？什么是传统的，又是如何决定的？赫茨菲尔德在探索雷特诺斯居民对建筑环境的意义时发现，他们对建筑的兴趣更多地与个人历史和直接的社会背景有关，而不是吸引保护人员的正式历史。他还调查了居民的社会实践，从家庭和亲属团体、政治协会、社区、性别意识形态的立场，以及这些对住房所有权的态度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传统既是一种尊重的对象，又是一种商业主义的对象。面对现代社会，雷特诺斯又成为了一扇重要的民族志之窗。概括来说，“社会时间”构成了日常经验的“精华（grist）”；“丰碑时间”通过占用熟悉的空间并将其转化为纪念性来发挥作用，并试图将社会经验减少为“集体可预测性（collective predictability）”。时间的丰碑化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时间”冲突，包括大部分事件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日常经验。二者之间的差异让我们不禁要问，“丰碑时间”与“社会时间”究竟孰是历史的真实？而这种疑问同样适用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民族志的思考。





作为主办城市的上海意在提出和践行一种的文明生活方式，通过旅游、人际交往、娱乐休闲、邻里和谐等等方面来证成。为了迎接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海市拆除改建了大批棚

户区、城中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容市貌改造工作。一个容易注意到的例子就是流动摊贩，以世博会为分野，上海市中心城区原本随处可见的流动摊贩可以说是几乎消失殆尽。此外，上海市政府鼓励号召市民展示良好的公民素质、文明素养，专门下发《上海迎世博市民读本》至家家户户，街道上四处写满文明标语，诸如“自觉排队 秩序井然”、“文明让座 礼让谦和”等等。比如一些市中心的退休居民原本有穿着睡衣出门买菜、遛狗的习惯，但是这种习惯在世博会举办期间会被社区街道办等级别的行政人员劝阻，因为穿睡衣出门被认为是“不文明”行为。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丰碑时间”的世博会期间文明行为的要求与作为“社会时间”的市民日常习惯之间产生了冲突。

当然，让我们把目光从“社会时间”再移回“丰碑时间”，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展望人类的未来**。由于世博园区的设计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一种快速消费：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承载大量人流，等到一定期限展览闭幕，不管是参展的人或物都会随着曾经的辉煌而仅仅作一段记忆留存，尤其体现在大部分实体建筑均已拆除或另行他用，因此所带来的展览与参观时间极其有限，完成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田野观察也是相当困难与复杂的，这意味着接受挑战与创新方法，包括短期观察、现场民族志、访谈、文本分析等，涉及实习生、访客、志愿者、记者、工作人员为“伪装”的各种身份，以及倾听对应不同身份的不同声音。

根据主办方的宣传¹³，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来自全球的参展方共同围绕这一主题，充分展示城市文明成果、交流城市发展经验、传播先进城市理念，从而为新世纪人类的居住、生活和工作探索崭新的模式，为生态和谐社会的缔造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生动的例证。

这些都在各种**主题场馆**中有所体现¹⁴。**城市最佳实践区**更多是概念展示，提升国家形象，而非吸引商业投资。因此场馆设计充分考虑了为参观者提供互动空间以增加公众参与，无障碍设施以及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供的协助以满足残疾人士的需要等等。位于浦东片区的城市足迹馆分为三个展区，分别表现城市文明的出现、成熟，以及全球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其核心思想是：**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人、城市、环境一直在互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人类足迹，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智慧和成就。**而城市星球馆则由德国通信 Triad Berlin 的概念设计；解决标志城市化的复杂过程，用透视法结合了西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中国的风水遗产。城市人馆由荷兰设计师 Kossman 设计，以人的需求与发展为主线，讲述来自世界各大洲、不同职业的家庭故事。这些故事通过五个展区：“家庭”、“工作”、“交往”、“学习”、“健

¹³ <http://www.expo-museum.org/sbbwg/n32/n36/index.html>

¹⁴ <https://www.chinanews.com.cn/expo/news/2009/04-29/1669942.shtml>

康”来表现，核心思想是：**城市化过程要顺应、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田野观察的一个独特身份是世博会志愿者，大概可以睥睨如今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之盛况。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招募于2009年5月1日正式启动。志愿者由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工作组统一招募，累计约有17万个名额，将在上海世博会举行时在世博会园区内外自愿展开宣传、秩序维护、信息咨询、语言翻译、应急救援等服务活动。位于上海的72个世博志愿者工作站接受报名¹⁵。截至研究完成，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报名人数已超过61万人，其中国际志愿者3001人。由于园内志愿者著上绿下白的衬衫，因此亦被上海市民亲切地冠以“小白菜”的外号。志愿者的任务是促进公众参与，展示中华文明，确保博览会“成功、精彩、难忘”。志愿者口号是：“**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 (At Your Service at EXPO)**”。志愿者的基本要求是愿意奉献和贡献；认真负责，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愿意学习；愿意接受志愿者管理机构的指导和安排；遵守规则。对于这些志愿者而言，世博会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启示？世博会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否真的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印证？以及更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赫兹菲尔德的“社会时间”与“丰碑时间”的区隔来研究。

课堂把“上海怀旧”话题留到了最后。近些年由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涌现出非常多对于上海的想象，一些经典意象如“老洋房”、“石库门”也成为了网红打卡点。然而，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这些由艺术作品、怀旧潮流所塑造的上海，终究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丰碑时间”，而要想真正沉入这座城市，我们仍然向“社会时间”里去寻觅、深入和栖居。

同样，从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为了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城市，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人自己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方向，了解他们是谁，并优先考虑他们所身处的日常。日常所包含的“社会时间”行之不著、习焉不察，却意义重大。

课堂的最后留给同学和各位读者的问题是：21世纪的世界展览是什么？这样的世界是如何呈现的？世博会的民族志观察意味着什么？表象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什么？我们将尝试翻译谁的知识？人类学能否通过对多角度、概览和争议性解释的诉求来处理这种特殊的领域情况？

¹⁵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4%B8%AD%E5%9C%8B2010%E5%B9%B4%E4%B8%8A%E6%B5%B7%E4%B8%96%E7%95%8C%E5%8D%9A%E8%A6%BD%E6%9C%83#%E5%BF%97%E6%84%BF%E8%80%85>

后记：

2010年前后，还在上小学的我那个时候在看《少年文艺》这本小周刊，有段时间上面是一些世博会主题的故事，比如甜筒是怎么在世博会上由匈牙利甜饼和冰激凌春融而来的，比如农民工的孩子如何看待世博会。家里还收到了市政府下发的一些世博会纪念品。街道上随处可见的除了文明标语，还有蓝色的海宝。放假前，班级里的同学会把毛绒玩具带到学校里玩；假期里，学校也组织了同学们共同参观世博园。

因此当我真正到了世博会的彼时彼地，经过了充分的造势，竟很难预料到第一天就吃了一个非常难吃的牛肉饼。后面又跟着父母反反复复去参观了大部分场馆，除了沙特馆是后来世博会结束后延长展览参观的，我或许不能记住所有的奇珍异宝，但仍然记得——美国馆的四维《花园》童话真正向我证明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挤进围满了人的丹麦馆去看一眼听过千万遍的从童话里面走出来的小美人鱼、排了很长的队进英国馆但惊异地发现那蒲公英一样美丽的竟然是六万根亚克力管装的种子、在世博轴上兜售排队用的彩色小板凳的商贩、解决七千万人园区饮水问题的免费直饮水点、排队时最爱的喷雾装置和大冰块。这些都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也会让我时至今日仍然愿意去相信“Better City, better life”这样的理念有朝一日能够在上海或世界上其他的城市真正实现，或者说在自己与很多同龄人身上感受到大概从2010年就开始萌芽“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意识吧！

族群作为机遇¹⁶

在本节中，我们将把族群性（ethnicity）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试图就文化与资本的复杂面相展开探讨，并反思族群文化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族群性与商业化的融合：Ethnicity, Inc.

在 *Ethnicity, Inc.*（直译为《族群性有限公司》，图 1）一书中，人类学家 John Comaroff 和 Jean Comaroff 当代迅猛的商业化浪潮下重新审视了族群性、族群认同等概念，并在探索文化与市场间复杂关系的同时试图为族群性找寻未来的出路。

两位学者发现，在南非、在美国（图 2-4）、在苏格兰，全球各地的族群性与文化都在被不断推向市场领域，成为促进游戏业、旅游业、博彩业等经济项目发展的新兴力量。这一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商业化运动彻底改变了族群文化与商业的关系：一方面，少数族裔不再以一种完全的异域（exotic）面貌出现，而是以企业的形象进行自我重塑；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主体的企业也利用特殊的族群文化元素来开辟新的市场、创建新的消费模式。就这样，在族群文化、资本主义和身份变迁的碰撞中，一个新世界从此诞生。

这番对于本土文化和资本主义互相塑造的论述不禁让我想起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资本主义的诸宇宙观》（“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一文。萨林斯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是，非西方地区的人们必然会从自身的世界观出发，来统合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的经验，而这并非是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观所完全取代的过程。也即是说，西方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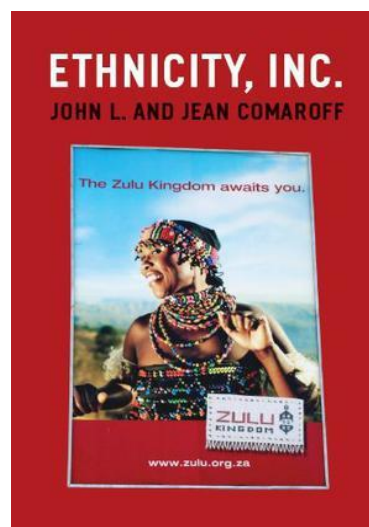


图 1

¹⁶ 本讲纪要由王若瑒、胡凤松整理。

本主义的扩张多少是借助了非西方地区不同的文化逻辑而实现的。这有赖于前者在各种地方性文化图式中进行调适的不同方式。这种塑造作用也恰恰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之外其它多样的存在方式的正当性。所谓“资本主义的宇宙观”，在萨林斯看来实质上是全球一体化和地方性分化的“双重自发过程”，他称其为两者的“互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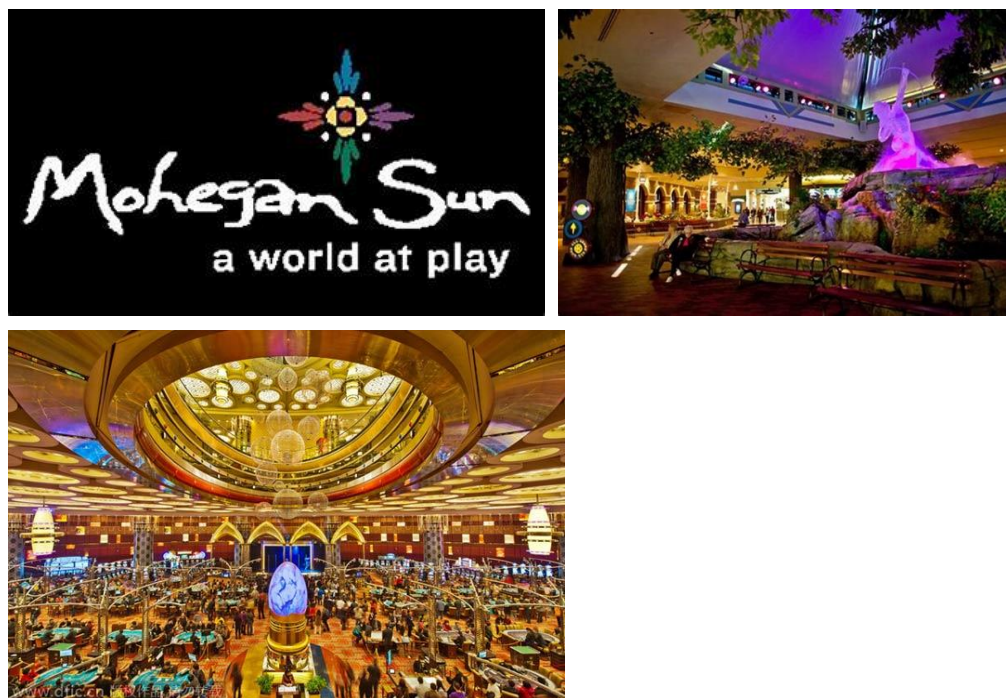


图 2-4：美国的印第安赌场（American native casinos）

二、族群性与认同的重构：旅游业的多重影响

1、被表演的族群性（performing ethnicity）：游客滤镜下的族群文化

在商业力量的作用下，族群文化经历了一系列改造和修建，被蒙上一层契合游客期望、从而能够最大化商业利益的外衣。换言之，游客的兴趣仅仅在于观赏一种经过缩略和剪切的文化形式（例如传统舞蹈、传统戏剧）。这导致旅游业损害了本土文化的质量和原真性（authenticity）。当然，旅游业为族群文化所带来的一个积极影响则是，在地方和国际范围内。对于保存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遗址、纪念碑、建筑，以及一些能够移动的物体）的支持力量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支持的姿态又建立在怎样的立场之上，这需要我们去不断发问。

2、被重构的族群性：资本与主体性



图 5：文化“特色”与商业模式的结合



图 6：被表演的族群性

进一步而言，族群性和族群文化已然成为了能够销售和购买的商品。正是在这种商品化的过程中，文化传统被重构、被追溯、被言说。族群性和身份认同也得到了一种确认：不仅仅是这种（暂时的）确定性与生产和消费相勾连；同样地，少数民族人口的主体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以相对稳定的产业化发展和利润流入为基础。或许可以说，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为了一种文化资本，且能够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在资本与文化的媾和中，土地、传统、政治、金钱等诸多元素都在同一个场域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无独有偶，萨林斯在《资本主义的诸宇宙观》中同样提及了原住民在面对资本主义“侵蚀”时所表现出的主体性：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将原住民视作自身历史的被动对象（而非创造者），只有在受到外界（欧洲人）的刺激时才能够进行反应，而不是主动地出于欲望或习俗而行动。这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表明只有西方资本主义统治有能力赋予社会以结构和体系。萨林斯的洞见则在于，他看到了一种双向的变迁过程，即资本主义与地方文化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结合，而少数民族人口的主体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彰显的。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与主体性的迷思并不仅仅局限在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中。以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项目为例（Mullaney, 2011），尽管这一过程中似乎只有少数民族的得到了标记和识别，但“汉族”的存在与建构也恰恰是同时建立在识别少数民族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两者的身份构建，都或多或少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参照，而非一种脱离联结的独立身份。也正是因此，在错杂的资本与族群性图景中，我们也需要看到“族群性”这一概念内部的复杂性。上文已经提及的《族群性有限公司》一书中所描绘的，

正是少数族群利用优势族群对其身份的印象而从中获利的情况：1934年《印第安人复兴法》（the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IRA）确保了印第安人创业、建立公司的合法权利；由此，族群身份、文化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少数族群获得利益的重要资源，而知识产权法则被用于确保这一文化-资本集合体的“本真性”和“正宗性”，同时也确保少数族群对市场的独占：自1972年来，“银手”图标（silver hand logo，图7）被印在手工艺品上，作为“本真性”的标识，但实际上这些手工艺品都是不断被“创造”出来以满足旅游者的想象的；又如阿拉斯加东部的原住民在公司的授权下创制出一种“传统”，即在一年中举行两次庆祝活动，在期间表演歌曲、舞蹈，展示手工艺品等。这一“传统”自1982年以来已经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仪式活动之一。不难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被发明的新传统以资本所期望的方式运作，为少数族群带来利益。然而，亦有许多学者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台湾人类学家胡台丽（1993）的纪录片《兰屿观点》表明，被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兰屿人的文化与仪式，最终并非由兰屿人、而是由外来的企业家操盘，真正获利的也是这些外来企业家。Shankar（2020）则通过对广告公司的考察，揭示出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对于族群身份的操纵：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的主流广告主要瞄准中产阶级白种人，广告中很少出现少数族群，即使出现了少数族群，他们也是受到贬低的，被描绘成野蛮人的形象。而现在美国的广告虽然强调文化和种族的多元性，这些广告中的少数族群形象仍然没有超出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且在广告中加入这些少数族群的主要目的，也是因为商品和广告公司认为这些族群是重要的消费者。Leong（2021）则进一步揭示出，那些名牌公司在广告中更喜欢使用黑人模特，“少数族群”的身份仍然是受到标记的，并且成为资本用以获利的手段。



图7：Silver hand logo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认识到，今天被新自由主义的商业化力量所形塑、重构的，绝

不仅仅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与认同：面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商业化趋势，早已没有一个当代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而人们对自我和群体的认同、对传统的想象、对过去的回忆、对现实的认知、对未来的期许，都多少挟卷在了商业化的浪潮之中。而人们在这一情境下如何思考与行动，则是人类学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此外，“国家”在这一图景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族群识别、边界划分、多元协商等社会经济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尽管在这里并未就此深入探讨，但这无疑也是值得进一步探寻与深思的主题。

相关文献：

- Comaroff, J., & Comaroff, J. (2014). *Ethnicity, Inc.*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eong, N. (2021). *Identity Capitalists: The Powerful Insiders Who Exploit Diversity to Maintain Inequal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llaney, T. (2011).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Vol. 18).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nkar, S. (2020). *Nothing Sells like Whiteness: Race, Ontology, and American Advertising.*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2(1), 112-119.

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 基于田野体验的洞见与反思¹⁷

本次课潘天舒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和曾经的学生洪浩瀚一同完成的人类学研究——“麦工”群体研究。主要的田野在上海闹市区四家麦当劳门店（时间是2008-2009和2010-2011，分两期进行）。田野研究缘起于和广告创意团队的合作，洪浩瀚以普通员工身份进入门店，开展对麦当劳门店的人类学观察。

PPT封面上贴着本次田野信息提供者“小黑”极富活力的照片，他还曾在访谈中自称“血液里流的是番茄酱”。潘老师这一番有趣的介绍展示了一位“麦工”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这和当时西方以及今天社会对麦当劳以及“麦工”的认知大相径庭。

潘老师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出发，梳理了“麦工”一词的诞生与语境变化。柯普兰在其畅销书《X世代》中首次提出“麦工”，而随着《快餐女人》以及《快餐帝国》等影片对麦当劳形象批判的发酵，“麦工”从最初饱含人们对劳动工人的同情，到带有一些调侃意味，再到最后在西方完全成为一种刻板符号，供自由派精英人士鄙视并作为工具批判。此时似乎和快餐商业帝国以及垃圾食品沾边的“麦工”具有天然的不正当性。而且在西方世界，“麦工”还被视为失意者的就业选择。

但是在2008年的上海，麦当劳以及“麦工”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潘老师用语言人类学中“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作了一番解释，“麦当劳”、“麦工”对应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这些沉甸甸的符号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因此研究处理基本的问题是：在当下的上海，做一名“麦工”意味着什么？与欧美的“麦工”们有何不同？究竟藏匿着怎样一个地方化的“麦工”世界的时空结构与意义图景呢？作为方法课，潘老师指出我们可以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考察横亘在在全球化与地方转型之间，在科层制度的理性安排与个体的调适之间的“生活世界”。

麦当劳经历一系列的结构变迁，麦当劳自1994年在上海开设第一家店之后，不断地进行自我形象调整，总体的趋势是打造年轻、时尚的品牌形象。从地方转型来看，上海当时正承担着中国向全球展示的窗口作用。和西方的含义大为不同的是，在上海“麦工”是一份有技术含量且有前途的工作。在门店中产生的“麦胞”情谊，给店员们带来连结感。另外店里还有“乱辈分”的拟亲属称谓（称“哥哥”、“姐姐”）来减少员工之间的距离，打造年轻的

¹⁷ 本讲纪要由董洪杉整理。

整体形象。

值得注意的还有“麦工”如何维系认同：第一是非公司规定，以沪语作为主要的工作语言；第二是招聘排斥外来务工者（迥异与餐饮服务行业）；第三是麦乐送员工，亦不被接纳，而被排除在员工群体之外。店内实际操作还有许多“本土化”的部分，店内的员工需要掌握“实用性”的操作，比如控制小食分量以节省食材、得体地应付公司的商业指标等等。这也会产生“拎得清”的员工来完成这些工作。除此之外，公司和店内的管理制度安排还给小黑这样的人开放了上升的通道，这让他们乐意为麦当劳努力干活、参与培训。事实上这些培训获得最终也让小黑受益。小黑个人的访谈经历也十分有趣，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在麦当劳两次出道并升职，最终跳槽到哈根达斯的经理之位。如此种种，我们可以发现“麦工”在当时上海具有特别的本土语境。这些“麦工”的地位受益于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他们又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意义世界和地方性知识。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小黑这样充满活力的个体，这更丰富了“麦工”的形象。可以看到麦当劳对于不同地区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人群的符号意义是迥然不同的(Watson 1997: 38)。麦当劳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朝气蓬勃的东方都市语境中,已经成功地重新定义了“麦工”一词，与西方话语中“麦工”一词影射的令人反感的工作环境确有天壤之别。

潘老师回到了方法论的问题。首先在调查初期，由于时间和条件有限，他们采取了快速研究法（Rapid Research Method, RRM），通过将目标人群分组访谈并访问特定区域的方式高效获取信息。在随后时间和条件相对改善后，他们采用改善过的参与式观察——随行观察（shadowing），利用到影视人类学的摄像手段进行一天的实录，用这种方式弥补由于无法采用传统的参与式观察带来的不足。小黑在访谈片段中的谈吐确实就像是“血液里流的是番茄酱”。第二，在店内的考察，潘老师指出应该特别注意作为数据的“文化”。除了注意包含特殊的手势和不同的语言，还应该注意企业文化理想文化（Ideal Culture）与实际文化（Real Culture）的差别。比如研究中发现为了应对公司定期的门店巡视检查，门店之间会互通消息，将厨房打扫的一尘不染，在检查当天还会派上全店最优秀的员工组应付。在实践中，以标准化为特征的管理制度与运营程序，时时刻刻都受到门店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调整”与“修正”。这种貌似“违规操作”的本质，是变僵硬为灵活的策略，使“麦工”世界充满生气和活力，是一个缩影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光鲜纷杂的场域。

相关文献:

Barber, Benjamin. *Jihad vs. McWorld: Terrorism's challenge to democracy*. Ballantine Books, 2010.

Coupland, Douglas. "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 *Teacher: The National Education Magazine* Oct 2007 (2007): 59.

Johnson, Ann Lewis. 1991. *Fast Food Women*. Whitesburg, KY: Appalshop Film & Video

潘天舒, 洪浩瀚. 上海 “麦工” 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基于田野体验的视角与洞见 [J]. *社会*, 2011, 31(5): 93-113.

人类学想象中的“魔都”： 上海都市田野研究的三条路径¹⁸

潘老师将上海的“魔都”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分为三个分支，包括世界人类学、商业和技术人类学以及医学人类学。结合这三种方法，潘老师对上海的历史和当代进行调查，其中涉及邻里文化的兴衰、现代上海人生活的消费主义崛起以及社会的医疗化、及是对老龄化社会的护理。

潘老师从他的博士论文《邻里上海》一个跨学科视角下的城市民族志为开始，该专著通过各种系列的档案研究、口述历史、参与式观察和重点访谈（分析），放弃了普通的社区研究范式，而是将上海的历史挖掘和现代考察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以确保其基于数据的社会学想象的多样性和有效性。通过对女性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访谈和现场实地研究，潘老师认为，上海的现代怀旧不是对真实过去的表述，而是由现代文艺青年和时尚追逐者编造的当代序幕，作为未发现的过去的一种象征。

通过这个基础性的观点，潘老师继而融合了迈克尔·赫兹菲尔德在其 1991 年著作中提到的丰碑性时间和社会性时间。丰碑性时间是一种净化公共记忆的形式，而真正重要的是社会性时间，它常常被丰碑性时间所掩盖。但是社会性时间才是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和媒介集中了人们的无数生活。石库门地区的大规模土绅化就是这种被丰碑性时间所掩盖的标志。如同这个饱和的社会符号一般的地区，由于分享该地区集体记忆的老人的死亡和离开而失去了它的历史：如与上只角和下只角相关的优越性/劣等性。田子坊和石库门等地方已经成为商业化的场所，其统一的外墙向公众展示了国际大都市上海的现代化进程。

然后，潘老师转向商业和技术人类学的角度，提到他过去与英特尔和微软中国进行的人类学的研究合作。通过与哈佛大学约翰·沃森教授在这些项目上的合作，潘老师开发了“中国市场的文化活力”国际课程，为学生提供了深入研究市场、消费主义、企业家精神和产品等主题的机会。

最后，潘老师通过他最新的焦点医学人类学来观察上海社会。随着哈佛大学-复旦大学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的成立，复旦大学的教师们在一些领域进行了不可忽视的研究，如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污名化、破坏性公共卫生事件（禽流感 and Covid-19）、老年病的可容纳性，以及为来自华盛顿大学医学预科的交换学生提供的相关医学人类学暑期课程。以 Arthur Kleinman 教授的护理范式为基础，潘老师希望继续他的研究方向，不仅为中国老年

¹⁸ 本讲纪要由王永飞完成。

护理提供理论框架，并且开发实际应用，使社会上的老年人能够受益。

相关文献：

Herzfeld, Michael. *A place in history: social and monumental time in a Cretan tow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an, Tianshu. *Neighborhood Shanghai: Community Building in Five Mile 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02.

潘天舒. 全球化和地方转型时代的都市商业人类学——田野凝视焦点的变移和学科想象[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2)：103.

潘天舒，张乐天. 流行病瘟疫与集体生存意识——关于海宁地区应对禽流感威胁的文化人类学考察[J]. 社会，2007，27(4)：34-47.

朱剑峰. 《医学人类学十二论》.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

应用人类学视角中的适老科技日常化实践： 有关上海杨浦区 Y 街道 G 新村“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的田野考察和思考

“适老科技”一直是潘天舒老师格外关注的话题，在引言中他向我们介绍了对这一话题几个层面的缘起。第一是他授业恩师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长期深耕于医学人类学并且成果颇丰，这对于潘老师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凯博文教授也在中国和“适老科技”的项目密切相关，协助创立了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门为设计老人福祉科技并及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潘老师介绍自己几乎密切参与到这个项目中，问题意识也长期聚焦于此。第二是立足于人类学，潘老师指出人类学可以提供不同于社会学研究的洞见来共同促进社会福利的进步。人类学是以田野民族志为核心的深度观察作为主要的方法，可以对社区进行深度的、文化意义、涉及亲属关系（kinship）的研究来得到理论或定量所略过或忽视的观察。其特征会在接下来的案例中得到很好地展示。

近年来，在上海老旧社区内建造外置电梯来改善生活设施和方便照护老年居民，正在成为适老科技日常化话语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悬空老人”以及其所直接对应的电梯改装的问题都在十年内有不少的讨论。但是潘老师指出如果立足应用人类学，其他学科在电梯改装问题上的研究往往不能实际地处理个案，也无法得到具体的方案，仅仅徘徊在对于政策的解读或者“加装电梯”本身优劣的评判。这些成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而这个课题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切实地提供促动街道各户同意“加装电梯”的思考与方案；而作为课题的第一步，他和学生决定只重点研究成功的例子。所以这个课题力图聚焦在上海杨浦区 Y 街道 G 新村住宅外设电梯的加装和使用过程（2018 年 1 月至今），对这一科技助老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进行田野观察和思考，同时以“电梯”这一寻常的技术装置为棱镜，透视都市“士绅化”背景下老旧小区内邻里关系重构过程中道义互惠准则的多重意涵，进而探讨个体策略与制度化力量之间在事件进程中的互动模式。

以人类学的视角，潘老师指出本课题研究之初试图回答的四个问题。第一，除去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和机制，小区外置电梯对于不同“层次”的居民有何不同的意义？第二，电梯的出现在何种程度上对社区居民的人际互动和关系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三，在电梯的整个装修过程中，个体能动性的作用和局限是什么？第四，这一事件是如何展示出适老科技的道

义和社会属性？

接下来潘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田野地点的情况：上海杨浦区东北 Y 街道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的用于市政配套的住宅基地（工人新村），时任市长朱镕基称之为“挺进中原”。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杨浦、虹口、黄浦、南市等区重大市政项目动迁居民陆续迁入街道，社区人口规模已近 30 万。其中 60 周岁以上的居民占 42.6%，老龄化程度相对严重。Y 街道 G 小区的一栋 6 层（一层双户）楼房，于 1998 年建成。其中 9 个单元有常住老人（3/4）。可以看到在小区内装设外置电梯以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已经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民生工程。而作为调查地点的楼房现状是 2018 年 1 月该楼外置电梯建成并开始日常使用。2019 年 1 月 26 日因设备检测使用期限过期暂停使用。4 月恢复运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老龄老严重的小区加装电梯的成功案例。

对此潘老师特地播放了“新闻坊”一条报道这栋楼房“老房装新‘梯’”的新闻。在采访中可以看到一篇呼声和赞同，也有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的三楼住户，先生特地强调电梯与他的利好没有特别强的关系，主要为了帮助顶楼的老人。在播放结束后，潘老师指出这则新闻受限于“采访”作为方法，展现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这是方法本身带来的局限。

详细来讲，经过人类学深度访谈，潘老师指出我们很容易发现新闻中完全忽略了此次改装行动中出力最大的人——楼房 601 户主 D 先生。他几乎承担了发起和联络的一切工作。而三楼侃侃而谈的住户则曾经是阻拦者之一。而在装梯仪式开启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似乎各取所需，回到了和谐的状态。但这个情境，尤其是新闻展现出的那个断面，则不能反映整个协调的过程。

从访谈来看，每个楼层几乎都需要 D 先生的软磨硬泡，使出各种技巧，最终 D 先生还摸索出了一套“实用”法则，“五大步”：

1. 楼内住户 100%同意，在协议书上“按手印”；
2. 小区居民 2/3 同意。为了抓紧时间，他“看见人家家里灯亮了就跑”，“送了很多印着非卖品的香烟”（他退休前单位是上海烟草公司）；
3. 找电梯公司，“三菱和西门子品牌选择”，“其实不是复杂工程”；
4. 分账，“一定集中签合同，收钱”；
5. 街道房办盖章，“碰到机构改革，是网格办代帮我盖的章”。

而对于每户住户，最终通过访谈和梳理，研究者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过程关系：

	“拍胸脯阶段”	中期阶段	暂时停运阶段
101	初不同意，后被D发动退休前的车间书记说服	与201结盟，经济补贴后不响	
102	同意	与201结盟，经济补贴后不响	
201	不同意	上访户，40岁，车位事件	不平等条约事件
202	同意	60岁，与201结盟，但未上访	
301	同意	老公答应后，老婆反悔，但被D说服	上访，要求街道解决停运问题
302	同意	兰州人，非常好，客客气气，打钱爽快，甚至愿意帮对面付钱	
401	不出钱，选择不使用，但同意	签字非常爽快	
402	把有关文件带回家的人	街道市政科科长。分配方案和国家文件都说他拿来的，但是由于儿媳二胎原因不住这里，居委会调解后付款，甚至找街道书记出面要求打折	
501	同意	几千几千打钱	
502	同意	不爽快，居委调解	
601	发起人		“罢工”（被误解为摆担子）
602	同意	女婿不愿付钱，而后被D说服	

如果将每一个住户和 D 先生谈判的过程加以研究，可以得到丰富的分析资源，并可以加以理论关照。包括 D 先生自己我们就不得不关注其自身极为窘迫的电梯需求，照护老人的责任重大，每天都要背老人上下楼。他和其他业主的协商，在潘老师看来基本符合政治人类学者 Bailey 对于个体行动者的描述和定位：

个体不是被制度化框架所控制的傀儡，而是处在竞争和战斗状态中活跃和主动的行动者。同样社会结构也远非固化不变的一统体，而是一个始终被人际互动造就的联盟、合作和冲突所型塑的灵活实体。

这个是针对上海政府颁布的看上去极具推动力的文件“833 号文件”，以及其提供的补贴而言，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社区强人的推动，其实这个计划很难达到效果。在 D 先生逐层推进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具体的利益交换以及社会资源的冲突，例如交换停车位、又或者双方都调用警察局的资源互相使绊子。再以贝利的理论来说，实用法则比规范法则更加贴近人们实际行为模式。这就使得抽象地谈论政策的研究失之于空中楼阁。

本研究如果进一步地总结，那么首先这个案例充分展示“适老科技”的道德和社会属性（Kleinman）的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电梯”作为一个普通的机械设备，在日常实践中具备一种“物品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被使用者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第二，回到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在不同的情境中做类似的研究必须采用不同的研究路径、方法和手段。对参与式观察法进行变通，设计出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案。同时研究者必须避免做过多的理论预设，比如“技术决定论”或“STS”或“居民自治”等等。

辑三：研究方法专题

人类学与统计学¹⁹

Lewis, Herbert S. "Franz Boas: Boon or Bane?."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37.2-3 (2008): 169-200.

Xie, Yu. "Franz Boas and statistics." *Annals of Scholarship* 5 (1988): 269-296.

Camic, Charles., & Xie, Yu. "The statistical turn 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890 to 191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4): 773-805.

前段时间，听一位人类学学生调侃政治学界的现状。这位朋友曾经对社科领域的量化趋势感到万分抵触，如今却俨然已是一副无可奈何、见怪不怪的样子。他嘲笑道，他们系里竟然还有教授分享《纽约客》的文章，说现在的政治科学研究者缺乏历史思维，简直是小题大做。朋友忍不住苦笑，认为政治学界现在别说历史方法，连质性研究都奄奄一息了。他听说有人连所研究国家的基本史实都不知道，就纯靠写代码跑模型搞计量，拿到博士学位，文章还发得挺快。照他看来，社会学目前还算是勉强维持着定量/定性的对峙，但迟早也要向政治学看齐，不然可能像人类学和纯人文学科一样陷入困境。

这样想也许有点悲观，但扪心自问，我能感受到自己和身边的人有时对数据与统计得出的结果存在某种“不由自主”的方法论迷恋。在日常争论中，我们会习惯性地搬出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凭空捏造，也要冠以“统计分析说明”。抛开“发文章”等功利目的不谈（尽管很关键），身边深谙定量方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总是说，统计得出的数据终究是“无谬”的。运用定性方法对某个问题进行演绎分析，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错误，但很难被称为“正确”，因为不同的学者也可以提出不一样的观点，只要言之有理即可。而统计学家所做的，是“收集数据、分析数据，从而得到有用信息”，抽样等过程遇到的误差，已经包含在统计学的前提假设中；而最后一步“得到有用信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淡化——拿到数据结果后，定量学者小心谨慎地依照相关性提出带有假设意味的推论。

在印象里，人类学家似乎总是站在统计学家的反面。面对统计得出的数据，人类学家更感兴趣实际发生的过程——假如研究失业，人类学家不会坐在电脑前跑代码，而会实地观察失业者与就业者的状况。统计学的“无谬”往往被诟病，带有前提假设的、由负责任的统计学家得出的数据固然不会骗人，但也很难帮助我们准确理解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更常见的，则是类似学科偏见的控诉：科学主义的统计学缺乏人文精神。

¹⁹ 作者：王友

然而，回顾历史，人类学与统计学有过一段携手合作的时光。以下三篇文章，从剖析“美国人类学之父” 弗朗兹·博厄斯的生平开始，再到博厄斯与统计学的渊源，最后是以人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在一段时间的统计学转向。通过这三篇文章，我们或许可以放下学科成见。科学与人文并非那样泾渭分明，统计学方法对定性研究者而言不是洪水猛兽。

弗朗兹·博厄斯：功与过

文献来源：Lewis, Herbert S. "Franz Boas: Boon or Bane?."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37.2-3 (2008): 169-200.

作者简介：Herbert S. Lewis, Professor Emeritus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弗朗兹·博厄斯这个名字对每一个人类学者而言都不会陌生。作为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几乎以一己之力形塑了人类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在这篇文章中，Herbert S. Lewis 从人物传记和回忆录入手，寻找博厄斯的经历、背景、思想倾向乃至生活点滴，与他对学科产生的影响之间的联系。Lewis 认为，正是由于博厄斯个人对人类学的影响如此之大，就更应该注意，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什么个人因素影响了他对学科的贡献。具体而言，作者考察了博厄斯的个性、经历、道德立场，博厄斯所受到的女性的影响，以及博厄斯早年的科学训练背景。

博厄斯对人类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否定了族裔决定论和文化进化论（社会发展理论），不能通过文化和社会形式的差异认为种族间存在身体机能和智力水平上的优劣，也不能因为差异认为文明间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他认为所谓族裔优劣和社会演化阶段的论调是基于的证据并不充分，于是提倡历史特殊论，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详尽描述这些所谓“落后”族群社会的真实状况。他提出人类学的研究核心是“文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独特的历史，因此不存在文化的高低，只有以自己文化为中心评价其他文化才会得出“先进与落后”，或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结论，而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道德观，人们不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用现在的话讲，不仅评判种族优劣是一种歧视，肆意评价不同文明的发展阶段也是一种歧视。当认为存在普遍的标准时，就已经潜在地将自身作为中心了；当认为存在发展阶段时，就已经默认了文明存在优劣。由此，博厄斯开创了文化相对主义

的研究思路。

我们需要看到，博厄斯作出以上论断，很大程度上受个人道德的影响。毕竟同时代的博物学家们，在面对几乎相同的证据时，大多得出“人种间确实存在优劣”的结论，由此走向了优生学。作者整理文献发现，博厄斯私下里是一个富有同理心和责任心的人，关怀弱势群体，志在为全人类福祉做出贡献。他还是一位激进左派，交好的朋友、学生与家人也都是革命支持者。根据他的传记，博厄斯支持 1848 年革命，并结交了一大批同情革命的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厄斯本就抱有族裔平等的主张，尊重他者的文化，进而搜集支持他观点的证据，并认为优生学倡导者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可以想象，如果将博厄斯换成别人，研究的结论会截然不同，毕竟“种族优劣说的证据不充分”的推断客观上说也是一种模糊的推论；“证据不充分”的观点也是基于相同的证据。在作者看来，博厄斯强烈的道德动机几乎决定了他研究的导向，甚至是整个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立场。不过，道德立场在科学研究中过于突出的角色也为博厄斯在后世遭到批评埋下隐患。后现代与后殖民学者认为博厄斯“好心没好报”，他虽然通过生物统计学方法证明，所谓野蛮人的心智并不劣于文明人，但他“将人作为生物学研究对象”这一行为本身就存在道德风险，开启了将原始人降格为“物”的潘多拉魔盒。另外，在某些学者看来，博厄斯所提倡的历史特殊论，为狭隘的国族主义叙事提供了依据，历史特殊论其实是泛化的族裔中心主义，它虽然要求我们尊重他者的文化，却暗示了他者文化相对于自身的中心地位。有时候，一味的“特殊”并不是道德的，比如对最近热议的人口贩卖议题，美国人类学家任思梅（Johanna Ransmeier）就认为，中国的人口贩卖是儒家等级文化的随附物，只有强有力的文化异见才能真正介入人口交易机制。

博厄斯与女性的关系，影响了人类学学科中女性的地位。博厄斯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课程上有不少女性学生，这在当时可谓是奇观；在美国人类学学科建立初期，女性学者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一点也是很难想象的。博厄斯培养了包括米德、本尼迪克特等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人类学家，他与女性学者合作融洽，并没有像当时社会主流观念一样认为女性“缺乏理性”、“歇斯底里”。但是从披露的书信中，作者发现，在一开始，博厄斯也为自己课上女性过多发过牢骚，觉得这会让人认为“缺乏严肃”。然而，博厄斯的母亲和姐妹都是女权主义者，她们让博厄斯学会欣赏女性的才华。博厄斯本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是在家人的不断影响下，以及与女性学生不断相处中，渐渐有了女权主义倾向，并最终由衷地感叹“我班上最出色的学生都是女性”。这也深刻影响了人类学学科的性别格

局，女性在其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学科。这一影响延续至今。

最后，Lewis 发掘了作为科学家的博厄斯。在当时，科学与人文的边界十分明确，传统的法学、哲学、古典学甚至古典社会学都属于“纯文科”的范畴，唯有运用了数学与科学方法的自然科学才能被称为“科学”。博厄斯早年研习数学与物理，写过地理学论文。科学训练使他能够并选择运用数理方法论证自己的结论，使自己的研究在当时的语境下能被称为一门“合法”的科学。

弗朗兹·博厄斯与统计学

文献来源：Xie, Yu. "Franz Boas and statistics." *Annals of Scholarship* 5 (1988): 269-296.

作者简介：谢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谢宇认为，正是统计学帮助博厄斯把他的人类学与其他博物学区分开来，使之从探险家的娱乐爱好上升为一门科学。

前文提到过，博厄斯反对针对其他部落文明过度的演绎推理，因为这样得出的所有解读都是基于仍不充分的资料。因此，人类学者的任务应该是详细地记录和描述“文化”，运用历史学方法，将文化与现象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但这样一来，人类学家的工作与其他研究动植物的博物学家没有区别。博厄斯尽管反对站不住脚的推理，却也不满足于做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他仍然希望研究文化的深层模式，像社会学那样，研究部落作为一个“群体”的种种现象。

博厄斯面临一个窘境：要么过于保守，仅仅停留在经验收集上；要么过分大胆，通过当时人文学科惯用的定性与演绎归纳法，推出多年观察得出的结论——原始人与现代人的差异是文化现象而非生物学现象——但会在当时盛行的以科学为支撑的“科学种族主义”面前站不住脚。

于是，博厄斯想到了统计学。他通过统计学论证他的假说，给了自然科学界一个“说法”。有别于同时代的大多数统计学家，博厄斯着眼于群体的“差异”，而非“平均”。早在研究儿童生长发育问题时，博厄斯就以“差异”的观点修正了传统的误差分布模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同一年龄段儿童的生长状况分布与正态分布一致，以均值为轴左右对称。但是收集的数据表明，有些年龄段的儿童生长程度分布曲线并不满足规则的正态分布，出现了明显的左倾或右倾。博厄斯发现，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生长速率不同，因此有些年龄段的儿童体重超过均值的偏多，有些则偏少。回到遗传学，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子辈的性状是父母双方性状的中和，但是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推翻了这个观点，认为子辈性状是

父母双方两种性状随机的显性表达。

博厄斯认同孟德尔，并认为人类遗传也是如此。他研究了父母差异大的子女与父母差异小的子女。根据中和的观点，当父母的“平均”相似时，其差异不影响子女性状的表达，因为他们中和出来的性状是相似的。然而事实证明，父母性状差异越大，其子女性状差异也越大。两者具有的一定相关性也否认了人类的遗传中所谓中和与“平均”的观点。更进一步，博厄斯借此强调人类群体内部的多样性，认为虽然不同族裔的“平均”不同，但族裔内部的“差异”却是巨大的，其多样性无疑质疑了优生学将族裔强行划分并评判强弱做法——由于超乎想象的多样性的存在，比白人“优秀”的黑人比比皆是。不同于道德家与文人的诡辩，博厄斯完全用的是科学；他用统计得出的结论，告诉当时的人，仅仅凭借族裔评价一个人的优劣，是完全不公平的。

然而，他所用的统计学方法以及结论还是受到了皮尔逊等人的鄙视。皮尔逊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统计学家，被誉为现代统计之父，本身也是做生物统计出身。他百般攻击博厄斯，称其运用的统计学要么是“拙劣的模仿”，要么是对他已有成果的抄袭。同样受到攻击的还有博厄斯的结论，同样是运用统计方法，博厄斯证伪了种族优劣，而皮尔逊等人则证明了这个假设，由此走向优生学。其实，道德立场对研究者的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同样的方法与问题，在不同研究者手中竟会导向截然相反的结论。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皮尔逊在学术生涯后期经常恶意攻击与他意见相左的学者，其中不乏后来具有奠基地位的统计学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做人类学家，博厄斯也能凭借他极富开创性与想象力的洞见，在统计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在上学期的概统课上，有一次听老师戏谑道，假设检验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以我们所学的 Neyman-Pearson 原则为例，这一原则要求在降低第一类错误概率的前提下，才能尽可能降低第二类错误概率。第一类错误否定原假设，而第二类错误否定备择假设，也就是说，原假设比备择假设具有更高的地位，面对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存疑的情况下，宁可拒绝备择假设，也不能轻易拒绝原假设。倘若将这一结构运用在博厄斯与皮尔逊的例子，可以看到，在层层数据和原则背后，统计学家仍然要面对道德与立场的抉择。博厄斯用的科学，仍然是“道德的”科学，因为“证据不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证明，也可以用来证伪。这也启示我们，或许人类学家没有必要“故作”价值中立，因为即使表面上不说，像博厄斯那样冠以客观的科学，价值的偏向也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在田野的询问中、观察时的眼神中，以及书写的字里行间中。

美国社会科学的统计学转向：哥伦比亚大学，1890-1915

文献来源：Camic, Charles., & Xie, Yu. "The statistical turn 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890 to 191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4): 773-805.

作者简介：Charles Michael Camic, Lorraine H. Morto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谢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以 1890 年到 1915 年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例，探讨了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科学的统计学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弗朗兹·博厄斯就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开创了美国的人类学。Camic 和谢宇认为，美国人类学学科的建立与统计学有紧密联系。

作者考察科学社会学文献、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史，发现在世纪之交的哥伦比亚大学，多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创始人都将统计学引入了自己的学科中，从此统计学便开始广泛应用在社会科学中。对于博厄斯与人类学，作者从本地学术机构和跨学科关系两个角度，论述统计学作为新学科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对解决新来者困境（newcomer's dilemma）产生的作用。

作者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会面临所谓“新来者困境”。一方面，人类学必须证明自身方法与科学方法的一致性，从而满足得以成为一个学科的标准；另一方面，人类学必须有某些独有的创新之处，能让它与其他学科区分开，真正成为“新兴”的。一个领域中的新来者往往面临这样的处境，在创新与离经叛道间寻找平衡。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弗朗兹引入在欧洲已得到初步发展的统计学，作为新兴人类学的边界对象，使其与其他科学或博物学区分开的同时，被赋予作为科学的正当性。正因为严谨的定量研究在当时被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依据，人类学借助与统计学的交叉，在美国高校掀起科教热潮的世纪之交，成功站稳了脚跟。另外，本地学术机构的推动在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世纪之交的高校学术界与现在有很大区别。由于美国的研究型院校刚刚起步，加之学术交流没有如今这么频繁，学科建设缺乏统一标准，很多大学拥有自己独有的学科，甚至成为某个学科唯一的教授点。各大高校间存在竞争，博厄斯将统计学引入到人类学研究教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对此大力支持，因为以统计和数据为代表的定量方法赋予了学科科学正当性。而在自然科学备受推崇的世纪之交，运用类似自然科学方法的社会科学也同样受人称道，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创新，学校便认为借此能够提升自身竞争力。最后，在学校推动、各学

科互相借鉴、学生传承的过程中，美国的新兴的社会科学，以统计学转向的形式，逐步向“科学”靠近。社会科学的这种发展模式逐步形成潮流，作为最大程度通用（实验法在社会研究中没有统计通用）的自然科学方法，统计学被社会科学吸纳，而社会科学借统计正当化自身。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到，当方法、研究上升为一门学科时，奠基者的秉性也许会对学科基调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博厄斯形塑人类学的同时，皮尔逊等人也在形塑着统计学。当人类学家讨厌统计的时候，他们讨厌的也许并不是作为方法的统计本身，而是那种在人类学看来带有冷漠、自负特质的，作为学科的统计学。换言之，这样一种不那么友善的文化意象被统计方法与定量工具继承下来，运用它仿佛就在忍受科学主义的冰冷和居高临下、族裔中心主义的霸道。但是，尽管有寻求认可的嫌疑，博厄斯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研究者不能再局限于某一种方法了。正如博厄斯运用统计方法论证自己的假设，如今的人类学家也需要统计学，量化方法即使不能提供问题的最终答案，也能帮助研究者发现问题，进一步作出假设。

作为实践的参与式观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s a Praxis²⁰

专题简介：在人类学研究中，参与式观察始终是一个魅力与挑战并存的过程，而本专题的两篇文章在为读者阐明参与式观察的本质、核心与重要特征之外，亦为人类学的学习者提出了关乎学术和生活的思考议题。

5.1 民族志？参与式观察，一种潜在的变革性实践

文章来源：Shah, Alpa. 2017. “Ethnograph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 Praxi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7(1): 45-59.

文章简介：人类学家 Tim Ingold 在 2014 年的一篇文章中直言：“民族志到此为止了！”(That’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 而本文作者 Alpa Shah 则认为，民族志的变革性潜力尚未得到足够认识，遑论发挥殆尽。她呼吁摒弃学科分界的争论，转而着眼于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所能够为总体的知识生产、以及实质社会变革带来的机遇。因为没有哪一种实践像参与式观察那样深嵌在他者的整个生活世界中，并时刻推动人们去质疑、反思、更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假设和认识、挑战霸权观念、更好地为人。

作者首先指出了民族志研究在当下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当非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乃至市场调查公司）讨论民族志研究时，他们口中的民族志往往并不具备人类学民族志的潜力。尽管同样不乏杰出的例外，但对于民族志大量的草率运用无法使其发挥出不同于寻常质性研究的作用。此外，在人类学内部，过度学科化、“自娱自乐”的内倾趋势同样也抑制了民族志研究的潜力。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究其根本是研究者没能认识到民族志作为一种实践的重要性和严谨性。

与此同时，这些问题又因为学术机构讲求效率的风气而变得更加严重：民族志研究常常因为耗时耗力而被问询其必要性，更无需提及在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一种“开放式结局”的、无法承诺确定研究结果的研究方式会更加饱受质疑。这样的情况往往出现在人类学家跨学科合作的过程中，而人类学家在压力下通常会做出形式上的妥协，例如在研究开始阶段给

²⁰ 作者：王若瑛

出研究计划、研究问题甚至研究假设，而这实际上对于研究本身并无裨益，反倒造成资源和精力的浪费。作者认为，鉴于上述问题，Ingold 对于民族志研究“到此为止”的判断无疑是富有见地的。她也指出，人类学家不能一味妥协，而须通过批判和自我批判来清楚认识到民族志是什么、如何做、民族志又为何重要。

一、参与式观察：是什么？何以具有变革性？

作者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争论民族志的归属权（即应属于哪个学科）、或是指责部分学者假借民族志之名所做的非民族志研究是毫无意义的，需要看到的是民族志本身的力量。由此，作者接着通过对民族志之核心——参与式观察的分析来展开论述。她指出，参与式观察之所以具有潜在的变革性是因为：

1. 通过参与式观察，人类学家能够尽可能地深入他人生活、成为他者的一部分，这使得他们不断质疑自己已经建立的、关于世界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认识，并挖掘崭新的思考、观察和行动方式。这种根本性的挑战和质疑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为参与式观察强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知识交换（平等性，democracy），且十分关注研究对象生活不同维度的交织（整全性，totality）。

作者提到，人类学常常被指摘其只能够提供详尽的描述和众多的案例研究，却无法超越地方性知识（localized knowledge）的限制，但这一论断忽视了人类学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人类学通过深入而整全的参与式观察所能够获取的恰恰是质疑现有的一般性理论命题的可能性。接下来，作者通过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和詹姆斯·C·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两个民族志案例来说明，深入而全面的参与式观察如何能够达成一般性的理论命题。她强调，她所引述的两个民族志案例都不是来自于人类学领域，这恰能够说明她前述的观点，即相比学科标签，更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式观察对于整体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

在《学做工》中，威利斯通过在参与式观察中得到的材料对以往的理论取向进行了批判，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女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封闭性或是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而失去了阶级跃升的机会，而是通过主动学习发展出了独特的反主流文化，并无意中促进了阶级固化和分层模式的再生产。在《弱者的武器》中，斯科特则通过长达 18 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发现马来西亚的农民并没有像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所说的那样针对资本家展开大规模的抵抗活动，而是通过日常行为中的懈怠、说谎、纵火、偷窃等不易被当权者察觉的行为来实现

反抗的目的。这两个民族志案例都很好地说明了参与式观察对于既有理论的变革性，或者用威利斯的话来说，一种外在于初始框架的、令人惊奇的可能性。作者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则在于，参与式观察作为一种通过存在（being）和行动（action）来生产知识的形式，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一种辩证关系：理论在行动中被生产出来，而行动本身又是对于理论的践行和实现。

也正是通过与陌生群体之生活的紧密接触和长期参与，以及对于人类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多维度、交叉性考察，人类学家才得以意识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论理解实质上是被自身特定的历史、社会和空间位置所形塑的。这意味着，人类学家在参与式观察的推动下，将不得不长期处于一个自我质疑的过程中，而其本身的世界观和理论假设也将在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修正中不断变化。当我们认识到参与式观察的这种变革性力量，我们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人类学家初入田野时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常常会在田野考察进行的过程中被大幅修改、乃至彻底否定了。作者认为，这种开放性也恰是人类学的独特魅力：它为过去被视作正常、理所当然的事物蒙上一层怪异的色彩，却又使得那些看似奇特的事物成为一种新规范的基础。

这个过程也正是新理论诞生的过程。作者指出，理论是无法独属于某个特定学科的，而那些试图理论贴上学科标签的尝试亦属多余：尽管知识的生产往往依托于某个学科领域或制度框架，但是知识本身不应为学科边界所限。作者认为，参与式观察能够为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提供理论主张，也能够从不同学科中汲取理论资源，这种跨学科属性至关重要。

2. 通过重视他人的生活，人类学家能够在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认识到历史、意识形态和行动之间的关联，这不仅有利于理解事物为何维持原样，更有利于理解革命性的社会变迁背后的动力和权威。

作者指出，参与式观察之所以具有变革性力量，是因为它着眼于历史，以及人类行动对于历史的塑造，其核心是对于“何以为人”的洞察，即将人视作处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特殊物质和意识形态历史的继承者。因此，参与式观察中的人类学家必须看到作为时空和历史延续的人背后的结构与过程，只有在这种洞察的基础上，人类学家才能够激发出参与式观察的诸多潜力，并以此生产新的知识、挑战主流理论、改造人的意识与行动，乃至改变人类历史的轨迹。

当然，参与式观察固然具有这种联结微观与宏观、以个体行动影响历史过程的巨大潜力，

但在作者看来，这种潜力的发挥受限于当代学者对参与式观察的诸多误解。因此作者接下来将从参与式观察的四个核心维度切入，试图厘清参与式观察的重要意义：

a. 亲密与疏离 (intimacy and estrangement): 参与式观察通常将陌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这并非出于猎奇或是文化相对主义（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这两者在人类学学科初期确实曾是重要的推动力），而是由于“陌生”是人类学提供独特知识的基础：作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熟悉”意味着从某个理论假设出发，最终又回到这个理论假设以证其真伪，而这样的研究思路则已为人类学之外的许多学科所采用，无法激发出人类学民族志的独特潜力。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陌生”与空间距离的大小无关，而仅仅意味着与研究者的存在差异。虽然今天的人类学正不断将目光从“异域”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陌生”对于参与式观察的重要性依然不减，即使是对于“自我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 这一新兴的民族志形式，对于自我的他者化（陌生化）也仍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过程。当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状态并不会、也不应一直持续，因为从事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者多少会同研究对象建立起某种形式的亲近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在学者与伙伴、参与 (involvement) 与脱离 (detachment) 之间存在的张力，则会成为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b. 持续性 (long duration): 深入他人的生活，学会像他人一样行动、感知和思考，这并非易事，因而自然需要长时间的持续投入（通常超过一年，理想的长度是 18 个月以上）。作者认为，只有满足这样的时间投入才有可能了解到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与矛盾，洞悉到那些不被言说的、只通过行动和实践所表达的知识，并发觉人们所言和所行之间的分离 (disjuncture)（用 James Watson 的话来说，即 orthodoxy 和 orthopraxy 之间的差异）。此外，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变化同样也要求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更重要的是，人类学家需要时间来进行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并通过在实践中（部分地）成为他人来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特殊知识。

c. 整体性 (holism): 若想要理解社会生活中某一维度，就无法将这一维度与其他维度割离开来，而需要以一种尽可能整全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生活中不同维度的交织、融合与互塑。这也意味着，人类学家没有必要将自己贴上“政治人类学家”或是“经济人类学家”的标签，因为人类学正是得益于其整体性而获得了超越学科内部边界的洞见。

d. 揭示某一群体的社会关系 (revel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of a group of people): 毫无疑问，参与式观察的理论贡献依赖于对某一人群的深入了解，而在作者看来，这种了解并不会仅仅停留在个别案例的层次，而是引导人们去思考更高层次的人与事物。换言之，人类学固然强调对小范围人群的深度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就这样将自身限制在了一个个田野

和散点式的知识体系中内：恰恰相反，参与式观察从来就不拘于一个有限的田野场所，而是不可避免地将研究者带离所在的田野，去探索不同时空、不同人群、不同过程对于该田野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参与式观察都是“多点”(multi-sited)的(这与 George Marcus 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没有一块田野是真正独立自足的。

二、参与式观察的风险与局限

参与式观察固然充满变革的潜能，却也使其实践变得困难重重、充满挑战。作者借用了—个相当通俗的比喻，将深入他人生活、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过程比作“下海游泳”，并将实践参与式观察过程中的风险用比喻的方式归纳为以下四点：

a. “无法离岸”：即使在田野中与研究对象相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者也依然可能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而没能真正深入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这一情况的结果是，研究者无法获取任何超出其预设的知识，也无法挑战并超越自身既有的认识，更没有任何真正的理论建树。作者指出，这一问题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显得愈发突出，因为过去人类学家在田野中所面临的物理和心理隔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发达的通讯技术所消弭。这虽然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却也对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产生了干扰，使得研究者更难以同原来的世界有足够程度的脱离，也就更加难以深入到他人的生活世界中去。

b. “无法上岸”：这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即研究者在他人的世界中陷得太深而无法抽身。这可能导致的结果则是，研究者只是就事论事地呈现某一个他者的形象，而没能将这些田野经历与整体的理论体系相整合。尽管这种松散的数据呈现本身无可厚非，但它在实践意义和理论深度上却是有限的，充其量只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素材，而无法在人类学框架内为某些“终极问题”(例如何以为人)的解答作出独特的贡献。

c. “无穷无尽”：这一表达指的是，尽管参与式观察可以无限进行下去，但作为研究者，也需要在恰当的时候结束这个过程，而何时停止、结束之后舍弃哪些内容，这同样需要研究者作出判断和取舍。

d. “参与和观察”：尽管“参与式观察”这一名称将“参与”和“观察”合为一体，但这两者并不总是同时进行的。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于，研究者在多数时候都只是在观察而没有参与，但往往是在参与的过程中，研究者更可能获得独到的见解；然而，一旦研究者真正成为了参与者，全面的观察便也难以维持。

此外，尽管作者在前文中不断强调参与式观察的巨大潜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式观察

就不存在局限性。在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列举了参与式观察在实践层面上的不足：

尽管参与式观察具有变革性潜力，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它不可能完美地适用于所有的田野场景和研究目的。因此，研究者也不应画地为牢，将自己限制在参与式观察这一路径中，而应尽可能地丰富可运用的方法储备，以应对不同的研究情境。举例而言，围绕研究对象展开文献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其历史的理解，而在某些模拟环境（*simulated environments*）中开展研究，也能够对于理解实际的田野情境有所裨益。此外，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包括“实证证据”的收集）也能够使得人类学研究在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乃至争论中具有说服力。

作者还指出，一生中能做到先后两次完全沉浸在同一田野中的人类学家在今天的研究环境下是相当少见的，而在早先的人类学领域内却十分常见。这不仅是由于参与式观察本身就在情感和实践上对研究者、以及研究者的家庭和朋友产生了不小的挑战，也是由于今天的人类学家相比从前而言更难以脱离制度化的学术环境：人类学家往往不再只是学者，而同时扮演系主任、会议主持人、委员会主席等角色。这些职责使得人类学家更难脱离原有的生活世界。在一次完整的参与式观察经历之后，他们无法再以同样的时长和深度回到田野，而是至多能够进行回访，在很多时候甚至连回访也难以做到。但作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暂时性地成为从事文献工作的“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armchair anthropologists*）亦具有宝贵的价值，因为在对于先前学者研究的批判性阅读（*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中，同样能够体现参与式观察所具有的变革性：从一种不同于先前学者的视角和处境来看待相同的研究对象，也能够在挑战自身原有认知的同时对既有的理论作出修补和更新。

作者提出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在于，面对日益效率化的学术环境，研究者应该如何看待、如何践行参与式观察。人类学家在学术生涯早期，往往会在自己和制度所给予的压力下不断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通过不断的（以发表为目的的）写作来证明自己“通过了考验”。这种功利主义的做法在大环境的压力下或许也无可厚非，但作者指出，人类学家不应止步于此，而应当在超越约束的地方以不同方式、通过多种媒介发挥潜力：可以是跨学科交流，可以在公共领域发声，也可以是与应用领域合作。

最后，作者就学术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点警告：她认为，尽管在学术和实践之间建立联结是必要且有益的，但若是在激进的呼声中过于草率匆忙地付诸实践，则会反过来牺牲掉学术所能够提供的特殊价值。因此她认为，人类学在短期内应当暂时搁置实践的热情，而更应重新思考那些被视作“应当实践”之事物的理论前提，而这也正是参与式观察的核心精

神。尽管这在短期内意味着实践热情的消退，但作者相信，更长远来看，这会让人类学家成为更好的实践者。

我想，作者在文中所阐述的种种境遇和展望不仅是已经进入人类学学界的学者所面临的现实，这对于尚且在向学术领域攀登的学习者而言，亦铺展开了一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图景，并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学术抱负和现实压力之间找寻自我定位，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桥梁，又如何热忱和冷静的交替中获得平衡。这些问题虽非纯粹的学术议题，却是每位有志于学术者必须思考的。

5.2 超越方法的民族志：民族志感知的重要性

文章来源：McGranahan, Carole. 2018. "Ethnography Beyond Method: The Importance of an Ethnographic Sensibility." *Sites: A Journal of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15(1): 1-10.

文章简介：这篇短文围绕“民族志感知（ethnographic sensibility）”这一核心概念展开，强调民族志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一种独特的知识，其本身同样也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一类理论、一种写作方式。此外，本文亦是作者对于“民族志到此为止”（“That’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的论断所作出的回应。

作者在开篇指出，如果说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如何集体组织行为、如何生活、如何理解世界，那么民族志就是人类学家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作者认为，诸如“民族志到此为止”的批判在人类学内部并不成立；然而在人类学学科之外，上述批判确实指出了民族志作为一种纯粹研究方法的兴起为民族志带来的困境。但走出这一困境所需要的并不是摆脱民族志，而是更多的“民族志感知”。

那么何为“民族志感知”？作者认为，这种感知即是将民族志视作任何一个文化群体所具有的根基、矛盾、期望、复杂性与可能性。更进一步而言，真正的民族志是一种基于特定文化的、存在于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在本体论的和认识论层面上都有重要意义。此外，民族志所关注的是日常和仪式中的信仰和实践，以及其背后被言说和不被言说的规范与律令。透过民族志感知，我们能够看到人们是怎样共同构建世界、并赋之以意义的。

作者接着从民族志的三个维度来阐述民族志感知的意义：就理论而言，民族志通过关注那些不连贯（disjuncture）、无法被翻译的事物，来挑战那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理论概念，及其背后暗含的特殊文化情境，并以此填补理论体系的缝隙；就方法而言，以参与式观察为核心的方法是实现民族志感知的关键途径；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民族志感知所呈现的是关于某个社群诸现实（realities）的知识。

作者指出，民族志在人类学内部经历了诸多变化，从一种认识人类社会、记录各类习俗、信仰和制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基于田野的、探寻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之整全性的研究方案（programme）。作者认为，正是这种深刻的转向塑造了今日之民族志的诸多特征：民族志不仅是高度沉浸式（immersive）的，也是一个时间密集型（time-intensive）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得一些不被其他研究所察觉到的细节与微义（nuance）能够得到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家与其所研究的社群（或在其周围）共同生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有时候长达数十年（当然，最初的实地考察工作会为未来的不断回访奠定基础）。在这段时间中，人类学家的职业生涯与其个人生活往往紧密交织在一起，因为两者通常在同一个时空内共同进行。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人类学家始终“在场”（being there），并全面参与着其所研究的社群生活，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观察者，而这样的在场也自然有其特殊的规则和责任。

作者也提及，民族志研究往往科技含量较低，因为其所需的用以记录数据的工具不过是纸笔、电脑、手机、相机等设备，以及最重要的，民族志学者本身。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学习和认识都无法由技术手段代替人来操作，而必须全权由民族志学者自己来完成。民族志对于人类整全性的强调则更加使其成为一种艰巨的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民族志研究依靠特定的人际关系作为其知识体系的基础，而民族志研究的“跨界”特性（无论是文化、还是其他结构性的、等级性的界限）则意味着，其所研究的是“另一种”生活世界，关注的是他人真实的生活境遇，而非实验室所能够模拟、预测的情况。这也即是说，民族志的载体是故事，而非数字，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偶然和必然、主观与客观（或者用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所写的那样，民族志的本质是“把握本土人的视角”（to grasp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作者强调，正是现实生活中（有时显得无序）的特殊性能够让我们提出并试图解决一些指向普遍性的问题，这是那些自我应验（self-fulfilling）的抽象真理所无法做到的。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指出，民族志的关键并不在于其所采用的方法或是遵循的程序，而在于一种“智识的尝试”（intellectual effort），它所关心的是人们如何给予世界以意义。如果没有在理论层面上建立对于民族志的重要理解，那

么民族志将会缺失其根本意义（讽刺的是，这种意义也正是民族志试图从其研究对象中找寻的关键），沦为一种简单的描述与观察，而这样的民族志也不过只是一种普通的质性方法。作者认为，人类学之外的学科对于民族志的借用正是因为流于方法而丧失了民族志能够带来的研究潜力，这无疑是十分可惜的。

作者在文末总结道，民族志的核心在于作者所提及的“民族志感知”：这种感知着眼于对真实生活境况的体察，它远远超越某个限定范围的研究问题所能够涵盖的细节；这种感知意味着，对于某种视角的理解唯有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视阈之下方才可能；这种感知要求深度，也要求时间；这种感知是一种理论承诺，也是一种方法实践。她指出，生活是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的杂糅，而民族志作为一种理解人们生活的方式亦是如此；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问与答，因为它所能告诉我们的远比我们能够发问的要来得丰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正是因为民族志的上述特征，它能够给研究者本身带来一种自我转变的可能，使得研究者有机会超越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民族志的最终目的，也正是不断使人类超越自己所设下的“理所当然”的屏障，并不断刷新“何以为人”的认识。这不应仅仅是人类学的使命，亦是全体社会科学所承担的职责，而对于民族志感知的了解与重视，或许能够在学科互鉴的意义上开启一个新的突破口。

在研究方法之前与之后： 对比两本质性研究教科书²¹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H • Russell Bernard & Clarence C. Gravlee.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陈向明.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由 H • Russell Bernard 与 Clarence C. Gravlee 两位学者主编的《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以下简称《手册》）一书集合了诸多学者的观点，汇编为一本深入讨论理论、实践各层面的研究方法手册。

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以下简称《方法》）则是她结合各类专著，独立编撰的一本教科书。她为其书粗略地划分了两类读者：一者试图把握、追溯质性研究的理论沿袭，一者出于实践目的而探讨种种具体操作手段，因而也无意区分了理论与实践部分所在的章节。

两本书都有着相似的章节排布：先谈理论渊源，再接上研究方法的各项程式介绍、指导，最后以发展前景作结。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具体操作，《手册》与《方法》之中的叙述蔚为大观，不再赘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二者所提及的研究方法“之前”的理论渊源与“之后”的研究方法之未来。

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渊源

在《手册》开篇第一章，Michael Schnegg 就率先提出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如何获得“知识”？“知识”限度在哪里？不同范式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各有不同。

社会行为科学和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最基本的区别是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之间的分裂。科学方法通常联系实证主义的不同分支（如逻辑、分析等），而阐释学和后现代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则是当代人本主义的主流。实证主义为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提供了统一的方法论，通过不断观察客观世界构建普遍理论，阐释学是实证主义的竞争框架，试图通过对文本的解释探索其中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理解，后现代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都采用相对论的立场，强调学者对现实构建的主体性、创造力。这三种认识论对其上三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完全相同，

²¹ 作者：李大武

并且拥有比其分类所暗示的更为异构的内部框架。

实证主义建立于休谟与洛克所提出的经验主义之上。经验主义者强调科学知识必须通过研究者的感官所得，而孔德又将这些思想转移至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认为社会比自然更为复杂，建立了独立的社会学学科。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由实证主义转变而来的逻辑经验主义经由维也纳传播至欧美其他地区，建立了更为普遍的分析传统。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只有从经过经验检验的陈述才有意义。归纳、演绎法则正是操作化概念性陈述并将其测量的工具。

人类学中的实证主义不可绕过马林诺夫斯基。在《Argonauts》的引言，他呼吁对观察到的事件做“具体的统计记录”，收集记录种种“当地人的心态”。马林诺夫斯基如何确认自己的陈述、观察是有效的——他在“那里”，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一个经验主义的强大而持久的传统形成了。按照科学范式，改进方法和数据、分析和结果的叙述成为民族志的宗旨。在这一框架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归纳与验证，而人类学家并不质疑“知识”本身的真实与否，他们的任务是记录文化，记录“知识”。

就方法论而言，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写作确立了三个步骤：部落的组织和文化结构必须以固定、清晰的轮廓记录下来；在此框架内，必须通过与当地人密切接触、详细观察来收集实际生活的行为、活动等信息；典型话语、神话等集合需要作为本地心理的背景资料所提供。马林诺夫斯基来说，科学方法的应用，如详细的笔记、表格和图片的展示，是他的方法的核心。在如《Argonauts》等按照科学传统撰写的早期人种学专著中，学者们相信社会现实独立于感知而存在，可以记录下来，而记录的信度与效度就成为此传统下编写民族志的关键问题。

其二是阐释学传统。其起源于古希腊人文学科的古典传统，专注于对历史文本的阐释。欧洲语言学家们在研究时面临着理解和解释特定术语、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难题，尤以翻译文本时为最。要了解整体文本的意义，需要关注部分词句的语义；为了解特定词句的语义，又常需要对文本整体有所理解。这种“阐释学循环”成为了文本解读的基本工具。从 19 世纪末开始，一些德国哲学家将这一方法拓展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一般准则。“阐释学循环”首先是作为一种启发式工具来分析文本的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理解两者的含义。狄尔泰将其转化为一种分析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方法，文本和社会现象因而更普遍地产生了联系。海德格尔及其学生伽达默尔则更进一步，认为任何理解都无法脱离“偏见”（bias），同时也都涉及对“偏见”的审视。他们仍然符合实证主义的某些说法：学者可以描述外面的世

界。然而，重点已经转移到理解人类行为、话语中的意义结构之上。理解通常是指分析特定行为出现的背景，使研究人员能够遵循这一逻辑。

格尔茨是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格尔茨认为，重要的不是人类行为的存在，而是其意义。他主张文化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意义之网，因而对其的研究不是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索意义的解释科学。在这一层面上，人类是意义和意义的创造者，阐释学也成为了分析它们的合适工具。它自观察经验起始，但并不假设所观察到的事物独立于观察者、在场的行为者，乃至此前社会行为的历史。与实证主义解释不同，民族志产生的知识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志学家本人的立场，所以寻求客观可概括的知识主张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与阐释学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知识的来源和获取知识的方式。在阐释学中，“理解”（*verstehen*）为主，意义与符号则是分析的焦点。格尔茨对巴厘岛斗鸡等制度化行为的观察、分析，揭示了巴厘岛文化的深层次方面。在数据收集层面之上，定量技术也因而受到冷遇。不过，尽管如此，实证主义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并未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长期居留、学习本地语言技能、建立融洽关系等等。

根据阐释学的认识论，民族志文本不能与收集信息、完成写作的人类学家相分离，那么民族志写作风格的转变也理所应当。格尔茨的文本详细描述了他与妻子观看巴厘岛斗鸡并被警方抓获、进入“向他们开放”的村庄的过程。一般而言，阐释学学者会提供更多背景层面的信息，包括他们与主要线人的关系、数据收集的背景等等。

其三是激进建构主义。大多数建构主义者认可实证主义依靠感官理解世界的传统，但他们对感官的作用更为悲观，认为研究者不能掌握对现实世界未经感官过滤的看法，永远无法超越自己的感官、思维界限。对于激进的建构主义者而言，寻求知识的过程只是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建构。正如研究者所见，后现代主义者和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研究者无法客观地描述世界。

克利夫·奥德在《*writing culture*》中提出，人类学家倾向于将他们研究的现象同质化，而忽略努尔人、特罗比安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文化内差异。他提出了“部分真理”（*partial truth*）的概念，用以指代这一现象，并进而提出“人种学意义上的真实本质上是局部、不完整的”。因此，人类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与建构主义相联系，指出人们以独特的方式感知世界，研究者无法判断哪个感知更真实，哪个更不真实。

这种判断质疑了人类学家“翻译”其他文化的能力（格尔茨称之为人类学的天赋）。后现代主义批评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念，认为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是有偏见

的。因而，科学只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特权，必须与其他关于世界的故事放在一起。此时，关注的焦点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关于它的科学论述。

后现代主义批评主要关注学者、职业作家及其在构建文化现象中的权威角色。在这一传统下的民族志写作中，便试图分散作者的权力：用多个“声音”进行表述；基于对话表现等等写作实验。作者个人的背景也成为考量的一大因素：作者是否在写他/她本人的文化背景？他/她是否是专业的人类学家？针对两个问题的回答诞生了四种不同组合下的表现形式。

综上，这三种不同的认识论立场讨论了人类学家获取知识与真相的方式差异，这基于同一个问题：研究者能多大程度上感知和描述世界。对实证主义者而言，这个答案相当清楚：研究者可以描述，需要改进科学方法增强信度和效度；阐释主义者认为不能将观察者与信息相分离；而后现代学者则认为，研究者都在构建自己的现实，证明某个观点“真实”与否是无用的。

必须承认，在任何人种学分析中，研究者所面临的信息被“翻译”了无数次，并且包含着不同的偏见。所有信息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偏见。Michael Schnegg 认为，为了超越这一点，人类学家可以借鉴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提出的总体思路，鼓励一种类似于阐释学的方法来理解世界本身与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需要诸多材料：线人及其提供文本；收集文本的环境，包括学者本身；获取文本的感觉与方法；文本生成、分析的特定学术背景。通过比较和交流研究者所做的种种陈述与阐释，并将其与其他感官获得的信息相结合，可以让研究者理解知识结构、感官等等，将其融入到解释中，并最终通过评估偏见来把握它们之外的世界。

所有这些讨论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即知识是经验性构建的。在经验建构中，最重要的分歧是理解与解释。Stegmüller 认为，二者并不是两极区分，与“解释”形成有效对比的是“描述”，而一种更新、更富有成效的方法论正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人类学家通过移情来理解行为者的主观意图，并在更大的语境下，将行为者嵌入在更为包容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解释之中。

在人类学的讨论之中，关于“知识”本质的问题与关于其局限性的问题密切相关。人类学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证明某个文化现象是真实的，并提供更好的理论。因此，研究设计与方法论自然成为关键。Michael Schnegg 认为，通过使用多种数据、感官，确保文本、信息的透明度，反思人类学家和线人在“翻译”和理解中产生的偏见，可以改进研究的信度与效度。这也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反思：研究者试图验证某个陈述的真实性，这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研究

设计和方法。人类学认识论的争论源来已久，而方法论的这一思考将持续而长久地鼓励人类学家，反思知识生产阶段的种种偏见，加强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反思。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

《方法》一书的第一部分为“质的研究的理论背景”，在此，陈向明向研究者揭示了“质的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

质的研究是“一把大伞”，它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有时甚至是反学科的研究领域。（Lincoln, Denzin, 1994）这一纷繁庞杂局面的诞生正是因为其受到很多不同思潮、理论的影响，同时跨越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与近代以来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背景。

有学者认为，其理论基础可以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等四个方面来探究（Guba, Lincoln, 1994）。陈向明同样花费篇幅讨论了上述所提及的理论范式。同时，她借用 Denzin 与 Lincoln 的研究，为质的研究的历史发展做了一番梳理。

传统期（1900-1950）：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研究者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与研究对象间相互隔离，一般情况下，来自发达地区的学者长途跋涉，前往被研究者那陌生、怪异、“原始”的文化中，在千辛万苦后回到自己的文化中，讲述陌生人的故事。

现代住一起（1950-1970）：后实证主义为主导思潮，但各种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层出不穷。研究者们意识到需要从不同角度不断地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来尽可能地逐步接近真理。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们强调规范化、严谨化；在研究内容上，研究者关注某些重要的社会过程与社会问题。

领域模糊期（1970-1986）：这以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地方性知识》为始末。多元的、解释的和开放的角度成为主流，不再存在一个具有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社会科学时代。

表述危机期（1986-1990）：质的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者们进一步感到语言表述中的危机，并对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学者们意识到，两个假设已经成为重要问题：研究者是否可以直接捕捉生活者的经历？在没有标准的后结构时代如何重新思考“效度”“信度”“推论”等概念？

后现代主义期（1990-）：以决定性、稳定性、有序性、均衡性、渐进性、线性关系等现代科学的基本范畴逐渐被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非连续性、断裂、突变等后现代观念所替

代，人的“自我”呈现出零散、原子化和分裂的状态，在这一时期，质的研究更加多元，注重更多领域（特别是少数、劣势）的声音，也使用更加兼容的方法。

这些丰富多彩而相互角力的理论，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带来富有张力的无限发展可能。这一曲折的道路至今仍在不断蜿蜒之中。

也正因其多面、复杂性，陈向明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以一种包含式的态度尽可能使其成立。她为“质的研究”的定义列出了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首先，质的研究产生于自然情境之下，丰富、复杂而流动的自然、社会情境是研究进行之处。在此，对个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才成为可能。这一传统同样包含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整体的、关联的考察。不仅要关注事件当下，也要关注事件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其与其他事件的关系。历史、社会、文化等整体背景知识的获取有助于对事件个体的理解，而其又嵌入社会整体情境，形成上文所述“阐释的循环”。

其次，质的研究的目的在于对被研究者的个体经验和意义建构做解释性理解。这一理解同样基于研究者个人的“前设”与“偏见”而发生，因而研究者不仅要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及其意义建构，更要了解自身如何获得对对方意义的解释、这一解释是否恰当、确切。

第三，研究是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通常采用“即时性策略”，根据某时某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观察与互动。这同样提示研究者，在研究这一长期而动态的过程之中，不同阶段的研究方法、互动策略等都需要研究者进行细致的反省。

第四，从研究的基本思路来看，质的研究主要采用归纳的方法。研究者需要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自下而上的路线，从自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建构理论，并通过“深描”的手法以缜密的细节表现被研究者的文化传统、行为规范、价值观念。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方法下质的研究结果只适用于某一特定情境。

第五，质的研究重视研究关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才使观察、积累、分析、解释文本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研究的伦理道德尤为需要重视。研究者不仅需要与被研究者建立良好关系，也要为其提供的信息做好严格保密，公正而恰当地处理敏感性资料。

对“质的研究”的定义剖析，自然离不开与“量的研究”之定义相联系。

表 1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之对比

	量的研究	质的研究
研究目的	证实普遍情况，预测，寻求共	解释性理解，寻求复杂性，提出

	识	新问题
对知识的定义	情境无涉	由社会文化所建构
价值与事实	分离	密不可分
研究内容	事实, 原因, 影响, 凝固的事物, 变量	故事, 事件, 过程, 意义, 整体探究
研究层面	宏观	微观
研究问题	事先确定	在过程中产生
研究设计	结构性的, 事先确定的, 比较具体	灵活的, 演变的, 比较宽泛
研究手段	数字, 计算, 统计分析	语言, 图像, 描述分析
研究工具	量表, 统计软件, 问卷, 计算机	研究者本人(身份, 前设), 录音机
抽样方法	随机抽样, 样本较大	目的性抽样, 样本较小
研究情境	控制性, 暂时性, 抽象	自然性, 整体性, 具体
收集资料的方法	封闭式问卷, 统计表, 实验, 结构性观察	开放式访谈, 参与观察, 实物分析
资料特点	量化的资料, 可操作的变量, 统计数据	描述性资料, 实地笔记, 当事人引言
分析框架	事先设定, 加以验证	逐步形成
分析方式	演绎法, 量化分析, 收集资料之后	归纳法, 寻找概念和主题, 贯穿全过程
研究结论	概括性, 普适性	独特性, 地域性
结果解释	文化客位, 主客体对立	文化主位, 互为主体
理论假设	在研究之前产生	在研究之后产生
理论来源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理论类型	大理论, 普遍性规范理论	扎根理论, 解释性理论, 观点, 看法
成文方式	抽象, 概括, 客观	描述为主, 研究者的个人反省
作品评价	简洁、明快	杂乱, 深描, 多重声音

效度	固定的检测方法，证实	相关关系，证伪，可信性，严谨
信度	可以重复	不能重复
推广度	可控制，可推广到抽样总体	认同推广，理论推广，积累推广
伦理问题	不受重视	非常重视
研究者	客观的权威	反思的自我，互动的个体
研究者所受训练	理论的，定量统计的	人文的，人类学的，拼接和多面手的
研究者心态	明确	不确定，含糊，多样性
研究关系	相对分离，研究者独立与研究对象	密切接触，相互影响，变化，共情，信任
研究阶段	分明，事先设定	演化，变化，重叠交叉

关于研究层面、研究问题等具体部分笔者有些不同意见，陈向明也为读者们留下一个有所回转的接口：“上面这种将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对立起来的方式可以使研究者更加清楚地看到它们各自的特点；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要注意不要人为地夸大两者之间的区分。”

在确认二者区分之后，自然也会产生一个疑惑：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两种方法结合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两大阵营长期的对垒、论辩之中，是否能孕育出一个“新生之物”？这一大哉问，正是《方法》一书的收尾。在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对垒的过去年间，学界始终关注着二者的异同与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二者分别被认为遵循“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路线，属于“软科学”与“硬科学”。两大阵营间的论战似乎隐含着一个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唯一的质量等级以及一套唯一的衡量标准（Maxwell, 1995）。

因而在论战之外，仍然有许多学者在探讨这一区别是否存在。汉莫斯里（1992）对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之间的七种区别做了一一驳斥；Kidder、Fine（1987）提出二者在“方法”上没有本质区别，而在探究“方式”上有所区分；Erickson（1986）认为使用某种研究“技巧”并不一定形成某种研究“方法”，具体的技巧使用与否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何被使用以及被用来干什么。种种讨论都指出这样一种可能：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是连续统一体，在方法、技巧等层面上都存在相互渗透、融合的情况。

从二者各自具备的长短处来看，结合有其在研究灵活性、综合性与研究成果的信度、效度之上的可行性。但结合的难度也一目了然：研究者是否具备相关能力、精力、研究条件？

不同研究标准下如何评判研究的质量？结合方法的设计也同样被置于重重考量与困惑之间，结合方法如何成其为可能？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结合的愿景固然美好，但彻底消除二者的区分也不是学者们的意图。研究者赞同“综合”的说法，但是研究者同时希望保持两种文化之间的重要区别。与其将研究方法和文化同质化，研究者更加希望看到研究者成为双文化人。（Kidder, Fine, 1987）

所有的方法都属于我们

在 Russell 看来，研究主题范围的扩大带来了越发广泛的研究方法的需求。新方法在特定学科内部不断发展，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人类学研究学者往往是新研究方法的采纳者、适应者，同时也为诸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Eriksen 在《手册》末尾最后一章《Public Anthropology》中介绍了“公共人类学”这一概念。“公共人类学”的起源，正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和“他们”“研究者”“研究对象”这两组对立在当代已经站不住脚了，人类学家冒险进入各个领域，以闻所未闻的方式描述他们的研究主题（Eriksen, 2015）。当代世界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无国界的（Sam Beck, Carl Maida, 2012）。那么，谁可以合法地说什么？他们可以代表谁说？人类学家能为他们研究的社会做些什么？在非常普遍的意义上，人类学研究与所研究的社会和文化世界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在 21 世纪这个无国界的世界里，这些始终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难以回答。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人类学提供了理解世界实际运行方式的有力途径。从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研究中得出的经验教训，自然也可以，甚或是也应该应用于造福人类。因而从广义来看，所有人类学都是公共的。

现在使用的“公共人类学”则指的是该学科中一套特定的实践和立场，旨在超越学院的范围，通过为不同的受众写作，在当地社区从事倡导、导向的工作，亦或是介入关于当代世界的痼疾及其对人类的意义所展开的长期、公开、跨国对话来实现。这一立场坚信，人类学不仅应该作为一种对知识的学术追求，而且应该作为一种工具，以实用的方式与世界接触。

公共人类学家的方法学自然面临着种种挑战：学术界内部语言对相关受众的“翻译”，研究议程的在地化、跨学科背景下学术范式、知识传统的转换，以及最为关键的，将研究者本人从等级制度、象征资本和学术生涯的惯例之中解放出来。

但沿着公共人类学的角度前行，不意味着人类学家应自觉有义务对非学术的读者群体而写作，也不意味着人类学学科应该代表某些特定的政治议程。

在 20 世纪末，陈向明给出了她对未来质的研究方法的预测：行动研究进一步兴盛，强调让被研究者参与到研究之中，将研究的结果使用于对制度和行为的改变上；更加强调对多元现实和多元意义解释的尊重，注意倾听弱小边缘人群的声音；研究者更加重视对自己的行为以及研究的社会文化大背景进行反思；在强调多元的同时坚持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严谨性和系统性；研究的手段与构建现实的方式将受到信息时代高科技发展的影响。

在这 20 年前的预测中，陈向明与 Eriksen 的观点隐隐有所交叉。后现代的多元世界观和世界性视野让各学科边界前所未有的模糊，研究者、被研究者个人的种族、性别、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等因素也更加受到考量。人类学有潜力成为知识生活中的一门关键桥梁学科，一门处于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点的学科——文化、社会、历史、职业……也更是位于人类学家产出作品的学院与其研究所真正面向群体之间的十字路口（Eriksen, 2015）。

也正是到了这一刻，《手册》的主题愈发凸显：所有的方法都属于我们。研究方法的不断推进、开拓，与认识论的辩驳相辅相成。Russell 在引言中有所提及：这部分可能与其说是一个结论，不如说是一个重新审视开头的邀请。质的方法与量的方法的对垒，不同认识论、本体论的辩驳，旧方法、新方法的更替，种种图景都无可置疑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此刻，正在发生着不同方法间更平等、更常见也更自由的对话，而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研究方法仍在继续向前。

对扎根理论在当下所面临疑难的三篇回应²²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最早由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其目的在于挑战由韦伯、涂尔干、哈贝马斯等人引领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风潮,转而结合哥伦比亚学派的经验主义倾向和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倾向,将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质性研究方法超越描述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理论框架的领域,由此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性、概念性的理解。(Bryant, 2017; 卡麦兹, 2018)

然而,扎根理论的研究在向前推进并非风平浪静,而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分歧、疑难与其他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混淆。下面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旨在对这种扎根理论在当下面临的混淆或疑难做出某种形式的回应,从而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理解和把握。

一、扎根理论不是什么——六个常见的错误观点

Suddaby, R., 2006. From the Editors: What Grounded Theory is No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4), pp. 633-642.

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学术期刊编辑 Roy Suddaby 从六个存在着的对扎根理论常见的错误观点出发,旨在对扎根理论的概念做否定性的逼近或界定。

(一) 扎根理论不是忽视文献的借口

作者坦言,非结构化的研究会产非结构化的手稿,这些手稿不太可能通过任何**可靠的**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部。这即是说,扎根理论从未是要给那些妄图在没有任何先前研究知识储备,带着空白的头脑进入某领域的研究的研究者提供避风港。尽管扎根理论的提出的确带有反对宏大理论的动机,但格拉泽和施特劳斯二人从未鼓励人们因为扎根理论的存在忽视现有经验知识的研究。就此他们特别区分了“实质性理论”和“一般性理论”,指出**前者是对某一特定领域内的特定问题的理论解释或说明**,并与后者有着直接和必要的联系²³。他们曾明确指出(1967)实质性理论是形塑和生成正式理论(formal theory)的一个关键环节,尽

²² 作者: 李朝白

²³ 对此的更多讨论可见于后文表格1“研究成果”部分

管正式理论可以直接从数据中产生，但从实质性理论开始生成正式理论颇有可取之处。他们还表示，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实质性理论刺激的正式理论。

既有的研究对扎根理论的真正影响在于前者会引导使用后者的研究者不自觉地测试假设，而不是直接观察。并对使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者提出下述意见：

- 避免研究过于拘泥于单一的实质性领域，从特定的日常现实中经常反映的七个实质性领域中汲取营养。
- 不断意识到你有可能被你的主题领域的现有概念化所影响。扎根理论家必须保持“使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的能力（Spindler & Spindler, 1982）。
- 尽量不要过度扩展扎根理论研究的目标。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把目标放在“现有理论的阐述”上，而不是提出一个不受约束的“新”理论。

（二）扎根理论不是原始数据的呈现

部分用扎根理论进行的研究结论明显归于老套，作者认为这种情况的普遍出现基于下述三个主要原因：

- 这样的研究倾向于使用不完整或相对未经检验的数据；
- 这样的研究往往未能将数据提升到概念的层面；
- 这样的研究可能知识过早地停止了数据的收集

首先，就部分研究使用不完整或相对未经检验的数据的倾向，作者对扎根理论和现象学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些混淆即二者之间的差别做出自己的指认：现象学在方法论上试图捕捉行动者生活经验的丰富细节，进而经常以相对原始的形式呈现数据，以证明其真实性，并允许主体对经验进行基于自身理解的解释。（Moustakas, 1994）；扎根理论不太关注行为者本身的主观经验，而更多地关注如何将这种主观经验抽象为关于行为者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陈述。若将上述的理论倾向映射到两种研究方法各自的访谈策略中去，我们似可会发现，现象学研究中的深入访谈是研究个人主观经验的关键手段（Wimpenny & Gass, 2000）。受访者所阐述的故事的细节和细微之处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具体词语构成了分析的主要单位。由于现

象学是在不污染数据的情况下探究受试者的生活经验(Moustakas, 1994), 数据单位通常以原始形式被预先发送, 而扎根理论中对被试者的访谈更多地作为一种激发关于被试社会状况信息的手段。与现象学研究相比, 扎根理论研究很少将访谈作为其唯一的数据收集形式。

其次, 就部分研究中存在着的“未能将数据提升到概念层面”这一问题, 作者认为其更多地基于研究者并没有充分的分析数据, 而只是将数据分析工作停留在了相对肤浅的层面, 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比数据本身略高的抽象层次”(Martin & Turner, 1983:147)的追寻。

最后, 作者指出过早的停止数据收集也会导致研究解决流于简单。认为不同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 扎根理论在收集和分析数据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相反, 研究者必须继续收集数据, 直到没有新的证据出现。(Strauss & Corbin, 1998)。

(三) 扎根理论不是理论测试、内容分析或字数计算

扎根理论的目的不是要对现实做出真实的陈述, 而是要对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和互动如何积极地构筑现实提出新的理解(Glaser & Strauss, 1967)因此, 扎根理论不应该被用来检验关于现实的假设, 而是用来对行动者如何解释现实做出说明。正如 Martin 和 Turner(1986)所指出的, 当没有明确的假设可供检验时, 或者当这些假设确实存在但过于抽象而无法以逻辑、演绎的方式检验时, 最好使用扎根理论。这就是扎根理论最合适的地方——研究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而没有解释, 他们试图从这个现象中“从数据中发现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 1)

作者在本节中旨在将扎根理论和三种其主要的“混淆对象”进行区分, 简要说来, 她认为相较于理论测试, 扎根理论基于正在进行的观察来测试他们试探性的想法和概念结构; 扎根理论与内容分析的不同在于, 前者重解释, 后者重描述²⁴; 扎根理论更不可能是词频计算, 基于词频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大多都违反了扎根理论的解释主义的理论倾向²⁵。

(四) 扎根理论不是简单地将公式化的技巧常规化地应用于数据中

尽管僵硬地应用扎根理论技术可能会产生合格的结果, 但这种机械的方法通常缺

²⁴ 详见后文内容整理

²⁵ 详见后文表格 1 “提出背景和哲学基础”部分

乏创造性洞察力的火花，而这种创造性洞察力正是杰出研究的基础所在。

如文中所说，格拉泽(1978)用“理论敏感性”这一概念来描述扎根理论的技术性操作和解释主义之间的基本张力。这种紧张关系最终被证明是扎根理论创始人之间的一个分歧点，格雷泽倾向于用创造和开放的眼光看待数据的非预期解释，而施特劳斯和其合作者朱丽叶·科尔宾则坚持数据分析和规定性程序(Locke, 1996)。在他们看来，“理论敏感性”当然取决于研究者的分析能力、对奥秘的敏感性和对行动/互动的微妙关系的敏感性，但同时也取决于收集或分析的数据的质量。如果研究者没有利用完整的数据资源，或者没有将数据收集推得足够远，这样的敏感性也就无从诞生。

(五/六) 扎根理论不完美也不简单

二、扎根理论与定性内容分析的比较

Cho, J. Y., & Lee, E. (2014). Reducing Confusion about Grounded Theory and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9(32), 1-20.

就部分研究者（特别是新手）对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和定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的理解和使用中存在的含混和疏漏，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学者 Ji Young Cho 和韩国汉阳大学的学者 Eun-Hee Lee 在这篇文章中从下述六点详细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并对二者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做出了自己的指认。试图以此帮助面临在研究方法选择缺乏经验的研究人员开展其研究。这里将其要点简要整理如下：

扎根理论

- 提出者: 格雷泽 (Glaser) 和施特劳斯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1967)
- 扎根理论的提出基于对实证主义的回应, 后者遵循科学的证伪和验证。Glaser 和 Strauss (1967) 则认为有意义的理论亦可以自研究者从观察间或观察者间的共识中获得 (Suddaby, 2006)
- 扎根理论在理论立场上比较靠近符号互动主义²⁶ (Priest 等, 2002)。这种立场认为人们的行为 (acting) 实践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某种反应, 更多是基于个体意志的主观能动性” (Nusbaum & Chenitz, 1990), 也即人类不是被动地对外部现实做出反应, 而是将他们的内部感知和理想强加于外部世界, 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积极地创造他们的现实 (Morgan & Smircich, 1980)。
- 扎根理论既可以用于定性数据, 也可以用于定量数据。(Grounded Theory Institute, 2013)
- 不断进行比较分析, 使概念范畴内的证据获得准确性, 建立获取了的事实的一般性
- 理论抽样²⁷ (theoretical sampling)
- 扎根理论的理论目的旨在帮助产出一个实质性的理论, 以解释特定背景下的某些现象……扎根理论的重点在是理

特征

据和理论依据

定性内容分析

- 提出者: Kracauer (1952)
- 内容分析最初作为一种定量研究方法用于分析各类媒体内容的文本材料 (Elo & Kyngäs, 2008; Harwood & Garry, 2003)。旨在从数据中提取类别。其在分析过程中把文本分解为可量化的单位的做法使得文本的意义遭受简化和扭曲。Kracauer (1952) 主张用定性的方法进行内容分析, 从文本中获得更全面的意义和见解, 以回应定量内容分析的不足。
- 定性内容分析可以被称为 “一种通过编码和识别主题或模式的系统分类过程对文本数据内容进行主观解释的研究方法” (Hsieh & Shannon, 2005, p. 1278)。它是 “一种系统地描述定性材料意义的方法” (Schreier, 2012, p. 1)。
-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灵活使用归纳法, 演绎法或结合使用二者
- **编码中兼顾显性/隐性 (潜在) 内容意义²⁸**
- 定性内容分析的理的理论目的则在于帮助研究者从研究问题中指定的某个方面 “系统地描述”

²⁶ 符号互动主义的内在立场是: “意义是通过在社会过程中与他人的互动来协商和理解的” (Starks & Trinidad, 2007, p. 1374)

²⁷ 理论抽样是 “为比较分析而收集数据的过程” (Glaser & Strauss, 1967, p. 9), 这意味着从最初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中得到的洞察力会导致后续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它涉及 “招募对该现象有不同经历的参与者, 以便探索所研究的社会过程的多个维度” (Starks & Trinidad, 2007)。在分析过程中, 研究者必须对数据分析有理论上的敏感度, 指导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²⁸ 显性内容意味着研究者对文本的可见和表面内容进行编码, 而潜在内容意味着研究者对文本的潜在意义进行编码 (Graneheim & Lundman, 2004)。研究者通常希望超越文本的显性内容, 分析潜在的内容 (Potter & Lundman, 2004)

	<p>论发展 (Strauss & Corbin, 1994) 因此, 当不存在理论或存在的理论过于抽象而无法检验时, 扎根理论是合适的, 但它不适合于检验理论或从客观现实中生成知识 (Martin & Turner, 1986; Suddaby, 2006)。</p>	<p>材料的意义 (Schreier, 2012, 第 3 页)</p> <p>→ 内容分析并不专注于寻找类别之间的关系或理论建设; 相反, 它专注于从数据中提取类别。</p>
<p>数据分析过程</p>	<p>→ 扎根理论的数据分许旨在寻找类别之间的关系, 并从增长关系中生成理论</p> <p>→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在扎根理论的使用中平行进行, 而非以线性或顺序的方式展开</p> <p>→ 用于分许的数据量不是基于其效度 (availability), 而是基于其饱和度 (saturation)</p> <p>→ 由于理论抽样的性质, 从数据中产生的理论是几张引导了后续数据收集适合什么样的数据</p> <p>→ 扎根理论的研究错过是一个“适合其预期用途”的实质性理论 (Glaser & Strauss, 1967, p. 3), 实质性理论 (substantive theory) 与更高层次的一般理论不同, 相比较一般理论的严密, 实质性理论的性质是临时性的, 它有可能进一步被被扩展到“更详细的实质性理论或正式理论” (Strauss & Corbin, 1994, p. 282)。</p>	<p>→ 定性内容分析的数据分析经由选择分析单位-分类-确立主题作为核心步骤</p> <p>→ 定性内容分析需要将“分析限制在与你的研究问题相关的方面” (Schreier, 2012, p. 7) 来减少数据。</p> <p>→ Sandelowski (2000) 认为, 与扎根理论相比, 定性描述性研究要求研究者“更接近他们的数据, 更接近文字和事件的表面” (第 336 页)。</p> <p>→ 定性内容分析的研究结果由定性材料的意义经由类型化或主题化后的样貌呈现, 有必要强调这个过程抽象程度很低。</p>
<p>研究成果</p>	<p>→ Corbin 和 Strauss(1990) 建议将以下内容作为扎根理论的评价标准: 编码和研究过程的严谨性、概念的质量、概念之间的系统关联性、概念的密度、变化范围和特异性、理论发现的意义和理论的敏感性 (第 18-19 页)。</p>	<p>→ 没有具体的评价方法</p>
<p>信度评价</p>		
<p>该理论的优劣势</p>	<p>→ 当研究者在不存在相关理论的情况下进行调查时, 扎根理论给了研究者一个创造性的方法, 而不把他或她限制在一</p>	<p>→ 它通过对各种口头或书面记录的解释, 导致对社会现实或现象的理解。</p>

- 个已经存在的理论领域里 (Suddaby, 2006)。
- 它使研究者能够以新的眼光和新的角度来看待各种现象, 而不受现有假设的限制。
- 它使研究者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各种现象。
- 与其他定性研究方法相比, 它在编码过程中有一个更明确的程序。
- 由于原始的扎根理论文本有许多变化, 新手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遇到了困惑。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时, 需要了解不同版本的不同编码过程。
- 它没有提供一个预定的研究抽样过程。为了达到理论抽样的饱和度, 研究者必须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保持严格的理论敏感性。
- 从时间和精力上来说, 这不是一个有效的过程, 因为编码过程是劳动密集型的。尽管研究者遵循严格的编码过程, 研究者可能不会发现任何实质性的理论。
- 它允许研究人员处理大量的数据。
- 它的灵活性在于, 数据可以是口头的, 也可以是视觉的, 可以从其他来源取样, 也可以由研究者收集 (Schreier, 2012)。
- 如果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书面文本, 这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方法, 因为在参与者和研究者之间不会发生不必要的互动效应 (Kondracki 等人, 2002)。
- 它可能不适合开放的探索性研究 (Ehnert, 2008)。
- 这可能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和耗时的过程, 而且编码方案变得相当复杂 (Kondracki 等人, 2002)。
- 由于缺乏既定的分析程序, 新手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时可能遇到困惑。

表格 1

三、一份“从案例中建立理论”的操作化技巧“叮嘱”

Eisenhardt, K. and Graebner, M., 2007.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1), pp. 25-32.

作为对主流研究演绎法的补充, 根植于丰富的经验数据中进行理论建构的归纳方法似乎变得抢眼。然而在作者看来, 这样的方法尚未被广泛地认识和理解, 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对“从案例中建立理论”的操作化步骤进行解释和讨论。这样的解释从以下五个理论建构中的主要疑难点展开, 直面理论建构中的诸多混淆地带, 并从头到尾地贯穿一个研究始终, 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篇文章似像是一份贴心的操作化技巧“叮嘱”与指导。

（一）理论建构的正当性证实（Justifying Theory Building）

作者认为，理论建构其正当性的获得似必须建立在对理论测试的方法在该研究问题中乏力的指认之上。即研究者有必要首先对“针对相关研究问题，为什么理论建构要比理论测试的研究来得更好更明智？”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换言之，说明归纳性的理论建构在研究问题中的必要性，从现象的重要性和针对该现象现有成熟理论的缺乏两方面确立其研究的框架。

（二）理论上的案例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 of Case）

有必要首先指出，“从案例中建构理论”其理论目的在于理论发展而非理论检验，如是便可知案例理论抽样在此对于其他抽样方法的正当取缔。而多个而非单一的案例研究的被认为更利益创造出强大的理论，这样的选择并非依据某一个案例的独特性，而更多的是其在一组案例中对理论发展的贡献。

（三）处理采访数据

作者在这里指出，访谈是收集丰富的经验数据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数据是包含偏见的**。减少偏见的一个关键方法是将回顾性案例和实时性案例相结合（Leonard Barton, 1990）。回顾性案例依靠相互间的观点（和档案数据），有效地建立起案例的数量和深度，从而使重新搜索者能够覆盖更多的信息提供者并包括更多的案例。与此相反。实时案例采用访谈的纵向数据收集，通常还有观察，这两种方法都有助于减少回顾性的感觉和印象管理。

（四）提供经验性证据

多案例研究的挑战是如何在空间限制内，同时传达作为研究目标的新兴理论和支持该理论的丰富经验证据。在期刊文章中，多案例研究者面临着在理论和经验的丰富性之间特别困难的权衡。应对“更好的故事与更好的理论”这一挑战的最好方法是，分章节或通过不同的

命题来发展理论，使每个命题都有经验证据支持。因此，论文的总组织框架是理论，而理论的每一部分都由至少一部分的证据来证明。但是，由于在一篇文章中用每一个案例来支持每一个理论命题通常是不现实的，因此，使用大量的表格和其他视觉手段来总结相关的案例证据，是表明经验基础的深度和细节的核心。

（五）撰写新兴理论

一种被广泛认同的针对扎根理论的理论建设的观点认为，理论的质量及其经验材料作为基础的韧性对于研究质量来说比理论建立过程的具体细节更为重要。但另有人认为，扎根理论的理论建立有一个更精确的含义。Glaser 和 Strauss (1967) 最初关注的是社会行动者对意义的解释，而 Suddaby 扎根理论的建立描述为“最适合于理解行动者从社会中构建意义的过程”。(Suddaby, 2006: 634)，后者的洞见建立与对扎根理论使用实践的更加整全的把握之上，对于新兴理论的撰写方向不失为一个好的启发。

参考文献

- Bryant, A. *Grounded Theory and Grounded Theorizing: Pragmatism in Research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Corbin, J., & Strauss, A. (1990).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 *Qualitative Sociology*, 13(1), 3-21.
- Elo, S., & Kyngäs, H. (2008). The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proces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62(1), 107-115.
-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UK: Weidenfeld & Nicholson.
- Harwood, T. G., & Garry, T. (2003). An overview of content analysis. *Marketing Review*, 3(4), 479-498.
- Kondracki, N. L., Wellman, N. S., & Amundson, D. R. (2002). Content analysis: Review of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nutrition education. *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Behavior*, 34(4), 224-230.

Kracauer, S. (1952). The challenge of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6, 631-642.

Leonard-Barton, D. 1990. A dual methodology for case studies: Synergistic use of a longitudinal single site with replicated multiple sit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 1-19.

Locke, K. 1996. Rewriting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after 25 yea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5: 239 - 245.

Martin, P. Y., & Turner, B. A. (1986). Grounded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2(2), 141-157.

Morgan, G., & Smircich, L. 1980. The case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5: 491 - 500.

Nusbaum, J., & Chenitz, W. (1990).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of the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for pharmacologic research. *Wester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2(2), 215-228.

Parkhe, A. 1993. “Messy”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pre-disposition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8: 227 - 268.

Priest, H., Roberts, P., & Woods, L. (2002). An overview of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qualitative data. Part 1: Theoretical issues. *Nurse Researcher*, 10(1), 30.

Sandelowski, M. (2000). Focus on research methods: Whatever happened to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 23(4), 334-340.

Schreier, M. (2012).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n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auss, A., & Corbin, J. (1994).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73-2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Suddaby, R. (2006). From the editors: What grounded theory is no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RCHIVE*, 49(4), 633-642.

Wimpenny, P., & Gass, J. 2000. Interviewing in phenomenology and grounded theory: Is there a differenc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31: 1485 - 1492.

[英]卡麦兹著,边国英译.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辑四：原创性研究和评论

用眼睛发现真实：民族志电影的叙事形式

——评《持摄影机的人》²⁹

《持摄影机的人》（俄文：Человек с Киноаппаратом）上映于1929年，彼时电影这一表现形式进入公共视野仅三十余年，而这部带有民族志色彩（尽管可能并非有意为之）的苏联影片已然凭借其实验性的电影理念和超前的表现手法成为了一部极富争议而又不断被后人学习和模仿的经典。在这篇影评中，我将主要从这部影片独特的摄制手法切入，尝试从人类学的角度解读其意义，并探讨这部民族志影片对于我在民族志写作方面的一些启发。限于篇幅原因，对于影片具体内容的叙述将较为简略。

（一）两重真实与国际叙事

在影片的开头，本片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向观众作出如下声明：

“本片呈现的是一场实验，其对象是视觉现象中的电影传播，该片没有字幕、剧本、布景或演员。这部实验性作品旨在完全剥离于戏剧和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一种真正国际化的、纯粹的电影语言。”

事实上，维尔托夫正是“电影之眼（Kino-Eye）”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他试图通过“电影之眼”来捕捉人的肉眼所无法看到的真实，也因此反对电影中出现任何建立在剧本、布景等基础上的人为虚构和模拟（有趣的是，电影的诞生最初正是脱胎于戏剧，维尔托夫电影理念的实验性在此体现）。然而，维尔托夫是否真的意欲通过电影的镜头展现出生活的真实图景，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又是否定的。影片中大量与日常视野相异的倾斜画面、多重曝光、定格画面和各种我说不上名字的蒙太奇剪辑无一不在提醒观众：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是电影的真实，而非现实生活的真实。

²⁹ 作者：王若瑒



两个倾斜的画面被对称剪辑在一起；尽管所拍摄的内容是观众所熟悉的城市生活，但却与观众所处的“真实”之间划开了边界。

维尔托夫想传达的这则讯息实在是再明确不过了，因为影片本身亦由上述的两重时空所构成：在影片的开头依次展现了空荡的影院、放映机、放映员、入场的观众和准备就绪的乐队[1]，表现的是影片本身存在的那个时空；而后电影在“胶片在放映机中卷动”的画面中渐渐过渡到了第二重时空，即影片本身内容所展现的世界；此外，除却开头和结尾，表现电影拍摄团队工作场面的镜头穿插始终，甚至影片还将剪辑前的影像和剪辑后的影像拼接在一起，间接表现出剪辑师的工作场景。换言之，与寻常的电影通过剧本和布景将观众“带入”电影场景相比，《持摄影机的人》始终通过一种自我指涉的反身式手法，凸显出影片本身与观众的精神距离：观众被不断提醒“这是一个制作电影的过程”，因而无法获得真正“在场”的观看体验。借用维尔托夫自己的话来说，这场复杂的实验将电影之眼中“生活原本的样貌（life as it is）”和人眼中“生活原本的样貌”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D. Vertov, 1984: 84-85）。



剪辑处理前后的影像被拼接在一起，向观众展示剪辑师的在场。↵



影片中多处出现“摄影师”的形象，将观众带离电影，成为旁观者。↵



第一重时空：展现观众观看电影的过程。↵

如果说维尔托夫通过电影之眼试图复原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真实，并同观众所处的环境划下清晰的边界，那么他的电影语言本身却又消解了观众生活中的另一种边界（至少他本人有志于此），一种由语言、地域而产生的边界。维尔托夫用《持摄影机的人》表明，电影叙事无需建立在语言上，也未必要表达什么，只需展现“真实”（1984: 84）。由此，维尔托夫的这场电影实验似乎在形式上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相融合：在论及“电影之眼”的本质时，维尔托夫直言其“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保持同步”（1984: 49）。他对于旧时代俄国资产阶级

电影的批判，在我看来与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有着相近的本质：宗教本质上是人对于其自身境遇的投射，因而是一种虚妄的慰藉（K. 马克思, 2009: 90, 97, 469），而人在这种关于自身处境的幻想中接受了受到剥削和压迫的现状。相似地，资产阶级电影通过一种大众娱乐的形式给予了人们平等的幻想，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能够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种种压抑和限制。维尔托夫的“电影之眼”则试图从电影叙事中抹去人为的矫饰和铺张，意图将观众肉眼所能够看到的和无法看到的世界都忠实地记录下来并予以展示：从机械的运转到人的生死，从劳动妇女被泥土覆盖的双手到中产妇女被脂粉妆点的面容，从井然有序的街道到拥挤混乱的海滩；只有当超越个人生活和社会被电影的叙事穿透和解构，电影才真正成为启迪社会主义公民的方式，而非一种简单的娱乐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维尔托夫的电影之眼无疑具有超越“艺术实验”的意义。

（二）“电影之眼”与“民族志之眼”（ethnographic eye）

尽管“民族志电影”可能并非是维尔托夫拍摄《持摄影机的人》的本意，但它从表现的内容到记录的形式都具有相当的民族志意味。这部影片作为民族志作品的一个前卫之处在于，它试图展现工业化进程中现代东欧城市的真实样貌[2]：城市中的人们如何醒来、如何工作、如何进行体育运动和艺术创作、如何过渡人生的不同阶段。这种对于自我生活的关注在那个年代是少见的：在殖民历史中诞生的早期人类学传统往往将目光投诸位于“现代文明边缘”的原始部落，注重对于异质文化的研究；而打破跨文化研究传统来研究自身，则是人类学较为晚近才做出的自我反思和改变。当我们考虑到导演本身便是苏联人时，这种前瞻性或许会更加明显。

从手法上来看，在第一部分中提及的“双重时空”，不禁令我联想到民族志的对象、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影片中，拍摄者扛着摄像机的片段和“电影之眼”的在画面中反复出现，揭示出拍摄者游离于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边界上。此外，当影片中不存在按照剧本进行表演的演员时，拍摄者将不可避免地与被拍摄的对象发生一定的社会联结，镜头中记录的一言一行所体现的也自然是在这种特定社会联结下的互动方式。显然，影片中拍摄者的角色与民族志学者的角色是十分相像的：民族志研究的开展的必然基础是研究对象的“被注视”，正是这种被注视性构成了研究对象行为情境的一部分。尽管影片的拍摄者无需像民族志学者那样对搜集到的田野材料作出解读和分析，但是民族志体现的“真实”和电影中体现的“真实”一样，都与“生活的真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样地，“电影之眼”在观察范围和对象

选取上同样存在局限，而这也指向了“影片”作为田野材料收集方式的局限性：如果影片本身就是一种局部的真实，那么过度依赖于影像资料来进行人类学研究，无疑会将这种局限性进一步放大。

那么读者在此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持摄影机的人》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第一重时空”中的影片观众和“第二重时空”中的被拍摄者拥有相似的社会身份，即都是城市中的普通市民，而这一“观看者-被观看者”的双重身份则给予了观众对影片进行评价的机会；这也意味着，电影的拍摄者不再对于影片中画面的解读占有绝对的主导权（当然，显然在《持摄影机的人》中导演显然未曾想过要形式这种权力，反而将其束之高阁）。当然，维尔托夫在影片中做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者提出的要求，即对于资料搜集和条件和方法、资料的来源等应做到绝对坦诚、毫无保留（B. Malinowski, 2014[1922]:30-31），这进一步消除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这也让我想到：若民族志学者将被研究的群体也纳入读者群体，并在撰写过程中不断将民族志内容分享给被描写的对象进行评价，这或许也应称之为一种多方验证的手段，而这样的民族志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研究中潜在的偏见。而这一问题的更深层次考虑在于，民族志研究中的知识生产背后必然蕴涵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如何厘清并反思这些潜在的权力关系，又如何在此基础上纳入被研究者的视角，这些问题（或者说要求）是《持摄影机的人》所启发我的，亦是人类学学者需要思考的。



就地休息的男子在发现自己被拍摄时的反应。类似地，民族志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同样也被研究者注视着，而这种“被注视性”则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研究对象（乃至研究者本身）行为和言语的情境。↵

参考文献:

Fine, G. A. 1993. "Ten Lies of Ethnography: Moral Dilemmas of Field Resear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3): 267-294.

Malinowski, Bronislaw. 2014[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Vertov, Dziga. 1984. *Kino-Eye: The Writings of Dziga Vertov*. Edited by Annette Michelson, translated by Kevin O'Brie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戴维·麦克莱伦 & 平川. 2015. 《马克思论宗教》, 《国外理论动态》第3期: 56-64。

马克思 & 恩格斯.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或许在这里需要向生活在有声电影时代的读者们说明乐队的的作用: 在默片时代, 现场乐队承担着为影片伴奏的职责。我们今天看默片时所能听到的背景音乐, 正是收录了当时的现场伴奏。

[2]影片的拍摄地是莫斯科、基辅和敖德萨三座前苏联城市。

慢性疲劳综合症的诊断叙事及其暴力

——试析纪录片 *Unrest*³⁰

Unrest 对于慢性疲劳综合症³¹的讨论显然无意仅停留在疾痛叙述的层面，除此之外，影片亦对某种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长期遭受的暴力。长期以来，现行医学对于慢性疲劳综合症的诊断和研判不无某种暴力的属性，并经由这种属性的展开完成对自身权威的构建。本散论旨在试着对这种诊断叙事的编织、其所蕴含又外延于其外的暴力的形态及背后或许存在着的某种意识形态做出分析。

生理 (physical) 病和精神 (mental) 病的分类及其暴力

在计算机辅助扫描仪发明以前，慢性疲劳综合症一直被称作是病性瘫痪，而我们现在有了观看大脑的能力，可以看到那些巨大的髓鞘脱失的白点，因此，它从癔症变成了真病。

——DR. NANCY KLIMAS

患病的第一年，我感染了六次，我基本就是每天从床上爬起来，去上课，再回来躺到床上。我有去看过医生，他只是告诉我：‘你就是有点脱水。每个人都有压力大的时候’。……我去看了各种各样的专家：传染病的、内分泌学的、心脏科的，最后是神经科的，我的神经科医生诊断我得了转换障碍 (conversion disorder)。他说我所有的症状，即使是发烧，以及我服用抗生素抵御的感染，都是由某个年代久远到我甚至已经记不起来的心理创伤 (trauma) 导致的。

——JENNIFER BREA

我在医院连续待了四年，我当时处在半昏迷 (semi-coma) 的状态。医生们不知所措，护士们也让我弄得很沮丧，他们都认为我几乎没希望。

——JESSICA TAYLOR

³⁰ 作者：李朝白

³¹ 即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也被称为肌痛性脑脊髓炎 (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 或 ME/CFS, 是一种复杂的、使人衰弱的长期疾病。该病的病因和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我看了十到十二个告诉我没有任何病的医生，我认为正是从那时候开始 Randy (Leeray 的丈夫) 开始怀疑我的病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丈夫家那边的所有人自此开始责骂我：“哦，这是精神问题。如果医生找不到什么问题，那就是她脑子有问题。”

——LEERAY DENTON

Jennifer, Jessica 和 Leeray 因为共同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而相识相知。患病时，Jennifer 正在哈佛读博士，Jessica 在英格兰的肯特 (Kent) 上中学，而 Leeray 已是两个女孩的母亲。她们三人在得知慢自己得了性疲劳综合症之前的求医经历都不无坎坷，她们或是得不到医生的解释；或直接被告知患了某种精神疾病；或一度被医生说没病，却因坚持诉说自身的疾痛 (illness) 而遭致他人口中诸如“没病装病”或“脑子有病”的非议。

从她们求医时得到的这些诊断中，可以看到一对有关疾病 (disease) 的基本分类，即生理病和精神病的分类。长久以来，生理病和精神病的分类作为一种人们看待和认识疾病的框架，延伸到人们对任何疾病的印象、认识和理解之中，现行医学并不排斥这份古老的“常识”，反而将其作为一个环节，继承于自己疾病的诊断中，甚至在有些时候表现出对其必要性的肯定。在现行医学的语境中，这个分类存在的根据在于生理疾病的病因往往能被人们较为准确的发现，而精神疾病却似从来不能被证明。如 Jennifer 在影片中所说，“（对于精神疾病）我们只是给予了这些病症名称，但是我们不能找到生理的病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病因”。精神疾病由于其似（暂时或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被现行医学的方法证明的性质，其在病因上往往保有一份模糊和含混。

在批判哲学的层面，对这份模糊和含混的大方承认不禁让我们欢喜，因为它反映着理性主义对自身的理性反思，即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和承认。这种承认提醒我们理性不仅仅是一种解释的能力，让我们见证德国观念论传统中理性作为一种批判的能力的面向在当代的意识形态中尚未全然失落。

但在现实的具体图景中，对这份含混性的认识却包容了诸多的浅见，诸多的事实似在表明一种倾向，即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那些尚未被现行医学方法证明或找到生理病源的疾病划分到精神疾病的领域，并将那个并未找到的病因归因于患者自身精神内部。

在被诊断出慢性疲劳综合症前，Jennifer 和来自丹麦的 Karina 都曾被明确告知自己得的是某种精神疾病。说 Jennifer 得了精神病的医生这样向她讲述其疾痛的根源——她如今所经

受的一切症状都由某个年代久远到她甚至已经记不起来的心理创伤导致，而当给 Karina 看病的医生 Per Fink 被问及这种后来被确诊为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症状究竟属于精神紊乱还是生理紊乱时，即便他在开始表示这个问题无法被回答，却又随即补充道，“**精神医学的方法和角度可以最好的解释这个现象**，而且有关精神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在这样的叙述中，似可见科学或理性所包含的批评的能力完全让位于解释的能力，即我们满足于用一些直接原因，可测量的原因来解释能所这样解释的一切疾病，并将那些超出这些原因解释能力的疾病罢黜到“不可说”的精神领域。但如 Jennifer 所说，“我并不怨恨我的（做出精神疾病诊断的）医生。我知道他也是为了我好”，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错误诊断并非出于医生的恶意，却是出于医生的好心；不是出于医生的漫不经心，而是基于医生用他所能动用的最好知识和检测条件，进行在他/她看来最严谨审慎的判断。在这样的对立之中，我们不由得认为存在一种系统性的客观暴力³²，作用于疾病叙事诊断的叙事所在的系统中。

现行医学、科学主义与威权

瘧症，这个概念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埃及人认为它是由失常的子宫导致的，希腊人则把病因归咎为性剥夺，弗洛伊德？被压制的记忆。……我们现在把瘧症叫做“转换障碍”，我原本也被诊断是得了这个病。我一直听说有女患者后来被诊断为肌纤维痛、莱姆士病或红斑狼疮，她们一开始都被告知自己是瘧症患者。……我们之前会囚禁有瘧症的女人，如今我们仍然这样想，并这样做。

——JENNIFER BREA

有个病人来找我之前，受到过医疗系统的残酷对待，她病得很厉害，几乎精疲力竭。她没有任何抑郁症状，却要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她没有任何精神疾患，却要服用精神病药。……因为每个人都告诉她她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一定是她脑子出了问题，而我却告诉她她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她就很激动，很高兴，很快乐，因为她得的不是精神病。

——DR. NANCY KLIMAS

³² 齐泽克认为客观暴力是一种系统的先天暴力，它不单是直接的物理暴力，还包括更含蓄的压迫形式，这些压迫维持着统治和剥削关系，这种关系里面其实已经包括了暴力。（参见[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断言一个真正生病的人没病，即是对真正生病的人其自我疾痛叙述的否定。冠某个疾病以“癔症”之名，则是消解患者本人对自己疾痛展开的一切言说的根基。这种话语将承受疾痛的患者推向边缘，声称“癔症是病人自身无法了解的一种情感障碍”，它将疾病的原因推向患者自身深不可测的精神领地，却从未建立对疾痛的真正解释，只能依靠精神病病因的那份含混性，寻求自身所做指认合法性的建立，实质上完成对患者疾痛解释权的剥夺。

这种剥夺所导致的不只是患者本人话语失效下的“缄默”状态，还是医疗系统之外的带有旁观身份性质的大众对于现行医学权威性的信任追随与对遭受疾痛的患者本人叙述的怀疑和冷漠。比起患者自身不专业的诉说，医生的专业诊断显然更加让人信服。至此，这种话语经由其暴力属性的恫吓，其所剥夺的不只是患者自身疾痛叙述的内容，还旨在压抑患者自由地展开自身疾痛叙述的动机。

“就是我们得注意一下，如果你（看医生的时候）话太少，他们（医生）帮不了你，如果你说得太多，他们……他们就会觉得你得了精神(mental)病。”Jennifer在听丈夫Omar说这话时，正安静地躺在普林斯顿医院的某张病床上，等待大夫的到来。Omar期待着医生对妻子的疾痛做出一个诊断，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妻子作为患者对自身疾痛的叙述会影响到医生对于疾病的决策。当Jennifer在当时饱受这种“未知疾病”的折磨之时，这对年轻的夫妇寻求现代医学，希望它能够对自己的症状给出一个科学而精确的回答。但为了获得这种“科学”的解释，Jennifer似却必须在言说自身疾痛时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似乎现代医学权威性的获得，不仅依靠其引以为傲的医学知识与精密仪器，还必须经由患者的配合、让步和妥协。

国家对这种权威性的承认使得一些执法机关展开直接的暴力行动获得了合法性。而这里使得宣判成立的叙事却遭遇着进一步的扭曲，在丹麦霍尔斯特布罗（Holstebro），卫生主管部门一度并不把慢性疲劳综合症作为生理疾病。他们（卫生系统的人）说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并展开威权主义的行动，他们派警察直接闯入患者Kraina家中将她强行“迁移”，将其安置在一个除了她的主管医生外没有任何人（包括其他医生）能和她见面的地方“治疗”，并以将患者监禁在家中暗室³³的罪名起诉患者父母³⁴，“他们对患者宣称：你症状是由你对你的疾

³³ 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症状包括某些感官会较患病前变得敏感许多，因此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常有畏光，害怕比较大的声音等表现，影片中许多出镜的患者都出现在暗室中。

³⁴ 去年2月12日，我正在等Karina做好吃早餐的准备，这是我听到敲门声。……我开了门，五个警察站在外面。我被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之后将要发生什么。我说：‘你们不能随意闯进一个有严重患者的家里。他们告诉我要么我开门，要么他们会破门而入。……我已经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KARINA的母亲

病的错误理念造成的，你的父母沉迷于这些理念，这使得你一直患病。因此，把你迁移至他们的影响之外，是能让你好转的唯一方法。” Jennifer 又接着说到，“我后来知道，在很多国家，医生们会把严重患者从家中迁移走长达数十年之久”。

上世纪八十年代，慢性疲劳综合症曾在美国内华达州英克林（Incline）村爆发，村子里出现了二百里症状相似的病例，当地医生对此束手无策，边开始寻求当代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帮助：

主管疾控中心对慢性疲劳综合症调查的 William Reeves 医生告诉媒体：一、这个问题不是由病毒导致的；二、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患者免疫系统并无异常，三、没有发生人员集群。所以当被问及塔霍湖（音译地名）爆发的病症时，他说那只是癔症（hysteria）。

“当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开始调查时，他们看了患者的数据，注意到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是正常的，然后他们就去滑雪了，” Jennifer 说。我们不由得看到，现行医学威权主义的非理性本质在于，人们给予医生极大的信任，而医生则给予现代医学科学的疾病检测以极大的信任。诚然，正是在这些科学检测的帮助下，人类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大大受益于此，但这仍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当相信当下的科学检测能力已经能够穷极这颗地球上已知或未知的全部疾病，因为科学的精神意味着对自身有限性的清醒和谨慎，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却反其道而行之。

参考资料：

Unrest. Jennifer Brea (Producer/Director), 2014.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我正在工作，电话响了，我看到是 Karina。我接了电话，她说：“爸爸，救救我，我在我房间里”。我想家里有麻烦了，我就跳上了车。当我开车赶到的时候。我看到了四个警察，他们全副武装带着 Karina 离开了，我们见不到她，一声再见也不许和她说。他们留下一张便条说她被迁移了，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甚至没被告知他们把她带去了哪里。……我总不能去踹开那间屋子（Karina 被迁移治疗的屋子）的门。因为这正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我虐待她）理由来起诉我。……语言无法形容这种感觉。[擦眼泪]

——Karina 的父亲

当个体经验成为社会症候：孤独感的疾痛叙事³⁵

一、引言：孤独感作为社会症候

从科学的角度，孤独感（loneliness）是指一个人渴望获得的和实际得到的社会关系不一致时，所产生的负面情绪（Peplau & Perlman, 1982）。与当下疫情中常见的客观社会隔离现象不同，孤独感是一种主观社会隔离，它关注的是个体主观评估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陪伴、关爱和情感上的支持，而非提供社会关系的数量、社会交往的频率等客观信息(Kitzmüller et al., 2018)。

近年来，公众与政策制定者对孤独感的问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控制倾向日益显著。孤独越来越被当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仿佛亟需治理和干预。不少研究声称，超过半数的老人处于孤独之中（Nygqvist et al., 2017）。许多公共卫生研究试图说明，孤独感是老年人死亡的高危因素，它将恶化某些常见的躯体疾病，并很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精神障碍(Holt-Lunstad et al., 2015)。英国政府于 2018 年设立孤独部长一职，应对全社会尤其是老年人群的“孤独问题”，而日本政府也于 2021 年任命了第一位“孤独大臣”。

尽管孤独感的循证无法用客观的生物学知识进行解释，其定义也强调“主观”，但这仍不妨碍孤独感与现代生物学和公共卫生联系在一起。统计学中的相关性检验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孤独感与各种其他疾病，乃至身体在细胞层面的变化和现象的关系，都能在假设检验的框架下进行客观而科学的研究。在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中，孤独感可以恶化感冒、加速衰老和死亡、减弱抗病毒能力……数不胜数。在社会医疗化的语境下，这就意味着“孤独感从各方面都不利于你的健康”，政府和个人都应当对其进行干预。于是，公共卫生专家通过统计学识别出各种诱发人群孤独感的“危险因素”，如丧偶、独居、失独等。只有存在这些“因子”，社会控制与干预才有对象和目标。这一逻辑还暗示着：随着社会治理的进一步落实，和某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参加集体活动，增加同龄人社交等）得到推广，人群的孤独感便势必得到缓解和抑制。

然而，“推广的健康生活”，所谓的干预手段，并非对个体最有帮助的缓解疾痛的方式。个体对于自身情绪问题的意义建构，乃至问题化本身，往往与社会控制者眼中的图景相去甚远。很多时候，也并非研究者没有关注孤独感潜在人群的疾痛叙事，而是那些私人的逻辑和诠释几乎不可能纳入寻求普遍化、标准化的致因-治理结构中；无论是精神卫生的运动式

³⁵ 作者：王友。本文为《医学人类学》期末论文。

治理，还是强调人性化的照护与福利制度，都会面临个体经验与社会症候的鸿沟。

二、进入田野

去年夏天，我加入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的一个课题组，开展对上海市老年人孤独感体验与应对的质性研究。在街道和卫生部门协助下，我们抽选老人³⁶参加调查，完成孤独感量表³⁷与其他生命状况、负向情绪和认知功能等量表。随机邀请**被量表识别处于孤独感中的老人**参与后续的深度访谈。我与搭档一同访谈了 40 多位老人。

我们访谈的初衷是获得有助于完善社会干预的信息，寻找所谓孤独感致因的主题。但事实上，一旦对话开始，访谈的走向便不受我们掌控——有人聊起年轻时的经历，有人抱怨家附近的施工，还有人坚称自己压根不孤独，或者“你们的研究没有意义”……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大量文本被认为是冗余、无关、私人、难以归纳的，因而不得不省略，排除在结论之外——却恰属于重要的疾痛叙事内容。以下我将展示其中一位老人的故事。

三、疾痛叙事：重回个体经验

丁阿姨³⁸，七十二岁，居住在静安区一个设施良好、并不以老年居民为主的小区。她年轻时下放农村，回到上海后当一名会计，退休后与丈夫居住在大约 90 平米的公寓中。三年前，丁阿姨的丈夫离世了，走得很突然，“今天还在烧菜呢，明天他就跑掉了”。谈起老伴的离世，丁阿姨嘴上说着没事，却忍不住抽泣。其他时候，丁阿姨的声音清晰却很虚弱，时常对我们的询问感到不耐烦和厌倦，经常提起自己“马上要去医院看皮肤病”。所幸另一位访谈者（临床医学专业）及时地与她探讨皮肤的病情，这才拉回她的一些兴趣。丁阿姨总体表现得很儒雅，但言语中透露着对周围事物、身体、自我效能的失望、无奈、无助、焦虑。

既然老伴离世，我们起初很自然地谈论到子女在这一事件及其后丁阿姨情绪安抚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丁阿姨表示自己不是“那种”父母，对女儿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很尊重”，因此不苛求女儿特意来陪伴。体谅到女儿总是“没空”，她也不喜欢没事麻烦女儿。除此之外，丁阿姨还有一个不愿去“找”女儿的理由：她认为女儿和自己存在代沟和疏离，两人想法有出入，“想的完全两样”。

他们有他们的事，他们想的跟你们完全两样的。就是住在一起，他们就管自己的小

³⁶ 全部为 65 周岁及以上

³⁷ 主要使用国际国内信效度得到认可的 De Jong Gierveld 孤独感量表，辅助使用 UCLA 孤独感量表

³⁸ 为化名

孩的事。像我一生病想叫他们陪，这肯定是做不到的。你看今天星期五他们上班，星期六他们很早就安排好了带小孩到外面去玩一玩，到苏州、无锡玩玩。虽然她嘴上问你愿意去吗，其实他们最好就是你不去了，因为很麻烦的。跟他们混就得随着他们，你要是有别的想法，一次两次还好，三次人家就不太愿意跟你一起。就像交朋友似的，你要有反对意见，时间长了，他就觉得没有共同点。我和女儿就像两个人处对象，更要互相谦让。她表面上是说，周末我们来看看你，带你到附近去玩。我很清楚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事最多就是问问你，她其实最好你不要去。如果觉得你身体不好，就会直接说下次再带你。

虽然丁阿姨明确地述说自己不在乎女儿乃至他人的陪伴，并且声明自己完全理解女儿，但是，究竟真是“本身就不需要，不在乎子女的陪伴”，还是“渴望而不可得，久而久之接受并说服自己”，这一点是存疑的——从她大段大段地分析女儿的想法和意图时就能感受到。另外，当我们提到可以多与他人（同龄人）交流，倾诉苦恼、排解孤独的时候，丁阿姨有她自己的理论。

我不找人倾诉。有朋友，但人家有人家的事。过得不好又怎么样呢，就是靠自己调节。你跟人家讲东讲西，可谁家没有不如意的事情啊，人家还会说我带两个孙子都要累死了，你多舒服，天天一个人晃荡晃荡的。

我不想主动去说，还因为说来说去就这点，自己也说腻了，说了又怎么样，不解决问题。我是这样想，要跟人家比比，看到好的地方。人家天天汗流浹背的，买菜煮饭伺候人，有时候还闹得不高兴。虽然没人跟我住，但反正我也不用伺候别人。而且我们不能再跟年纪大的人说来说去，两个人说到后来都是苦情就没意思了。

心情主要还是靠自己调节，有时候想想就这么回事，比我苦的人要多少有多少。有人经济上有困难，但是我没困难呀。我有那么好的房子，也有退休工资。

丁阿姨不是一个孤僻闭塞的人，相反，她经常在小区当志愿者，我们在访谈结束后就看到过好几次。她与其他老人闲聊时，神情也十分愉悦。但她认为“倾诉”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徒增烦恼，还会麻烦他人，可能招致嫌弃；她还对志愿者工作组织表示不满，也坚称当志愿者对她的心情没有什么帮助，但实际上她又总是积极参加小区老人的集体活动与志愿者

工作。在丁阿姨看来，认清“大家都有难处”才至关重要，看到某些方面比自己境况还差的人，心里就会有了一些慰藉。

按照要对疾病进行治愈的逻辑，如果要“治愈”丁阿姨的孤独感，社区能做的是多鼓励她参加集体活动，以及敦促女儿多与她交流，多给予陪伴。然而事实上，这些我们称之为干预的手段会适得其反。丁阿姨认为，越对期待陪伴，越计较孤独，越去“想”，就会越焦虑和难受。最好的办法是“想开”，对自己的不幸“无所谓”“不在乎”，从而这些不幸不再成为严重的困扰。在丁阿姨眼中，不对“免受痛苦”保有希望，而是需要将“缺乏陪伴”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接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所拥有的好条件上。

另一方面，丁阿姨更关注实在的问题。她为自己的健康感到异常焦虑，即使体检状况良好，仅有老年人中常见的高血压症状。她曾因惧怕身体出闪失而拒绝出门，洗澡时也总是担忧自己会不会中风晕倒。另外，她还对物业维修人员感到恼火。当家中水龙头爆裂时，她向邻居求助，却得不到物业的帮助。她对此感到无助，也为麻烦他人感到窘迫。最后，她特别提到自己近来对寻常生活中的事情缺乏决断力，总是优柔寡断，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记忆力也愈发不自信，“任何风险都不敢承担”。

再说现在有点什么问题，就是做决定不能做，一做决定就是这样也不好，那也不好，就是优柔寡断的。总担心发生什么，这个决定我错了，那个决定我错了。以前我不是的，我和他商量事情，哪怕意见不一样。我说一句你愿意你就愿意，不愿意我也不跟你吵，就是算了。现在随便什么事决定，心里老是觉得纠结。今天早上起来我先干什么？看病是看这医院好，还是看那个医院好？原来不是这样的，他说看这个医院就好。其实我一个人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干也没人问我，但就是决定不出来，不知怎么搞。我觉得这是心理问题了，任何风险都不敢承担。

人们会很自然地觉得，丁阿姨的孤独源于三年前痛失老伴的事件，并将其归为更广泛的、更社会性的丧偶-老年孤独叙事中。这忽视了更微妙的图景。可以说，丁阿姨正在经历生活世界的转型与意义秩序的重建。首先，面对外部社会关系的主体从她与丈夫的共同体变为她自身，处世的压力前所未有地落入她一个人身上，使她一时间无法习惯承担做出判断和决定的风险。其次，丁阿姨其实对身边人的离去、对老年人的“陪伴需求”的尴尬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经历了悲痛，和随之而来的意义重构后，丁阿姨已经将老年独居视作无可奈何、

不可避免的生命阶段，与子女同住、其乐融融的前现代想象不再生效，转而形成了围绕自身潜在优势——自由自在、衣食无忧——的老年生活愿景，“幸福”更加可及。丁阿姨之所以声称做志愿者、与其他老人聊天对于改善自身情绪无效，不是因为她真的不需要陪伴，而是，她的陪伴需求已经在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或者从心理暗示与调节、内在诠释（别人还有更苦的，自己已经很幸运了）中得到释怀。她指的是，另一个更严重的困扰无法由此得到解决——如何重建自理能力的疆界与安全感的秩序——这一过程显然遇到了困难。丁阿姨提到，自己打理生活总是很疲惫，买菜做饭十分吃力，日常的零碎问题难以解决，担心生病以后无人照顾。她将自己视为无助和依赖的，并对此感到失望。

丁阿姨的孤独感无法简单地用致因-结果逻辑归纳。在这里，孤独是一种过程，个体不断与处境及其变化发生关系。老伴的离世无疑为丁阿姨的心灵带来伤痛，对她的境况造成冲击，但她本人积极应对和重建秩序的过程也随之开始。我们带着对某种纯粹负向情绪和固有观念中社会关系缺失的想象进入孤独感的疾痛叙事，却最终来到了个体参与的具体、动态的艰难中；在这里，苦难不再是社会问题意义上的“孤独”。

四、其他讨论

反思公共管理范式。在访谈中，我们注重对细节、看似无关数据的挖掘。但是，当研究结论从个体经验向“危险因素”、“应对措施”、公共管理、政策评估过渡时，疾痛叙事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对叙事的拆解不可避免地将鲜活的个体意义体系转化为割裂和去情境化的“因子”，我在编码过程中就体会到将私人话语转变为某种客观术语的别扭之处。以上述丁阿姨的故事为例，她的心路历程与生命境况，根本无法用简单的丧偶、独居、老化等语词概括。比如她从比自己更惨、更苦的他人身上找到慰藉的调节方法，很难与能被称为干预策略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些微妙的过程往往对老人重建内心秩序更有帮助，但是，公共管理要求我们进行归纳总结，寻找共性与客观化的可能，即使定义中都明确强调了孤独感的“主观性”。很多时候，并非研究者不愿意关注疾痛叙事，而是社会干预范式的对象化倾向本就难以兼容私人的意义建构。

访谈者作为疾痛叙事的主体之一。疾痛叙事是访谈者与受访者共同的意义建构过程，访谈者本人的角色值得反思。如前文提到，研究搭档的临床背景，拉近了此时正急着去看病的丁阿姨与我们的距离，共同描绘了丁阿姨对于健康问题的焦虑，而这成为此次疾痛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在访谈一开始有一种“您是不是还没有走出忧伤”的询问与叙事的倾向，这种倾向很有可能源于作为学生的我们在文艺作品中领略的浪漫表达。“沉浸悲

伤情绪”叙事的文学性掩饰了其事实上的模糊性——当时访谈语境中的忧伤可以与很多问题联系起来，不利于对心中复杂意义集成的揭示。

参考文献

- [1] Peplau, L., & Perlman, D. (1982). *Loneliness: A Sourcebook of Current Theory, Research and Therapy*. New York: Wiley.
- [2] Kitzmüller, G., Clancy, A., Vaismoradi, M., Wegener, C., & Bondas, T. (2018). “Trapped in an Empty Waiting Room”—The Existential Human Core of Loneliness in Old Age: A Meta-Synthesi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8(2), 213–230.
- [3] Nyqvist, F., Cattan, M., Conradsson, M., Näsman, M., & Gustafsson, Y. (2017). Prevalence of loneliness over ten years among the oldest old.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5(4), 411–418.
- [4] Holt-Lunstad, J., Smith, T. B., Baker, M., Harris, T., & Stephenson, D. (2015).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2), 227–237.
- [5] 凯博文, 2010, 《疾痛的故事 : 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 方筱丽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何处是吾乡

——2022年上海封控时期沪籍同学的回家之路³⁹

当你失去了家乡，还能回到何方？

2022年三月以降的疫情以及随之而来高压的封控防疫政策，构成了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例外状态”，也让“精准防控”的上海神话自此幻灭。一方面是失信于民的官方话语，另一方面是不断被清洗的网络舆论场，丰碑时间与社会时间矛盾的舂融使得“上海”这一意象失去了原本的内涵，自2010年世博会以来十多年树立现代城市典范的努力可谓付诸东流。当上海的封控政策击碎了新冠以降社会生活的“自由”与“正常”，从“羊”到“烟火气”的疫情话语不断地被生产和使用，这场轰轰烈烈、代价高昂的卫生运动也逐渐证成其作为政治运动的内核。

而大学校园则由于其政策、资源等种种禀赋，成为了封控期间社会意义上的“象牙塔”。封闭管理的校园内，同学们通过对于校园生活的积极参与，进一步地完成个人意义上“象牙塔”的创造。在多方政策压力下，面临回家或留校的艰难抉择，在校的沪籍同学既难以割舍共同参与并创造出的“象牙塔”内“自由”、“正常”的生活，又几乎无法面对“上海”意象幻灭后的家乡。

关键词：例外状态 社会时间与丰碑时间 卫生运动 政治化

- 一、例外状态中“上海”的幻灭：网络虚拟实践中的社会时间和丰碑时间
- 二、学校作为“象牙塔”的创造：以志愿服务为例
- 三、被封控击碎的“自由”与“正常”：失去了“上海”，我们无处可逃
- 四、结语：例外状态下正常生活的幻灭与艰难的回家之路

一、例外状态中“上海”的幻灭：网络民族志中撕裂的社会时间和丰碑时间

随着新冠疫情彻底改写人类实践的历史轨迹，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主导下的虚拟实践当中。网络民族志大量涌现，赵旭东认为这一演变趋势将使人类学发生如下

³⁹ 作者：任卡娜。本文为《医学人类学》期末作业。

变化：民族志之变、田野地点之变、社会之变、个人之变以及文化之变等⁴⁰。网络民族志将完成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三部曲的接续，即从书房人类学到田野人类学，再到网络人类学，隐含着当下世界人类学书写的文化转型，影响着人类学惯常使用的民族志书写和传播的旧有模式。互联网虚拟实践消除或抹平了传统人类学文化研究的界限与差异，网络民族志的兴起也势必意味着书房人类学、田野人类学当中的理论框架需要在新的实践形式中完成扬弃的演化。

在田野人类学阶段，Michael Herzfeld 在他的批评性文化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y）著作《A Place in History》一书中提出克里特岛上属于岛民的社会时间（social time）与属于所谓文化遗产保护者的丰碑时间（monumental time）之冲突⁴¹。近年来，随着对于中国大陆网络舆论场的监管呈现逐渐上升的高压态势，在 2022 年上海封控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中，明显地分化出了两种叙事：不断地被“404”的社会时间叙事和属于官方的丰碑时间叙事。二者的冲突在 2022 年的上海封控时期的网络空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代表性事件为象征社会时间的“四月之声”和披着社会时间外衣实为丰碑时间的“烟火气”。

● 被“404”的社会时间

Michael Herzfeld 文化遗产研究中所探讨的全球价值等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伦理（ethics）、美学（aesthetics）和语法（grammar），其中“语法”是他重点想要探讨的对象：因为语法帮助人们思考，思考事物的形成。对道德的理解是人之异于禽兽者，而对错的评判牵涉到的是一种语言学道德（linguistic morality）。但当上升到所谓的道德体系，也就不单纯是对错的评判，而参杂了更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人类学家必须对此保持批判态度。2016 年 Herzfeld 在复旦当代人类学讲坛发表的题为空间区隔、价值等级与话语权力的演讲中曾有言：“有时候人们会故意违反道德，违反规范的语法体系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如说作诗，或称之为诗性事实（poetic fact）。在日常生活中，常识告诉我们偷窃是不好的，但在特定的文化情景当中我们还是会违背所谓的道德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社会诗性（social poetics）。”

《四月之声》在网络上的流行可以说就是例外状态下，社会诗性仍然存在的明证。封控政策下达和执行的初期，由于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与医疗资源调度配给的问题，以微信公众号、微博超话等为代表的网络舆论场成为了困境中市民的求救手段之一。尽管需要承认，网络求

⁴⁰ 赵旭东. 网络民族志的涌现——当下世界人类学书写的文化转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5):33-45.

⁴¹ Herzfeld, Michael. A Place in History: Social and Monumental Time in a Cretan Tow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https://doi.org/10.2307/j.ctv173flw7>.

救也具有其伦理难题，即打乱了原有的资源调配顺序，让那些没有获得网络资源优势的求救者、等待者陷入更深的困境，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并不妨碍这些网民们在这段例外状态中的“疾痛叙事”作为社会时间叙事而存在着、证明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卫生运动给原本的社会生活画上休止符，一切进入“战时状态”，一切服务于“打赢新冠疫情攻坚战”。2020年来的疫情，应验了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变成了常态”，但是2008年起保罗·法默、凯博文、金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们在《重新想象全球健康》一书当中关于全球健康公平的讨论仍然没能在2022年的上海被解决，原本存在的结构性暴力和资源分配不均被例外状态放大，有更多人基本的生活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试图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流离失所的农民工、患慢性病的老人、盲人、急性病发作的人，不一而足。

长期以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试图通过举报-删除的审查机制帮助用户鉴别内容的“正确”、“可信”与否，但是当一段由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发布会音频和弱势群体“真实”的求救音频结合上海航拍的黑白画面的《四月之声》，被这种审查机制所否定和删除，即被审判为不实的、包含敏感内容的、禁止传播的。上海市民出于对这一审判结果的不满、长期高压封控下人民声音无法被听见的愤怒而在几日内不断接力传递各种形态的《四月之声》，原版的、镜像的、颠倒的、二维码的、永久链接的，达成了互联网虚拟实践中对于社会诗性的共识。

而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语法”的崩塌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伦理”、“美学”的崩塌这些互联网虚拟实践中的绝对权威原来所设置的、试图加诸于虚拟实践所有参与者的道德体系，都必须因为《四月之声》这样具体的事件而发生改变。但这一要求同时又是无法完成的，因为这一审查机制的主体是人工智能，也就是超出了特定的人的主观意愿之控制。这一社会诗性事件也因这种不可能性显得愈加壮烈，也从而促使社会时间中的上海进一步和丰碑时间中的“上海”完成了脱钩与决裂。

● 失信于民的丰碑时间

而对上海人民来说，丰碑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矛盾或许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已经成为了习以为常的生活的部分，也即另一种日常化的例外状态，人们知道新闻里总是播放着好消息，绿化带的花争奇斗艳地迫切想要证明上海的士绅化进程俨然已经完成，人们似乎真的可以老实地相信上海世博会那句印在大街小巷的丰碑时间的代表性标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但是对此的冲突和反感从来没有像2022年春天这样强烈，城市生活脆弱的可持续性在严苛的隔离、静默政策下暴露无遗，封控管理创造出了大量诘屈

聱牙的新词汇，这场旷日持久的卫生运动也日益显露出政治运动的端倪。

“烟火气”就是其中一例：当大部分上海市民还在居家隔离的状态时，电视新闻已经开始播放上海逐步解封、市民出门买菜的影像。据媒体人李厚辰称：在上海之外，看到的是疫情数字好转，复工复产，社会一片生机盎然的恢复景象，如媒体所述，“人间烟火气，正袅袅升起”。⁴²对此，笔者的一位受访者表示：“骗我可以，注意次数。”

我们不难联想到 Herzfeld 讲述的克里特岛上的故事并由此展开对比：评判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value system）变成了上海市民生活的评价标准，玛雅金字塔塔底的石碑上清晰刻印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写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释变成了电视新闻、官方公众号中宣称的“烟火气”，玛雅语变成了被“404”的求救文章和微博。结合克里特岛的驱逐（eviction）现象，一些人被从他们世代居住的房屋里驱赶出来，Herzfeld 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原因导致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e violence）的结果。换言之，试图披上社会时间外衣的丰碑时间正是另一种互联网虚拟实践中话语权不平等所导致的结构性暴力的产物。这样的丰碑时间试图通过新闻等具有权威性的媒体创造出新的话语，来改变和重塑社会时间下生活的评价标准。只是这样的改变和重塑并不是介乎一个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国际组织和“不谙世事”的玛雅人，而是介于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这也注定让社会时间和丰碑时间的撕裂成为这一例外状态下必然的结局。

社会时间与丰碑时间的撕裂，宏观上意味着 2010 年以来上海这座城市的管理者所苦心经营的“上海”这一意象失去了原本的内涵，十多年来树立现代城市典范的努力付诸东流，其遗患将在往后的很多年当中缓慢发作，长久地影响上海的城市发展。

二、 学校作为“象牙塔”的创造：以志愿服务为例

2022 年的例外状态下，“上海”意象的幻灭在经济等宏观层面的影响不可谓不小，但是仍然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疫情中的社会似乎受到了政治力量的整合，因而在紧急状态中全副武装地抵抗疫情的打击。疫情中的人们以校园、封闭气泡、封控楼宇等更小的社群为单位，试图在权力的缝隙中或小心翼翼、或堂而皇之地模仿正常状态的生活轨迹。2022 年 3 月上海封控至今，大学校园由于其禀赋的特殊性，持续获得足够的物资供应保障和社会帮助。因

⁴² <https://mp.weixin.qq.com/s/hB0JyjN9mWvUjPitUXG5UQ>

此，相比于校外抢菜、硬隔离等生存压力畸高的环境，校园生活的最大挑战也仅仅是在物资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管理和规划好封闭园区内的数万人的饮食起居，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象牙塔。

在此期间，笔者所在的校区由于严重缺乏管理人员和校工，完全依靠校园志愿者队伍补给完成了两个多月封闭生活的管理任务。其中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为楼宇自治，即每栋楼指派一名同学作为楼长，承担包括园区管理通知和联络、统筹协调楼内志愿者、订餐、订水、防疫与生活物资的分发等等任务。笔者有幸对其中的4位楼长和3位志愿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内容详见附录1和附录2。

● 楼长：分享的责任、内疚与认同

起初，楼长们应下这一任务的共同特点在于：1) 不愿意单纯做一个受施者；2) 希望通过工作保持一定的交往和外出活动；3) 希望为维持同学们正常生活的秩序出自己的一份力。而在这两个多月的过程中，由于校园管理任务之艰巨远非起初的一腔热血所能承受，楼长们的经历同样有一些相似之处：1) 轮换交接完成楼长工作或者与其他同学共同分担工作；2) 有着不同理由和程度的崩溃时刻；3) 认为没有权力指责他人；4) 有过对于所承担职责的自我怀疑。在完成工作交接或截至采访时，楼长们同样对自己的工作有以下认可：1) 保障了楼内同学的基本生活需求；2) 希望得到同学们应有的尊重和体谅；3) 对于自身的工作进行反思。

● 志愿者：自由选择下的责任

相比于楼长所承担无法逃脱的责任，志愿者则是提前一天左右招募，工作自由度较大，基本属于“一趟头”的工作。有受访者认为，这种工作的主要特点在于需要人去“打头阵”，让同学们了解到这一岗位的存在以及相应要求，大家就会加入进来。另外，由于不同封控阶段，志愿者岗位对应工作内容也有所变化，如从小推车送餐到三轮车送餐再到无人车送餐，以及单纯的核酸、送餐志愿者演化到修理电脑、理发志愿者等，志愿者的工作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自由度。本次访谈涉及3名志愿者，均在两个月中参与了较多的志愿者服务。同时，志愿者也和楼长一样有着崩溃时刻、对于工作价值的认可。

可以说，在校园管理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当中，楼长们、志愿者们以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是心理健康为牺牲，承担了超乎正常的学习生活中所能承受范围的志愿服务工作和管理任务，忍受着由此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并在个体的认识层面完成对于楼长、志愿者等工作意义的赋予，也共同参与构建了校园作为“象牙塔”这一意象。

三、被封控击碎的“自由”与“正常”：失去了“上海”，我们无处可逃

● 回家作为一个可选项

当“回家”作为一种选择重新出现时，在两个月来的所有校工、老师、楼长、志愿者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校园作为“象牙塔”这一意象也完成了其在所有参与构建者认知中的确证。所有参加过校园管理、志愿活动的受访者均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校内的生活是更“好”的，或是从物资供应上，或是从整体管理上，或是从满足期末季的学习需求上。

根据附录3中的访谈结果，大部分沪籍同学均有回家的主观意愿，无法回家的主要原因是家仍然处在封控区。但其中一位承担楼长工作的同学表示，“不想换环境，不想离开相对舒适的、习惯了的、相对真空的校内环境”，而且“楼长工作交接也一度是不愿回家的主要原因”。虽然如此，根据附录4中的访谈结果，除了一位非沪籍的受访者对于上海的这座城市的印象持肯定态度，几乎所有的沪籍受访者均表达了“失望”、“惊愕”等负面情绪，更是有位同学表示“三月以来的封控将原本就被阉割掉的‘自由’生活完全毁掉了，不想让自己的后代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德准则会轻易崩溃于畸形的政治高压下的社会”。

换言之，虽然几个月、甚至几年来没有离开过上海的土地，到而今“回家”作为一个可选项，这些沪籍同学们实际上也已经不可避免地对于“上海”作为家乡以及“回家”等认知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否定。而校园这座“象牙塔”，作为封控期间所有受访者居停时间最长的物理空间，作为“无家可归者”的居所，独立于“上海”这一家乡而存在。

● 被封控击碎的“自由”

进一步地，当追问部分受访者：“家里和学校，哪里更自由”这一问题时，出现了非常鲜明的矛盾答案，观察到越是积极参与到“象牙塔”建构当中的人，越是倾向于认为学校更“自由”。对此，笔者试图做出解释：例外状态下的封控生活已经重塑了受访者对于“自由”的认识，尤其是将活动空间局限为校园内且能够满足基本学习生活需求视为新“自由”。这也是例外状态日常化如何日常化的佐证：人们越是积极地参与到“象牙塔”的构建当中，也就通过行动越是接受了一种日常化的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下，当我们试图讨论“自由”这一基于社会契约论之上的现代民主理论中的概念时，会为其中埋藏的矛盾而感到“惊愕”，正如所有经历了封控的受访沪籍同学对于上海的态度转变一样，其本质上是发现了基于社会

契约论之上的现代民主理论框架所不能归类的部分，但竟然又是我们生活当中确确实实存在的、并且正在被我们的实践所不断日常化的例外状态。

例外状态学说作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的基础，也揭示出被霍布斯所创立的现代政治哲学传统所掩盖的一个脉络。政治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跟法律相关的，基于社会契约论之上它发展出一整套完备的现代民主理论；一部分是跟法律之外的例外状态相关的，它是民主理论难以容纳和驯服的危险的部分。后者这条基本脉络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紧急状态下的“必要性”的政治理性原则，即“必要状态下无法可言”。⁴³例外状态对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霍布斯正是将“必要性”从紧急状态或极端状态的具体情势和特殊个案提升为普遍意义上危及个体的自我保存的“自然状态”，才为整个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在霍布斯创建了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论的现代政治哲学传统之后，与例外状态相关的主权权力、执行权和制宪权的政治就纳入到三权分立的民主体系之中了，作为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论的开端的例外状态问题也被隐藏起来了。⁴⁴

● 回不去的“正常”生活

例外状态其实远非罕见，甚至如本雅明所言，“例外状态已经变成常态”。比如，中国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上也是处在一系列不间断的例外状态之中，改革开放所走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对过去各种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悬置。中国法学界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良性违宪”，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就是，通过悬停搁置当时已经制约社会发展的法制以创建新的政治实践。⁴⁵

而相对于例外状态的“正常”，大部分受访者均认同以 2020 年或 2022 年 3 月作为上海两种相对“正常”的状态。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表示即使是 3 月也不算“正常”，因为 2020 年以降，从出国旅游或交流到自由进出校都已经大受限制。受访者普遍的共识是：尽管希望回到 2020 年之前的“正常”生活，但是也能够明白那种“正常”的一去不复返。

⁴³ Bruce Ackerman, *Before the Next Attack: Preserving Civil Liberties in an Age of Terror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⁴⁴ 罗斯托，《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孟涛译，华夏出版社，2015 年

⁴⁵ 张旭. 阿甘本论例外状态[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1):119-127. DOI:10.3969/j.issn.1004-5961.2018.01.016.

四、结语：例外状态下正常生活的幻灭与艰难的回家之路

对于非沪籍的同学，还乡或许意味着一到两周的隔离以及随之而来仍然称得上“正常”的生活。而对于沪籍同学，上海封控已经撕开了网络舆论场中的社会时间与丰碑时间，让“上海”作为故乡的意象随着“正常”、“自由”的生活一同颠覆于例外状态之下，并且通过志愿实践重新建立了校园作为“象牙塔”的新意象，最终仍然难逃“回家”的抉择。

楚辞言：“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空间上的家乡易返，心灵的家乡难归。

上海动物园里的人类学观察⁴⁶

这篇报告是我在阅读文献材料时被哲学人类学所吸引，于是尝试着在有限时间内了解现象学方法，并在田野调查的参与式观察中展开的。本文试图通过对于上海动物园里人与动物互动关系的人类学观察，来分析哲学理论尤其是德里达的动物思想中人与动物的“界限逻辑”。

一、反思“想当然的预设”

我自己生命中前往动物园的次数屈指可数，在前往动物园之前，我曾经进行过一番简单的预设

其一，十一国庆节去上海动物园，游客一定是人山人海。（与我一起前往的上师大英语系同学翻译为“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这一预想不出意外被证实了。

其二，根据百科以及官网资料，上海动物园作为全国十佳动物园之一，有“优美的园林景观、精彩的野生动物世界、生态化的野生动物展区、人与动物和谐共处”，我期望本次游览能与我持有的生态伦理基本观念相一致。而这一猜想的结论是：在这个城市动物园内，我依然看到人与动物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看到的是被刻板地展览和布置出来的野生动物世界，以及在动物园叙事中建构出来的生态伦理。

其三，人观赏动物时在将动物视为“他者”。这一猜想在我了解了德里达的动物思想后进一步丰富为：人类对于动物的建构行为中，动物始终是以与人类主体相对立的客体身份存在——静默的他者。这一“静默”不仅是在哲学层面象征意义上的，在我的观察中，城市动物园里的动物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动物在哲学史上、在文学的描写中生命本真的失去在现实的动物园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检索并初步阅读了一部分人类学视角观察动物园的中英文文献，中文文献中拥有人类学视角的篇数寥寥，而英文文献关于“zoo studies”的更多的还是集中于法律经济这些领域，人类学的文献较少。（当然很大可能是我检索技巧不够）。我发现，必须要结合一部分哲学理论中人类动物关系命题，先分析我观察动物园的棱镜，打开更大的审视人与动物关系的新窗口，才能进一步挖掘动物园研究的理论价值，因此我邂逅了哲学人类学。

⁴⁶ 作者：韩和融

二、哲学人类学方法的引入

在文献材料的阅读中，我发现相比于从经济、法律制度、文化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动物园研究（zoo studies），我对于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的方法更感兴趣。这方面的著作比较艰深，但哲学人类学试图把具体科学关于人的知识和形而上学对人的思辨结合起来，去考察完整的人，这一视角给我很大的启发。虽然说在曾经阅读现象学理论著作时我感到十分挫败，这次我发现一本运用现象学方法对于动物园中游客动机的书籍，*Why do we go to the zoo? : communication, animals, and the cultural-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zoos*（Erik A Garrett, 2014）。此书延续胡塞尔的传统，对于游客在动物园中的交际经验与参观动机进行了现象的调查，既介绍了哲学领域中的现象学方法，也追溯了动物园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演变模型，非常适合我这样哲学基础薄弱的人阅读理解。

人类学初衷是对人的经验现象的全面研究，以形成完整人的认识。然而由于过于细的分科，使得完整的人的认识无法整合起来，并且缺少一种哲学的超验维度。就从《人类学的挑战》这一本教科书来看，各个章节之间，仿佛都是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比如民族学、语言学、生物学的范围内展开人类学研究。虽然说教科书给出了四分类同心圆的图示，但我认为人类学内部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常见的学科细分所形成的，不能用分类的思维去理解人类学和“XX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我对于人类学的体会还在不断探索的阶段，目前的认识是觉得不能用“知识树”这一模型去将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从属或分化性的，而是直接面对知识的总体去把握整全与分化两种历史中不断辩证运动的方向。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贯穿始终的理论逻辑是在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超越于经验、形而上与形而下、本体与现象之间进行还原和归化。哲学人类学是人类学向哲学的回归，其目的是重建完整的人的形象。在方法论上，对于哲学人类学来说，首先需要建立一种独立于伦理学、心理学的“纯粹人类学的观点”，就是现象学和释义学的方法，从个别现象，从人表现出来的某种显著特征去出发寻求现象和特征背后的本质。人类学在新学科不断产生和分化的时代产生，追寻着对于人的整全性的理解，重建哲学人类学在两门学科之中都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也面临着很多的来自于形而上学、科学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方面批评。无论是要建立一种完整人的形象或是一种“元人类学”，都是一种开放式的回归，不断趋近的过程。

哲学人类学目标是从完整的主体出发，既要运用经验科学的某些成果，又要对人加以形而上学的反思，恢复人在世界中的本体论地位。我被这门学科的魅力征服，因而也想沿着这

条路径进行一次的尝试。胡塞尔现象学是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一是现象学的还原，二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三是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是现象学“面对事实本身”的内在要求。我将在篇尾解释我对于现象学方法的运用。

三、静默的他者

“动物处于被观看的地位”，这是我作为一个不成熟的人类学观察者在看到趴在地上的狮子时脑海里闪过的第一句话，“游客们模仿动物的叫声，而动物们失去了声音”。在我朴素认识中，哺乳动物起码得会以可以观察的方式进行生物活动，而我竟然无法观察出十米外围栏里的狮子有什么我肉眼可见的生命活动，眼前仿佛是一幅“美人春睡”的油画。而与彼处的静止相比，人流围绕着栏杆进行着“布朗运动”，一是成人们在这个场景中以模仿动物的叫声焕发出了“动物的野性”，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二是几乎没有一个使用手机的人不打开相机对于眼前静止的画面进行摄影定格；三是小孩子们对于动物的相对的乐于表达自己对于动物行为的认识，并且有意识地进行人格化猜想。在动物园中，动物与人不仅被一道围栏划开了边界，并且在观看与被观看中划定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作为真实的生物生存，而是在作为一个种群的单一样本进行展览，而讽刺的是，动物园竟然宣称能够通过此种对于一个种群中的个体的个性泯灭后进行展览，从而达到保护整个种群的目的，通过把人与动物放到如此截然二分的处境，来达成人与动物的和谐。



被一众游客称赞美丽的羊驼（作者拍摄）

德里达在《动物在，故我在》中就设置了一种动物与人的处境置换的场景，来体现当代社会的一个悖论现象，即在动物问题上，同情和暴力并存。他在书中戏剧化地呈现了“我”因在猫面前赤身裸体而感到羞耻，但同时因自己在一只猫面前产生羞耻感而感到羞耻。德里达首先分析了第一种“直接的羞耻感”，其原因是像动物一样赤身裸体。然而“自然”并无裸体的概念，而是一种情绪或感受。这是一种迷惑的日常体验：在人与宠物的关系上，在家宅空间中，“我”与猫的身份界定本是十分清楚。然而在这戏剧场景中，这只误闯浴室的猫是“一只真实的猫”，此时它是观看的主体，是一个轻盈动物的存在，它拒绝被归类、拒绝被概念化和种属化。这一场景是与传统知识脉络相背离的。一直以来，人们把动物看做被观照的对象，从未考虑过动物的注视，这一思维定式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在神学源头上亚当通过命名建立了人对于动物的绝对统治权。人作为“自传性的动物”，人类致力于将自我塑造为不同于动物的高贵群体。而这种形而上学的认知策略显然遭到了德里达的质疑。

在上海动物园里，动物几乎全部都是寂静无声的，老虎、狮子和熊猫都仰卧在地，周围却此起彼伏传来游客中摹仿老虎的叫声“嗷呜”，其中既有稚童也有成人。羚羊、斑马和大象都在很有限的空间内活动，马在一个小菜园载着一波又一波游客。虽然说动物园以动物命名，“游客”中有一个“客”字，但在这个空间里，人是观看的主体，而动物是绝对的他者，这是因为人与动物之间的沟通存在着绝对的他异性，甚至将各种各样的生物中，给人赋予特殊的地位，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

如画般在我的面前呈现的动物，实质上是一面视线无法穿透的镜子，在这面镜子中，人们看到自己，也只能看到自己。我的同伴也说“究竟是人看动物，还是动物看人？”假如仔细的看看大象的研究，在动物他者的注视中，人类的主体性不过是一个幻想。

从根本上说，有两类关于动物的话语、两种知识立场、两类理论。一种传统是将动物当做为人类关照的对象的人类中心主义，另一种则是将动物作为独立的生命主体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传统在对待动物的问题都体现了语言中心主义的概念，即人占有支配地位。哲学传统中笛卡尔、康德、列维纳斯都在理论中阐述了动物的劣等原则，这种思维定式至今仍然主导者当代社会人们认知动物的方式，仍然表现于动物园的展览、语言介绍中。其尽管在某些理论领域的交锋中败下阵来，却依然存续于普遍的社会生活之中。动物园将动物和人类划为两端，采取人类认识动物、拯救动物的叙事，以人类为中心，凌驾于万物之上为世界制定规范与秩序。但在所谓的“人类”界限的一端之外，即人类的对立面之外，并不是动物或者动物生命，而是异质化、多种多样的生命形式。几乎所有的二元对立与不平等都

可以在动物的歧视中找到依据，正确看待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逻辑，才能深刻挖掘物种歧视与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歧视之间的勾连共谋，从而揭示文学和文化中对于动物的掠夺式的利用。



游向游客的天鹅（作者拍摄）

四、现象学方法于人类学观察中的运用思考

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超越之物都必须给以无效的标志”，将超越之物悬搁起来。“悬搁”包括“观念悬搁”与“判断悬搁”两个方面，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观念需要悬搁起来存而不论，对于所有外部世界的判断都需要放弃。但既然关于世界的知识被“悬搁”起来，因此失去了对于世界的表态，只有再进一步进行“先验还原”，才能建立起自明的秩序。Erik A. Garrett 对于动物园中交流语境的调查在我的理解中只是阐述了“观念悬搁”这一重要前提，对于之后的先验还原的进一步现象学方法则没有体现出来，对于现象学的直观也没有进行阐述。

现象学的直观是对于意识流的横截面的本质直观，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在描述性的认识的基础上发生的且作为科学方法在一个明确的、最终在描述的被给予性中证实自身的操作中进行的”横向本质直观。纵向的本质直观就是意识的纵剖面，即历时的、动态的本质发生。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指出现象学的方法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将科学划分为先验科学和经验科学，而是运用着两种划分方法，各自对应于两组对应物：事实和本质、实在和非实在。现象学的先验还原原则正是排除实在之物，达到非实在之物。

我的理解是现象学的悬搁方法在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田野观察中是能够适用的，因此我也找到很多领域用现象学悬搁方法的文献。但是先验还原是对于现象学悬搁的彻底化，需要根本上切断世界和意识对象的联系，那么剩余的是“绝对意识的全部领域”，也就是“纯粹意识”。因此先验现象学与普遍的心理学区、本质心理学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因为以现象学与诠释学为方法论的哲学人类学保留了通向纯粹意识、先验自我的哲学途径，显得和人类学这一有实证色彩的学科格格不入。就像医学哲学这门学科不是简单的两个学科求交叉，神经伦理学也不是简单的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结合，总之，一些我之前称为“交叉学科”的领域，给我致命的吸引的同时也让我知道在这样的学科中找错方法，也是一件“致命”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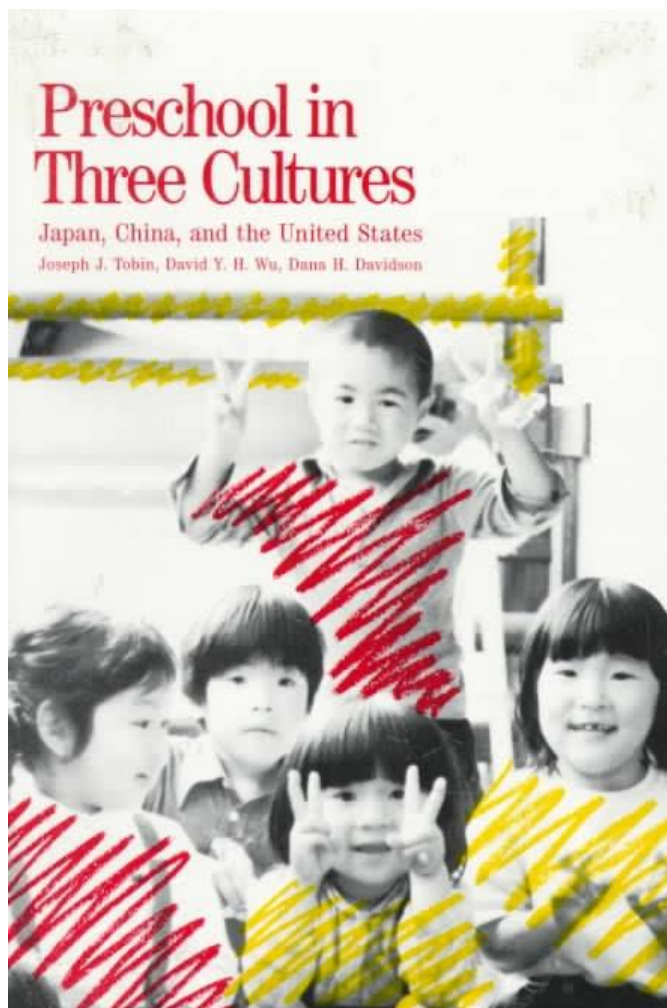
在我的观察中，我非常努力地想要做到“悬搁”，也就是撇去我对于动物园的以往经验。但是德里达的动物思想也是我没有办法抛弃的理论分析工具，其实我掌握的理论工具真的不多，所以“悬搁”对我来说，就没有 Erik A. Garrett 做的那么游刃有余。至于如何进一步先验还原，现象学的描述不是事实陈述或者再现，而是在本质直观的基础上进行的，以此达到对于事物本质的洞见。本次田野调查只是一次初步实践，我还需要深入学习哲学概念，才能做到真正应用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 [1] Erik A. Garrett. (2014). *Why Do We Go to the Zoo? : Communication, Animals, and the Cultural-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Zoos*.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 [2] *Anthropology: The Human Challenge*, 11th ed. (2004). Reference & Research Book News, 19(4), 76.
- [3] 尚未肖.(2017).德里达的动物思想研究,河北大学
- [4] 庞红蕊.(2014).德里达的动物问题. 求是学刊(02), 31-38.
- [5] 赵旭东.(2014).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32-48. doi:CNKI:SUN:GXZS.0.2014-02-011.
- [6] 王晓东.(2003).生存论视域中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一种对主体间类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 人文杂志(01),15-22.
- [7] 丁立群.(2001). 实践哲学人类学论纲, 黑龙江大学
- [8] 傅永寿.(1999).哲学人类学——人类学向哲学的回归. 黑龙江民族丛刊(03), 82-86.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⁴⁷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以下简称《重访》)的作者为约瑟夫·托宾(Joseph Tobin)、薛烨和唐泽真弓(Mayumi Karasawa),作为1989年出版的《三种文化的幼儿园》(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的延续和修订。主导前后两本书的约瑟夫·托宾现任教于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其博士生导师之一为Robert A. LeVine(“六文化”项目的主导人之一),托宾深受其文化比较和民族志方法的影响。



△ 《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英文封面

⁴⁷ 作者: 胡凤松、张睿俞、王焱



△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英文和中文封面

第一本书以共时的、跨越空间的视角，比较了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得到的主要结论为“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是反映和传递文化心理理念的机构”，重访之作则加入了历时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的传承和变化，在解释三个国家幼儿教育体系的现状与大环境的关系、揭示每种文化的隐藏文化脚的同时，试图和全球化理论对话，询问“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教育是差异越来越大了，还是趋同了？”全球化的现代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世界会越来越趋同，但是本书作者通过扎实的民族志资料，说明地方在发展的过程中，既会融合外来文化，也会抵抗外来文化，还会保持自身的特性。可以说，在本书中，幼儿园是社会各个领域、各种利益、各类社会成员的交汇之处，也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其所处环境的文化、政治和经济。

《重访》中所使用的方法别具一格，作者称其为“用录像引发的多重解释比较民族志研究法（video-cued multivocal ethnography）”，具体操作步骤为：（1）拍摄每种文化中幼儿园的一日生活；（2）把拍摄到的录像剪辑成二十分钟的短片；（3）将剪辑好的录像给所摄班级的老师观看；（4）请该所幼儿园的其他老师观看；（5）请这个国家其他幼儿园的教育工作者们观看；（6）最后请其他两个国家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们观看。从这些步骤中可以看出，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视频为开启话题的线索和由头，让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对这一话题进行评论，从而使那些对参与者或本文化中的人而言非常熟悉的文化陌生化，形成多方的对话、多重的声音。也就是说，本书民族志资料的来源不仅仅是视频所呈现的事情本身，更多的数据来源于这种混合的、多重的、对话的话语。

本研究中使用的录像

中 国	昆明大观幼儿园 1985 年	大观幼儿园 2002 年	上海思南路幼儿园 2002 年
日 本	京都小松谷保育园 1984 年	小松谷保育园 2002 年	东京真茶香幼稚园 2002 年
美 国	夏威夷圣提摩西 1984 年	夏威夷圣提摩西 2003 年	凤凰城阿尔罕布拉 2002 年

《重访》中所使用的录像

对于中国部分，作者所讨论的资料有云南昆明大观幼儿园 1985 年、2002 年，上海思南路幼儿园 2002 年的录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基于这些录像资料的评论。在观看大观幼儿园的录像时，有三点引起了日本和美国观众的强烈反应，分别是寄宿班制度、绝对权威的灌输式教学和简陋的设施。寄宿班制度反映了中国幼儿园的历史，从 1949 年以来，幼儿园的主要任务即是家长解决后顾之忧，使得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投身到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大观幼儿园的员工对她们提供给孩子的教育和保育质量感到自豪，并且毫不认同孩子最好或通常应该由母亲来照料的观点。这一制度在 1987 年后在大观幼儿园取消，一方面 1987 年时大观幼儿园的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其投入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的幼儿教育开始强调教育功能而非保育功能，老师和家长希望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日本和美国观众引起不适的绝对权威式的教学，比如说录像镜头中有老师要求孩子在吃饭时不要说话，又比如说在积木活动课中，要求儿童像小学生一样，成排地坐在桌子后面，根据图纸搭积木，强调老师对孩子的“管”，这种做法在已经发生了转变，2002 年大观园的录像显示，老师开始让儿童自由地拼积木，活动现场氛围活泼，教学模式从以老师为中心转向了“尊重幼儿、主动学习、个性化教学、游戏为主”的教学。

而且相较 1985 年，2002 年时大观幼儿园的基础设施也有极大的改善。作者着重分析了其中厕所的变化，1985 年时，大观幼儿园的幼儿成排地如厕，男女只是分立两侧，中间并无挡板隔开。这被日本和美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批评为没有完全尊重孩子、保护隐私和顾及性别差异，而随着中国努力跨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人们的自我、隐私、空间、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身体的两个观念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幼儿园和其他环境中无隔断公共厕所慢慢消失，男性和女性的分隔也越来越早，性羞涩和性启蒙也逐渐渗透到了学前教育中。

在 2002 年重新做这项研究时，研究人员还加入了代表中国幼儿园现代化先锋的上海思南路幼儿园，其可以集中体现中国的幼儿教育改革，即强调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作者主要介绍了上海思南路幼儿园的两个活动，故事大王和社会角色游戏。在“故事大王”活动中，

一个小孩先讲完一个故事，其他小孩在老师的指导下投票是否授予故事讲述者“故事大王”的称号，并且说出各自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之间互相批评。这引起美国和日本教育工作者的争议，在日本教育者看来，应该鼓励儿童自我批评，但不能鼓励相互批评，因为幼儿园是培育爱心的地方，不能过于强调头脑而忽视爱心，美国老师则担忧这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但中国的老师认为批评并不会让人难以接受，而且儿童的批评反映了儿童的思考方式。社会角色游戏也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老师在里面主要是游戏的参与者，和孩子一起扮演警察、护士、超市老板、病人等角色，从而让孩子理解社会生活的意义。

虽然思南路幼儿园体现了幼儿教育中师生平等、以孩子为中心、以游戏为主等理念，但并不代表思南路幼儿园是中国幼儿教育的未来，中国的学前改革是一个有争议的、多方互动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幼儿园以读经运动为主要特色，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以老师为主导的课程是中国的过去，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是现在，而多种形式的融合并用会是未来。

日本的部分，作者将 1984 年和 2002 年的京都小松谷保育园以及 2002 年的真茶香幼儿园的影像素材进行对比，并讨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这些影响的看法，对这些录像背后隐含的不同社会文化进行深入地分析。1984 年的京都小松谷保育园有一位扰乱课堂、经常欺侮别的人孩子弘树得到了日本以外的影片观看者的极大关注，尤其美国学者将“弘树问题”看成了一个完美的罗夏（Rorschach）墨迹测验的案例，假设弘树具有反社会甚至伤害他人的文化倾向。这种特别关注使得小松谷保育园园长感到不满，对于日本的老师来说弘树只是众多学生中普通的一员，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对于“弘树问题”的不同理解，进一步引入了作者对日本幼儿园不干预孩子之间冲突和纠纷而采用“在一边等待观察（mimamoru）”做法的深入分析。当孩子产生冲突纠纷的时候，日本幼儿园的老师通常不会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通常美国和中国的老师会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对学生的一种漠视。但是实际情况是，京都小松谷保育园的森田老师对班级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表示在孩子遇到危险和情况不可控制的时候便不会袖手旁观，森田老师强调需要给孩子实践和空间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同样面对纠纷东京真茶香幼儿园的贝塚老师在两个男孩拉头发的纠纷中采取紧追不舍非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做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森田老师的方式背道而驰，但实际上同样反映了教师们使用各种方法促进儿童社会化。日本老师认为孩子能够从纠纷中学会“诉说悲伤”（itte kanashii），使得孩子能够通过表达自我的悲伤情绪更好地融入和了解他人，这种强调自己情感意识的移情感受被认为能够推动孩子亲社会的行为。另一种通过培养移情能力促进

儿童社会化的做法是小松谷保育员让大孩子照看婴幼儿，这给大孩子提供了很多施教的机会，同时也提供给孩子学得移情能力的机会。日本的教学更注重鼓励和解读他人的想法和情感，来促进心灵的发展。这种心灵的发展是为了孩子未来能够更好的社会化，幼儿园注重将孩子培养成日本的社会人，让孩子学习加入他人以及学习日本的社会模式。

在小松谷保育园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一些使美国观众不能接受的男老师和孩子们亲密无间的身体接触画面。老师搂抱孩子，充满情感地和孩子交流的画面使得美国的观众感到不安。这些接触恰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幼儿教育中的性别观念、人际间亲密关系和身体文化。日本幼儿教育工作者在和孩子交流中将身体视为开放的话题，强调身体接触和身体体验的愉悦，在近几年日本这种身体开放传统逐渐消失的危机中，日本幼儿园常被当作修复传统文化价值和还原文化实践活动的地方。

日本的幼儿教育机构极具多样性，每一个幼儿教育机构处于不同维度相互交错作用的交点上，受当地政治历史和其中各方参与者的制约。作者进一步对日本的两所幼儿园进行比较，看到了日本幼儿教育机构传承和演变的多样实践。由于私立的京都小松谷保育园的特殊传承模式，其教育方法和理念被认为几乎没有改变。相比多元化的市场取向的私立幼儿机构，公立幼儿机构全部由政府机构管理和负责，更加的整齐划一。私立幼儿机构被认为是“传递知识”而公立幼儿机构被认为是“知识发展”。当代日本幼儿机构受到低生育率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在悲观的社会氛围和国民情绪中还是像 1985 年一样，力图帮助孩子提供机会学习各种社会经验和传统价值观念。

受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像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产品在全球传播中日益增长，为什么日本的幼儿教育没有对别的国家产生显著影响？过去二十年国外学者对日本学前教育进行大量的研究，并有充分的了解。作者认为没有显著传播的原因在于日本幼儿教育深深根治于自身文化的土壤，很难脱离其文化情情境。日本特色的“自由”的幼儿教育没有基础教材也没有传播机制，日本学前教育的特征是内在的，反映很深的文化逻辑。如“用等待来关心孩子”的策略没有正式出现在日本教育院校的课本或规定的课程指导纲要中，但是日本各地的幼儿教师普遍接纳这一原则，并且这种精心策划的无为而治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才能掌握。并且日本幼儿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把日本儿童教成日本人，把日本传统价值传给儿童以加强儿童适应日本社会环境的能力。与欧美体系不同，日本不把幼儿园视为一种替代母职的机构而是更注重一对一的社会生活的教育。这些理念都反映了日本幼儿教育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根基，顺应了日本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对幼儿园能够保留日本文化交织的

渴求。

在美国部分中，为让美国读者对陌生的（中国和日本的）东西感到熟悉，对熟悉的（美国的）东西感到陌生，作者选择了美国两个不同阶层的幼儿园：圣提摩西儿童中心（St. Timothy's Children's Center）与阿尔罕布拉幼儿园（Alhambra Preschool）。前者位于夏威夷，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色，反映了人口后代混居的状况；后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公立学校系统的一部分，接受亚利桑那州政府的幼教专项拨款，为贫困家庭的幼儿提供一整年幼儿园教育。作者分别对两个幼儿园进行了共时性和历史性比较，以此揭示那些美国幼儿教育中所隐含的、人人都习以为常的假设。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全美幼教协会（NAEYC）的倡导规定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NCLB）的政策在两所幼儿园课堂实践、教师理念中的渗透以及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就此回答在美国这样基于一个听上去很好的教育理念，而提出的“标准化”规定和政策是如何影响幼儿园的理念与实践，以及如何不适用于当地幼儿园的。

作者对全美幼教协会的倡导规定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政策进行了权力上的批判。全面接受全美幼教协会的理念和质量标准指导：发展适宜性教学（DAP）理念的指导，课程仍然以选择为基础，以发展和儿童为中心；另一方面，布什总统2000年把阅读确立为他教育平台的基石——“有科学依据的阅读教学法（意指“语音意识”教学法）”作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政策依据，立为国法规定实施。但现实是两者都是压在教师和园长身上的强权，与提供完整教育、保育服务，竭尽全力满足学生和家各种需求的幼儿园相互矛盾，制约规章层出不穷。而这样的结果与美国性别、劳动力市场及阶层变迁紧密相关。

与此同时，作者通过比较两个幼儿园的相同之处，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幼儿教育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即自由选择、自我表达、个人权利和对幸福的追求。与日本不同，美国幼儿园强调自由选择的重点在于选择而非自由，其背后是由于美国对于权利和民主的强调，更主要的是它符合资本主义运作。另外，作者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宁愿投重资，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服务，而不为所有的幼儿提供服务？事实上，政策背后尤其符合美国“人人机会平等”“公正理念”的文化预设。美国强调竞争基础上的机会平等，这并不意味所有人受同样的教育，而是让教育适合个人和社区需求。其文化逻辑是，为了让有特殊需要的幼儿或生活在困境中的幼儿能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得成功的人生，所以必须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也就是不平等的）服务。总之，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与强调个人的文化信念紧密相连：突出个人权利和笃信个体差异。

《重访》一书中，作者尝试使用经济变革、现代化和全球化来考察这三个因素对幼儿园的影响，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进行对话。但其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透过这三个因素看到其背后隐含的文化逻辑（an implicit cultural logic）或者说背后的文化预设，看到文化实践以及文化传承在经济变革、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力量。通过这样一种对幼儿园跨越时代的跨文化比较，作者提醒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它们变得更好或是更坏，而只能说它们像二十年前一样都反映了各自的文化、社会和时代特点。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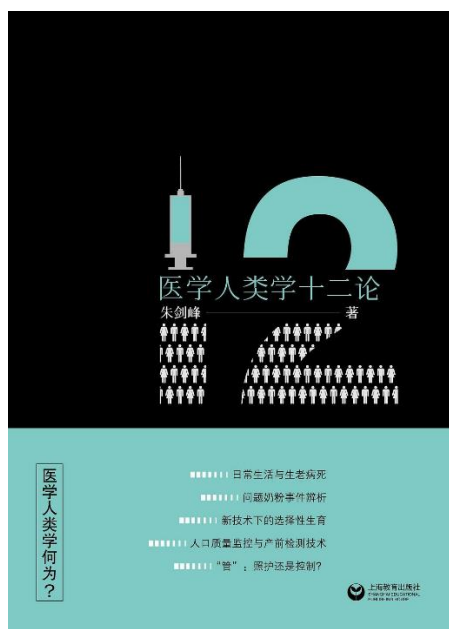
为促进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促进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学科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于2007年10月在复旦大学社政学院成立。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国际医学人类学领军人物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担任中心荣誉主任，潘天舒教授担任中方主任，朱剑峰担任副主任。理事会成员还包括其他来自复旦和哈佛的教职人员，如著名美国加州大学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和詹梅(均为复旦特聘教授)、美国戴维森学院的罗力波(复旦特聘教授)和佛蒙特大学的邵镜红(JEANNE SHEA)教授等。特邀学术顾问包括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肖泽萍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徐一峰教授、哈佛医学院陈宏图教授、复旦大学公卫学院严非教授和复旦历史系的高晞教授等。

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核心成员主要来自社政学院六大专业的跨学科团队，包括：潘天舒、朱剑峰、赵芳、陈虹霖、付芳、骆为祥、赵德余、吴国宏、陈侃、俞志元、张聪和丁玫等。

复旦-哈佛燕京学社“文化与健康”论坛是中心成立伊始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成功举办的首个跨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从2008年起，中心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推出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举办近百次当代人类学论坛、质性研究工作坊和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并积极拓展与哈佛大学人类学亚洲中心和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和社会学部、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人类学系和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师生课题合作和交流互访，在医学人类学项目合作以及课程建设等方面开始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心现阶段的研究项目包括：上海地区青少年精神卫生状况调查（田野研究部分）、多学科交叉视角中的上海老龄化社区的护理照料和社会科技与老年照护实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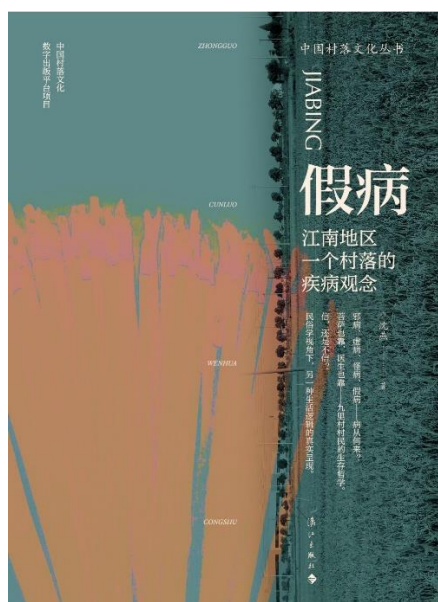
从2012年10月起，中心已经出版《复旦人类学之友》共15期（含医学人文专刊）、《政策人类学》特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复旦人类学评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书速递



朱剑峰：《医学人类学十二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

医学人类学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贯穿生命历程生、老、病、死各个阶段，与每个人对自我、身体、生命、社会的认知息息相关。同时，它对医疗健康领域的知识生产同样重要。医学人类学对当代人类生命质量的由衷关怀和对不同文化的人文尊重，使其以独特的实践性（参与性）和极强的自我反思能力让当今医学更具有人文的温度。



沈燕：《假病：江南地区一个村落的疾病观念》，漓江出版社，2022年。

本书记载的是发生在某个江南小村的疾病故事。这些故事初闻有些不可思议，但背后却承载着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生活智慧。这些生活智慧在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融会贯通为一套较为系统的地方性知识。它告诉人们如何判断自己得的是真病还是假病，又该如何预防、治疗，同时还教会了人们如何在这片与祖先、鬼、神共享的土地上始终怀抱着希望，顺利地生活，无惧地死去。

BELENCRE CLASSICS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y Pipher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菊与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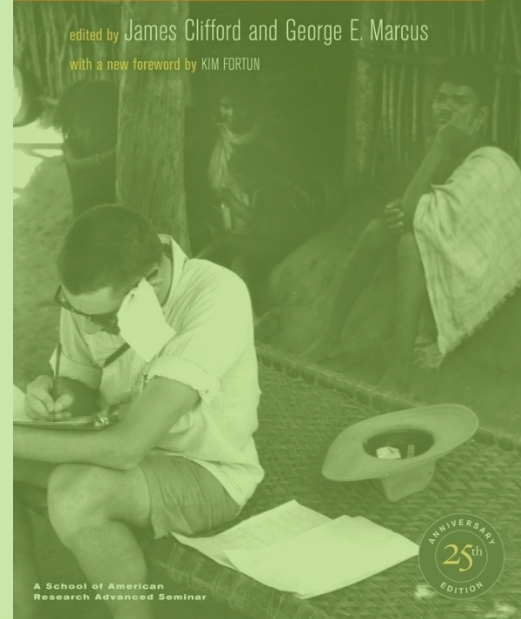
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
了解日本民族的必读经典
展现日本民族特质 揭示日本文化双重性

最佳的文学经典读物 最好的语言学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with a new foreword by KIM FORTUN



A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Advanced Seminar

ANNIVERSARY 25th EDITION

A



The Illness Narratives

疾痛的故事

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
(美) 阿瑟·克莱曼 著 方筱丽 译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

上海译文出版社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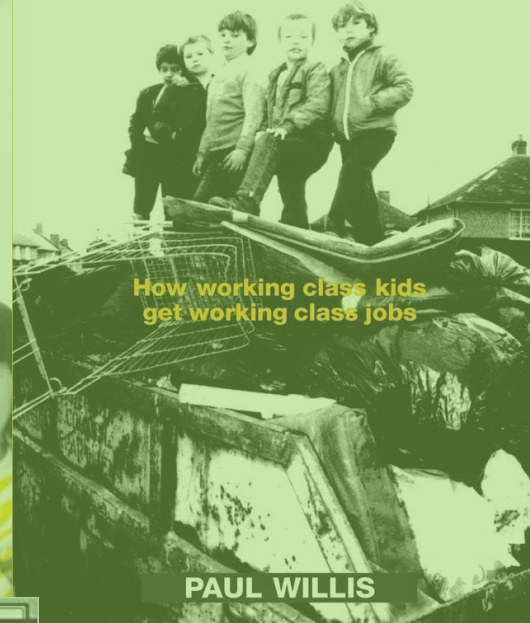
Joseph J. Tobin, David S. Bryson, and Mayumi Karasawa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
合作研究中心

Learning TO LABOUR

ROUTLEDGE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PAUL WILLIS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C. WRIGHT MILLS
With a new Afterword by Todd Gitlin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Revisited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seph Tobin, Yeh Hsueh, and Mayumi Karasawa